

陆海书系  
LANDSEA



对于想了解马可·波罗的读者来说，木下教授的著作是一部理想的入门读物。  
作者凭借富有洞察力与想象力的笔触，对马可·波罗时代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细致还原了这位传奇人物及其著作的历史面貌。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 金玛莉

木下教授精辟地阐述了马可·波罗所处的多元世界——  
一个由拉丁欧洲、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等交织而成的互联体系。

其论述虽广博深厚，行文却浅白晓畅。

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益并为之着迷。

——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 希琳·A. 坎莫哈马迪

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堪称中世纪全球化研究的完美典范。

——《蒙古秘史》英译者 克里斯托弗·P. 阿特伍德



新书抢先看  
赠书不间断



抖音扫码  
遇见好书

上架建议：社科·世界史

ISBN 978-7-229-20753-3



定价：78.00元

陆海书系  
LANDSEA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Sharon Kinoshita

著 王梓涵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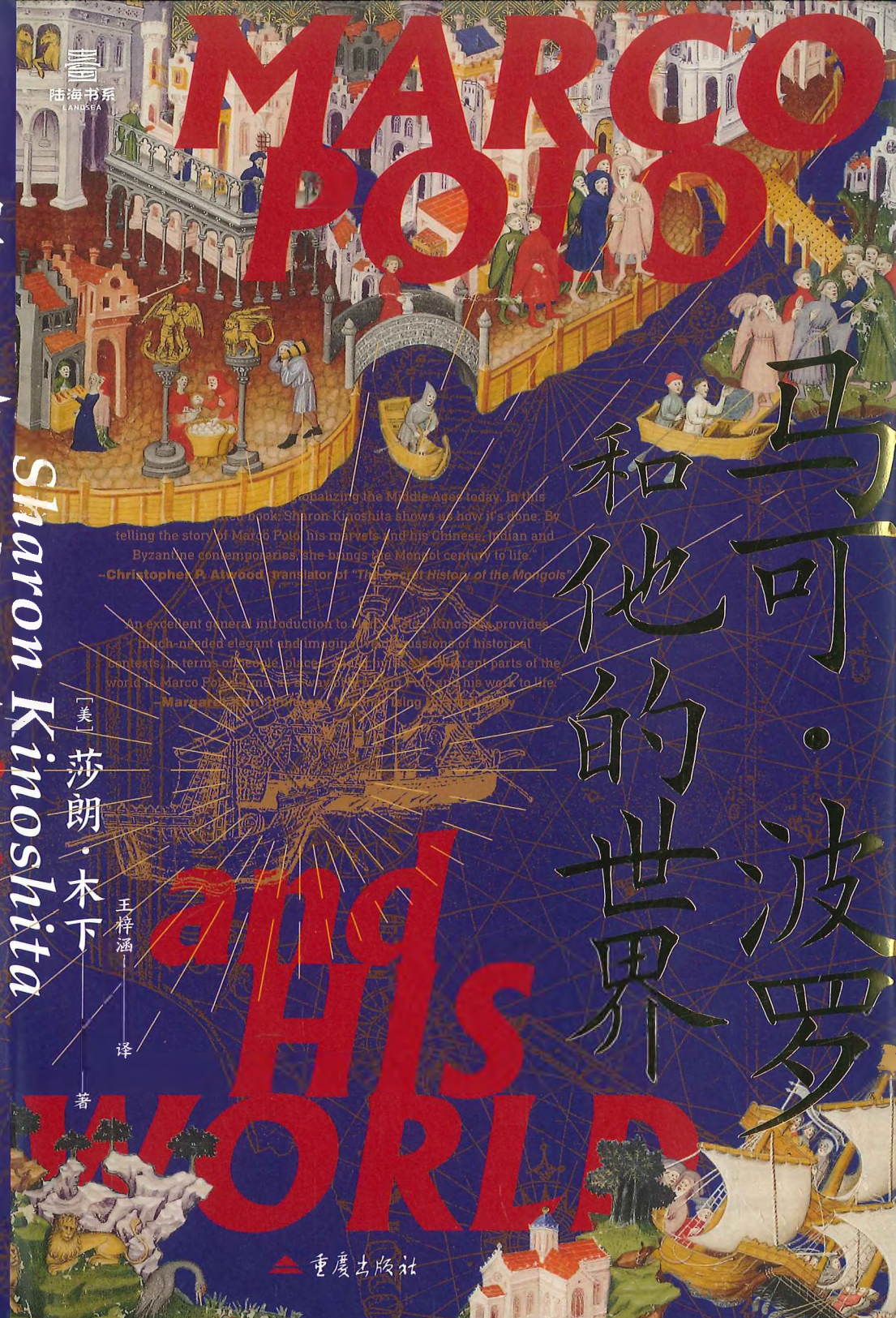
MARCO  
POLO  
and  
HIS  
WORLD



Sharon  
Kinoshita

重庆出版社

陆海书系  
LANDSEA



莎朗·木下  
王梓涵 译

著

重庆出版社

马可·波罗作为早期详细记录亚洲风貌的西方人，其名在中国家喻户晓，其著作《马可·波罗行纪》更是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进程。

本书并未停留于对马可·波罗传奇经历的复述，而是另辟蹊径，以《马可·波罗行纪》为主线，结合多元史料，致力于拓展《行纪》背后的历史纵深。作者还采用多维叙事手法，将焦点从马可·波罗的个人见闻，延伸至一位中国画家、一位印度诗人与一位拜占庭公主的人生故事，生动重现了因蒙古征服而空前连通、文化多样的欧亚世界。

全书语言通俗晓畅，视角新颖独到，对于人们理解东西方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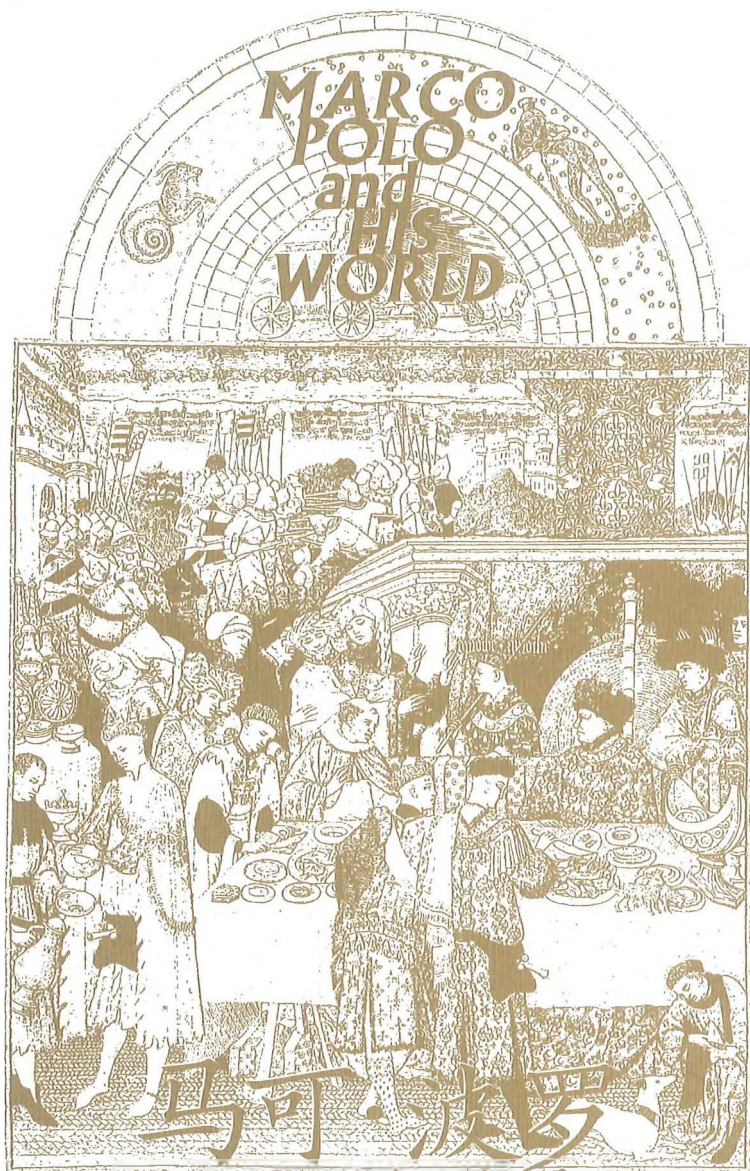
莎朗·木下 (Sharon Kinoshita)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文学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地中海研究、中世纪全球史与中世纪法国文学，曾将学界公认最接近《马可·波罗行纪》原稿的“F本”翻译为英文版。

王梓涵

资深译者，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涉外口笔译专业，英语专业八级。其译作包括《飘》《窃书贼》《阿瑟·克拉克传》等，以及《沙丘》系列、《星际迷航》系列、《安德的游戏》系列等。

出品 磨房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徐宪江 连果  
责任编辑 陈丽  
责任校对 李翔  
营销编辑 刘晓艳 冯思佳  
责任印制 梁善池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电话 010-85869375  
投稿邮箱 bjhzttr\_alphabooks@163.com



#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Sharon Kinoshita

[美] 莎朗·木下——著

王梓涵——译

▲ 重庆出版社

上架建议：社科·世界史

ISBN 978-7-229-20753-3



9 787229 207533 >

定价：78.00元

書  
陆海书系  
LANDSEA

MARCO  
POLO

[美] 莎朗·木下

王梓涵

译

著

Sharon Kinoshita



马可·波罗  
和他的世界

and  
HIS  
WORLD

重庆出版社

Marco Polo and His World by Sharon Kinoshita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24 in the Mediev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Sharon Kinoshita 2024.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版贸核渝字（2024）第2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美）莎朗·木下著；王梓涵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26. 1. -- ISBN 978-7-229-20753-3

I. K835.465.89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8987Q0号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MAKE BOLUO HE TA DE SHIJIE

[美]莎朗·木下 著 王梓涵 译

出品：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连 果

责任编辑：陈 丽

责任校对：李 翔

营销编辑：刘晓艳 冯思佳

责任印制：梁善池

装帧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375 字数：130千

2026年1月第1版 202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引言

+

关于马可·波罗 ..... 3

关于《寰宇记》 ..... 7

《寰宇记》的后续版本和影响 ..... 13

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世界 ..... 20

## 第一章

###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

三城记 ..... 29

威尼斯 / 比萨 / 热那亚

互联互通的世界 ..... 68

多语言的世界 ..... 76

描述世界 ..... 79

## 第二章

### 《大汗之书》

+

帝国的奇迹 ..... 89

三城记 ..... 103

汗八里 / 行在 / 刺桐

## 第三章

### 《奇迹之书》

+

中世纪的奇迹 ..... 133

异域之地和日常奇迹 ..... 135

奇迹与圣徒 ..... 149

圣多马 / 从释迦牟尼·薄伽梵到圣徒巴尔拉姆与约瑟法特

《印度之书》 ..... 166

## 第四章

### 动物、植物与矿产：商人和他们的世界

+

动物 ..... 181

芳香的世界：龙涎香和麝香 / 珍珠 / 马

植物 ..... 199

胡椒 / 樟脑

矿产 ..... 208

宝石 / 瓷器

结语 ..... 221

## 第 五 章

### 肖像画廊：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

赵孟頫 ..... 226

阿米尔·库斯劳 ..... 249

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 ..... 261

结语 ..... 266

后 记 ..... 269

历史事件年表 ..... 271

原注引文出处 ..... 273

参考文献 ..... 281

致谢 ..... 287

图片致谢 ..... 289



若想出版关于中世纪生活的系列丛书，最适合被书写的人物非马可·波罗（1254—1324）莫属。如今，人们能说得出名的欧洲中世纪人物已经不多，而其中最负盛名、家喻户晓的人物当属此人。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可·波罗既非查理大帝或征服者威廉那样至高无上的帝王，也非圣方济各<sup>1</sup>或圣女贞德那样至善至德的圣人，更不是如但丁或乔叟一般的文学巨匠。相反，他只是个出身威尼斯商人家庭的普通人，但恰巧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当时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对外征服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跨亚洲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马可·波罗十七岁时随父亲尼科洛和叔父马菲奥离开家乡，前往大汗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的宫廷。他的父亲和叔父先前曾进入过忽必烈的宫廷，并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而当时的马可·波罗还只是个孩子。进入忽必烈的

---

1 圣方济各（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译者注

宫廷后，马可·波罗展现了自己非凡的语言天赋，以及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遥远地方的风土人情、奇闻趣事的本领，从而吸引了忽必烈的注意，并深得其赏识，因此他从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一直都是在这位大汗的宫廷里任职。后来，13世纪90年代初期，忽必烈派遣使团前往位于波斯地区的伊儿汗国<sup>1</sup>探望他的侄孙，波罗家族三人也跟随使团前往。随后，他们便从那里踏上了回国之路，并于1295年到达了威尼斯。此时马可·波罗已经四十一岁，距他离开家乡已过去整整二十四年。

有关马可·波罗回国后的情况，历史上鲜有记载。其实，到了1298年，马可·波罗已是热那亚的一名囚犯<sup>2</sup>。热那亚是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黑海和西亚地区的强大竞争对手。在那里，马可·波罗结识了一名来自比萨的狱友，比萨是热那亚的另一个强大的海上竞争对手。此人名叫鲁斯蒂

---

1 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的封地。13世纪中期建国，定都大不里士。因其统治者称“伊儿汗”（Il Khan，意为“从属的汗”），故名。疆域以波斯为中心，东自阿姆河，西濒地中海（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北起高加索，南临阿拉伯海。合赞汗（Ghazan Khan，1295—1304年在位）时，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发展经济，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奖励学术，国势最盛。后因内讧，战乱不断，渐衰。14世纪末灭亡。——译者注

2 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结果被热那亚人俘虏。——译者注

谦 ( Rustichello ), 是一位作家, 擅长用法语撰写关于亚瑟王传说的长篇叙事诗。他们二人携手, 撰写了一部关于“世界各地的奇闻和伟大奇迹”的书, 书中所写的都是马可·波罗在过去的二十四年里游历亚洲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以及他听说的一些可靠故事。这部作品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游记》( *Travels* ) 的前身。<sup>1</sup> 不过, 它的原名是《寰宇记》( *Le Devisement du Monde* ) ——在中世纪及之后, 这本书有好几个名字, 《寰宇记》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 ++ 关于马可·波罗

与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 ( 1265—1321 ) 等同时代的名人相比, 马可·波罗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的痕迹少得令人吃惊。许多人试图为马可·波罗的生平增添各种传奇色彩, 但实际上, 我们对波罗家族知之甚少, 为数不多的一些信息都来自马可·波罗在世时, 波罗家族其他成员起草的一些文件。<sup>[1]</sup> 比如, 马可·波罗的叔父老马可于 1280 年

---

1 《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法文版本的书名是《世界奇迹录》(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 或者《寰宇记》( *Le Devisement du Monde* )。——译者注

立下一份遗嘱，将他与正在亚洲旅行的尼科洛和马菲奥共有的财产中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进行了处置。虽然这笔财产包括威尼斯圣塞韦罗教区和克里米亚索尔对亚港的几处房产，但他的继承人每人分得的金额并不多。然而，到了 1295 年，当波罗家族的三人回到威尼斯后，其家族的财富大幅增加，尤其是麝香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麝香是中世纪制造香水的珍贵原料，从动物体内提取，马可·波罗对此尤其感兴趣。到了 1300 年，波罗家族在威尼斯的圣乔万尼·格里索斯托莫教区拥有了大量地产。该教区位于大运河东岸，在里亚尔托市场的上游不远处。而马可·波罗与多娜塔·巴多尔的结合则是波罗家族地位提升的明显标志，因为多娜塔出身威尼斯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三个女儿凡蒂娜、贝莱拉和莫蕾塔，均嫁入威尼斯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家庭。马可·波罗于 1324 年去世，当时他的个人财产（包括他从父亲、哥哥和叔父马菲奥那里继承的遗产）价值超过一万杜卡特<sup>1</sup>。他留给妻子多娜塔每年的生活费是当时威尼斯平均水平的四倍多。在他的遗产清单中，仅是床就有二十四张，这表明他有一个庞大的家庭（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家奴，这在意大利和中世纪其他国家都很常见）。此外，

---

1 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 1284 年发行的一种足金货币。——译者注

清单中还有大量的衣物和布匹，包括不同品质、图案、颜色和产地的丝绸。同时，清单中还列出了蒙古人送给马可·波罗的许多纪念品，其中包括一块金腰牌——这是忽必烈的侄孙海合都<sup>1</sup>赐给波罗家族三人的四块“令牌”之一，以确保他们回国途中能安全顺利地通过伊儿汗国（见《寰宇记》第19章，第13页<sup>2</sup>；后文有关蒙古的内容皆引自此书）。此外，蒙古人的赏赐还包括一顶孛黑塔<sup>3</sup>，即蒙古贵族或社会上层女性佩戴的一种特殊头饰，常用于正式场合（见图1）。马可·波罗的遗产清单中的所有物品，使我们对这位在亚洲旅居多年、深谙亚洲文化的名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从侧面勾勒出这位十分富有的威尼斯商人的生活。要想进一步了解有关马可·波罗的更多信息，我们还需从《寰宇记》一书中寻找蛛丝马迹，推断一二。

---

1 海合都，又译为乞合都，伊儿汗国的第五任君主，1291至1295年在位。——译者注

2 这里指《寰宇记》全书的第13页，下同。——译者注

3 孛黑塔是蒙古语的称呼，汉文史集称罽罽、顾姑等。——译者注



图1 绢本彩绘《元世祖皇后彻伯尔·察必皇后画像》，画中的察必皇后头戴李黑塔

## ++ 关于《寰宇记》

马可·波罗和来自比萨的鲁斯蒂谦于1298年合作撰写的那部书的原作已经失传。现存最接近原作的书被称为“F本”，是一份约创作于1310年的简陋手抄稿（见图2），现被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推测已遗失的原作一样，“F本”也不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由于两位作者的“国籍”都是意大利，人们自然猜测其作品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本书是用一种意大利式的法语写成的，今天的学者们称这种语言为法兰克-意大利方言。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创作的《神曲》（*Divine Comedy*），将托斯卡纳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地位。而在此之前，法语（拉丁欧洲<sup>1</sup>大部分社会精英和世俗权贵所使用的方言）是意大利的非神职人员写作的首选语言，因为他们希望以此与拉丁语水平不高的读者交流。正如马可·波罗的同胞马丁·达·卡纳尔（Martin da Canal）在其1267年创作的《威尼斯史》（*Les Estoires de Venise*）中所解释的那样——“法语已

---

1 拉丁欧洲是指欧洲那些以罗曼语族语言（即起源于拉丁语的语言）为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或通用语言的地区。——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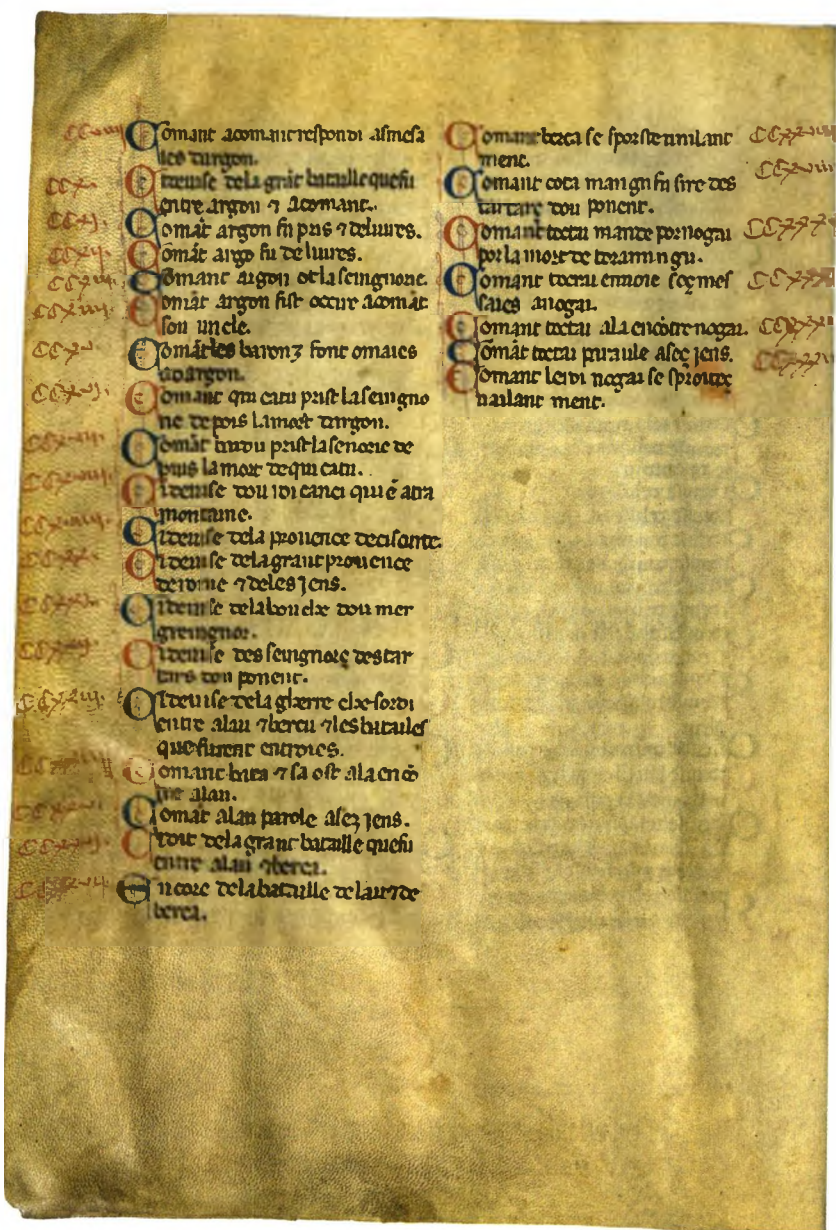


图2 马可·波罗《寰宇记》目录的最后一页和正文的第一页

C'est ainsi que le loyng de cest  
lure qui est appelle le tem  
sement du monde.

**S** Enquiers enpre  
tior. Trois. Dux.  
7 marquois. Cues.  
ches. 7 largions.  
7 toutes gens que  
voles sauoir les  
deuises ienerations des home  
7 les deuises des deuises re  
mon. Tou monde. Si prentes ce  
sau lurre 7 le fer tes lire 7 chuo  
uertes toutes les grandisme  
meruilles. 7 les grant oulures  
de la grant larmure. 7 deplie  
7 des tartars. 7 moie. Et des i  
maures. 7 nuns prouces. sicon  
notre lurre uoq stem por ceue  
aptem. ane siconne meistre mi  
elo pol. fues et noble citiens  
deuencez rader por ce que asce  
lure meisme il leuot mes au  
ques lonna qui ne me pas. me  
illentendi en homes citables  
deuence. Et por ce meiron les  
choules neue por neue. 7 leue  
dix pp encipoue por ce que no  
ce lurre soit droit 7 uertable  
sans nulle mensonge. 7 dail  
cuns que cest lurre lurre ou  
louront leuient avire por ce  
que toutes sune choules uer  
tables. car ic uoq fais sauoir  
que plus que notre sire dieu

palme desq manq. 7 lurre notre pa  
mer pe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enliens ne puiens ne turtur ne n  
viens. ne nulle homes de nulle gene  
ration que turtur seult ne cherehast  
reles deuises par ce tou mote 7 de  
les grant meruill les come cestun  
meistre march en chere 7 lurre. Et  
por ce dit il alor meisme que tropo  
seroit grant mais seil ne seult me  
tre encreuier toutes les grant m  
uilles qui lurre 7 qui lurre. 7 qui lurre.  
tes por ce que les autres iens que  
nele uient ne seult le sadoit.  
por cest lurre. Et si uoq di qui de  
mora.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par ce 7 puiens bien. xxi. an.  
le quel plus de meisme en lurre.  
chere te sene silt retrare. 7 lurre.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de pise que en celle meisme lurre.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ce. xxi. an. que seigneur. 7 lurre.  
comar meism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de goslarn nopl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L** lurre que. lurre. 7 lurre. 7 lurre.  
estor enpace de goslarn nopl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lao pol que pere meisme march.  
estor 7 meisme maste pol que lurre.  
re meisme mast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us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7 lurre.  
stantinople. qui se lurre. 7 lurre. 7 lurre.

经传遍世界，是所有语言中最令人愉悦的”<sup>[2]</sup>。

《寰宇记》现存的法兰克-意大利方言“F本”共有233章，每章长度不等，在现代印刷版中，短的只有寥寥几行，长的有好几页。该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是序言（第1章至第19章）<sup>1</sup>，讲述的是波罗家族两次前往忽必烈宫廷的旅程。忽必烈于1260至1294年在位，统治着蒙古帝国和元朝。波罗家族第一次的蒙古宫廷之旅是在13世纪60年代，前往者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第二次旅程发生于1271至1295年，前往者是波罗家族的三人，即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以及马可·波罗本人。接着是该书的正文（第20章至第157章），主要介绍蒙古统治下的广袤疆域。还有“印度之书”（第158章至第198章），描述的是临近“大洋海”的一些国度和地区，从日本开始，然后穿过中南半岛和众多岛屿，一直延伸到印度沿海地区，最后横跨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最后是尾声部分（第199章至第233章），表面上是关于“大土耳其”的历史，但实际上主要讲述的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各分支所统治的各蒙古汗国之间以及内部冲突的历史。<sup>[3]</sup>

---

1 书中对马可·波罗著作的参考和引用均来自美国哈克特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的《寰宇记》。该版本是本书作者莎朗·木下根据最接近《寰宇记》原作的版本，即“F本”翻译成的英文版。——译者注

在这 233 个章节里，马可·波罗讲述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某个特定城市、省份或王国的描写和介绍。其最简略的形式通常会列出某个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政治忠诚度和归属关系或该区域的统治形式、人民的生计来源（贸易、手工业、农业）以及商人对该地区最感兴趣的商品等。比如其中有一条对中国北方城市河间府（位于今河北省）的介绍尤为典型：“当地居民是偶像崇拜者<sup>1</sup>，对死者实行火葬。他们臣属于大汗，以纸币作为货币。他们以贸易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拥有大量的黄金、丝绸和绸缎。许多城镇和城堡都在这座府城的统治之下。”（第 133 章，第 117 页）篇幅较长的条目可能会以原始民族志的方式描述包括当地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如服饰、习俗、食物）、近期历史（尤其是当地如何被蒙古人统治）或与当地遗址或人物有关的奇闻异事（包括神迹故事）。一路上，马可·波罗始终对与商业有关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商人受到的待遇情况，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如市场、特别区、仓库以及包括道路、通航水道和桥梁在内的运输系统等），以及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的特定商品（如珍珠、胡椒或丝绸等）的数量和质量。有意思的是，

---

1 指佛教徒。——译者注

马可·波罗有时会兴致勃勃地描述某个地区动物生活的情况，即使这些内容与贸易毫无关系。

由于该书的主题和风格太过多样，我们无法将其归入任何一种类型和体裁。学者们注意到它与商人手册、奇迹之书、十字军小册子、传教手册、编年史、百科全书以及古法语史诗和浪漫主义小说均有相似之处。不过，《寰宇记》的核心关注点是“世上从未有过如他一般的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广袤的土地和最多的财富”（第76章，第67页），即忽必烈和他的庞大帝国。马可·波罗在描述蒙古人时，首先详细叙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历史（第65章至第68章）。接着，他略过中间几代君主的统治，很快谈到了忽必烈：忽必烈作为大汗（或可汗）在执政初期发动的数次征战、他的家庭、他的宫殿、他的朝廷以及一些庆典和巡游的情况，还有他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带来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在马可·波罗看来，忽必烈的伟大功绩是独一无二的，“人类始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第76章，第67页），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比。而对于习惯于以亚历山大、恺撒或查理大帝等人物作为政治权力强大标准的读者来说，马可·波罗对于这位蒙古皇帝的描述令人惊叹，因为这样的皇帝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为何有些古法语版本的《寰宇记》被命名为《大汗之书》( *Li livres du Graunt Caam* )。

## ++ 《寰宇记》的后续版本和影响

《寰宇记》对忽必烈和他的帝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后来的一些法语手抄本将马可·波罗的这本书冠以《大汗之书》的别名。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原作问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书被许多人翻译和抄写，因此出现了无数其他版本，有装订版也有手抄版，其中的内容多多少少有些改变，或有删节或有补充，有的还附加了插图。这些都赋予了《寰宇记》原作不同的含义。在法兰克-意大利语版的“F本”问世十多年后，多明我会<sup>1</sup>修士弗拉·弗朗西斯科·皮皮诺( *Fra Francesco Pipino* )将马可·波罗的文本译成拉丁文，稍作润色和改动后出版成书，取名为《论东方地区的风土人情》( *De conditionibus et consuetudinibus orientalium regionum* )。到了14世纪30年代中期，一部名为《大汗之书》

---

1 多明我会，又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与隐修士不同，其成员要获得全面的神学培训。——译者注

的法语手抄本出现在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制作的豪华手抄本（伦敦，大英图书馆，皇家 MS<sup>1</sup> 19DI；见图 3）中。15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另一部手抄本（现被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它将一份与大英图书馆版本高度近似的文本和一首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生平事迹的中古英语诗歌加到了早五十多年的《亚历山大传奇》（*Romance of Alexander*）的副本里。该手抄本里的插图虽然与大英图书馆手抄本中的插图位置相同，但在构图和风格上则与《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插图相似，这使两份文本在视觉和主题上都更加接近（见图 4）。

大约在同一时间（约 1410 年），马可·波罗的作品被收录进一部插图丰富的亚洲主题作品集中，该作品集由勃艮第公爵命人编纂，并作为新年礼物献给它叔父——著名的藏书家贝里公爵。如今它被收藏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MS Français 2810），书名为《奇迹之书》（*Le Livre des merveilles*，见图 5）。

除了文本细节和呈现形式上的差异，马可·波罗原作的每一个后续版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因而其意义和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忽必烈在 1271 年建立的元朝最终于 1368 年被明朝推翻（伊儿汗国则在

---

1 MS 是手稿（Manuscript）的缩写，国际通用。——译者注



图3 细密画《老波罗兄弟觐见忽必烈》，选自马可·波罗的《大汗之书》( *Li livres du Graunt Caam* )，约创作于1333至1340年



图4 细密画《波罗家族三人离开威尼斯》，选自马可·波罗的《大汗之书》，  
约创作于1338至1410年

三十多年前被波斯推翻)。拉丁欧洲人对这些世界历史的动荡和变迁即便有所了解,也是不甚了了。然后,在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另一位从中亚向西横扫的征服者到达了地中海沿岸。此人便是跛足帖木儿<sup>1</sup>[后来被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克里斯托弗·马洛<sup>2</sup>(Christopher Marlowe)尊称为帖木儿大帝],他自称是蒙古大汗的继承人,在1402年的安哥拉(安卡拉的旧称)战役中击败并俘虏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使奥斯曼帝国陷入了十多年的混乱。进入15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在对外探索和土地扩张的浪潮推动下,哥伦布于1492年远航至美洲新大陆,瓦斯科·达·伽马则于1498年航行至印度。这些航海壮举使得人们对马可·波罗的著作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作品从1477年起便有多个印刷版本相继问世。

在早期现代探索时代的大背景下,马可·波罗的作品

- 
- 1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绰号“帖木儿兰”(Timur i Leng),意为“跛足帖木儿”。1370年夺得西察合台汗国政权,定都撒马尔罕。后征服察合台汗国全境。14世纪80年代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90年代侵入伊拉克、南高加索;大败钦察汗国,毁其都城萨莱。又攻入印度,进兵叙利亚、小亚细亚。1402年在安哥拉战役中大败奥斯曼土耳其人,俘获苏丹巴耶塞特一世。1405年率重兵图谋进攻中国,途中病死。死后帝国分裂。——译者注
  - 2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译者注



图5 细密画《狗头人》，选自马可·波罗的《奇迹之书》，约创作于1400至1420年

被重新编排为一部游记。1532年，它被收录在《新世界》（*Novus Orbis*）一书中。这部拉丁文作品集收录了大量当时的地图及十七篇游记。事实证明，这部作品集极具影响力：它很快被翻译成德语（1534年）和弗拉芒语<sup>1</sup>（1536年），其中马可·波罗的游记部分，以《论东方诸地区》（*De Regionibus orientalibus*）为题，被单独翻译成各种地方语言，成为16世

---

1 弗拉芒语是比利时荷兰语的旧名称，主要通行于比利时北部地区。——译者注

纪流传最广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到了1559年——此时世界已进入欧洲探索和征服的时代——威尼斯人文学者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出版了意大利语的印刷版《马可·波罗游记》。该译本被收录在他的《航海记与旅行记》（*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系列中，其中包含了许多以前版本中没有的内容。

这些早期现代的出版物无疑很容易让我们将马可·波罗的作品归为典型的游记。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F本”——被公认为最接近失传的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合著的原作版本时，我们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部游记。正如我们所见，在全书的233章中，只有前19章讲述了尼科洛和马菲奥的旅行经历，紧接着是老波罗两兄弟和马可·波罗的经历。期待看到马可·波罗以第一人称记述英雄之旅、独特遭遇和路上艰辛的读者，肯定会失望的。同样，如果将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绘制成一条单一的线性路线，我们则很可能得出他记忆混乱或有误的结论。这进而引发了人们对其描述“真实性”的质疑：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汉学家弗朗西丝·伍德<sup>1</sup>（Frances Wood）在一本书中提出了这一

---

1 弗朗西丝·伍德，中文名为吴芳思，汉学家，长期担任大英图书馆中国馆馆长。著有《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等十余部专著。——译者注

质疑，而这本书的书名则强烈地暗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这一质疑遭到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的有力反驳，伍德在其著作的美国版后记中也收回了这一说法——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对此提出疑问，是因为她参考了“根据多种版本拼凑而成的现代版本”<sup>[4]</sup>。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的话，把他们的作品当作“对世界的描述”来读，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我们看到的是马可·波罗在海外的二十多年里可能到过的地方和重游过的地方，他住过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地方，或者在外出或回国途中经过的地方，以及行政记录或者“官方人士”（第1章，第1页）的报告中提到过的地方——比如他在蒙古朝廷里任职期间可能经常去往的地方。这就是马可·波罗的世界，也是让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感到无比惊叹的世界，更是本书想要生动地呈现给读者的世界。

## ↔ 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世界

尽管马可·波罗直到今天仍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但与通常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的写作重点并不是这位探险家的生平，而是将他和鲁斯蒂谦合著的《寰宇记》作为一个窗口，

让读者对约 1250 至 1300 年间非凡的半个世纪有更多的了解。之所以非凡，是因为当时蒙古人征服了亚洲，使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南达印度洋的各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贸易、接触和交流。本书的第一章探讨了一系列世界史重大事件，例如巴格达沦陷（1258 年）、拜占庭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1261 年）和十字军失去阿卡古城（1291 年）等，以及这些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和推动这一独特历史时期的地缘政治、商业和文化的形成，并为整本书奠定了基础。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引用了《寰宇记》在中世纪时期被冠以的两个书名——《大汗之书》和《奇迹之书》，以突出这两章各自的侧重点。第二章重点介绍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和他的宏伟帝国。第三章探讨了《寰宇记》对中世纪奇迹迷恋（“奇迹”的法语为“merveilles”，拉丁语为“mirabilia”，阿拉伯语为“ajūb”）的独特重塑，这些奇迹包括自然神迹、奇迹故事（以不同于拉丁基督教的传统方式进行重述）和文化奇观等。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将视野拓展到文本之外的世界。第四章探讨了欧亚大陆上的各种商品交易——那些最初吸引波罗家族和其他欧洲商人前往东方的动物、植物和矿产等。第五章是本书最具实验性的部分——探索马可·波罗世界的文化丰富性——通过审视三位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物的生活，揭示马

可·波罗所处世界的多样性和辉煌程度，这三个人物分别是：中国画家兼文学家赵孟頫（1254—1322）、印度德里诗人阿米尔·库斯劳（Amir Khusrau, 1253—1325）以及拜占庭公主、波斯可敦<sup>1</sup>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Maria Palaiologina, 约1253—1325）。

---

1 可敦，亦称“恪尊”“可孙”“可贺敦”“合屯”“合敦”。古代柔然、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政权对可汗妻的称呼。——译者注

# MARCO POLO



第 一 章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and*  
**HIS  
WORLD**



诸位领主、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以及市民们，还有所有想了解世界上多样民族之间的不同以及多样地区的多样性的人，请拿起这本书，仔细阅读。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睿智而高贵的威尼斯公民马可·波罗先生条理清晰地描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所有最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因为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寰宇记》第1章，第1页，加粗文字

这段话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合著的《寰宇记》的开篇引语，开创了以多样性为特征的文本先河：首先是语言的多样性（《寰宇记》被翻译或重译成标准的古法语、拉丁语、托斯卡纳语、威尼斯语以及一系列其他欧洲语言），其次是手抄本的多样性（所有的手抄本都不尽相同，没有一模一样的）。此外，还有书名的多样性。令人惊讶的是，鲁斯蒂谦在序言的开篇四次使用

了“多样的”或“多样性”这样的词语。这种笨拙的重复在现代人听来有些别扭，不过这在13世纪的法语作品，如讲述亚瑟王传奇故事的《圣杯追寻记》（*La Queste del saint graal*）或《亚瑟王之死》（*La Mort le roi Artu*）中却十分普遍。英译本通常会用更丰富多样的词汇来掩盖原文笨拙的表达，虽然这使文本的语言更加优雅，但代价是抹去了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最看重的主题重点。<sup>[1]</sup>

这种重复并不是作者在序言中表达他们对多样性关注的唯一方式。《寰宇记》的开篇与鲁斯蒂谦本人所著的亚瑟王传奇故事《梅里亚杜斯传奇》（*Meliadus*）的第一句十分相似，因此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从而吸引了非常广泛的读者。此前关于蒙古的两份“研究报告”，分别由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sup>1</sup>（John of Plano Carpini）于13世纪40年代和威廉·鲁布鲁克<sup>2</sup>（William of Rubruck）于13世纪50年代用拉丁文撰写，并分别呈交给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古法语

---

1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以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又译为普兰诺·卡尔平尼或柏朗嘉宾的约翰）为首的使团出使蒙古，后者后来用拉丁文撰写了《蒙古行纪》一书。——译者注

2 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古的特使，他于1253年底来到蒙古觐见蒙哥汗，并参加了蒙哥汗的即位典礼。著有《鲁布鲁克东行记》一书。——译者注

的白话文学作品通常都是作者受贵族或王室赞助人的委托，或为了得到贵族或王室赞助人的青睐而创作的。与此相反，《寰宇记》的受众面却极广，一开始面向世俗社会最顶层的皇帝、国王和贵族，随后降至“骑士和市民”，最后向所有希望了解世界多样性的人敞开大门。显然，受众中并不包括神职人员，从教皇到各级神职人员都不包括在内，但他们可以阅读方济各会修士弗拉·弗朗西斯科·皮皮诺的拉丁文译本，这是专为他们定制的版本。总之，鲁斯蒂谦撰写的序言代表了一种大胆的社会构想，它汇聚了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面对面直接接触的读者群。或许我们可以将《寰宇记》中纷繁各异的话语（稍后我们会对此进行探讨）归因于其受众的多样性。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鲁斯蒂谦对《寰宇记》内容的总结：“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所有最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鞑靼”一词源于民族或部落名“塔塔尔”，欧洲人将其与古希腊语中表示冥界最深处的词语“塔耳塔洛斯”相联系，是《寰宇记》和其他拉丁欧洲人的作品中对蒙古人的一致称谓）《寰宇记》没有使用现代马可·波罗研究中惯用的“东方”“西方”划分概念，也没有提及源自中世纪“T-O”地图的三大洲概念——在“T-O”地图中，“O”是指包围

De asia & partib' ei'.



图6 13世纪早期的T-O地图，根据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所著的《词源》一书绘制（图中的文字分别为亚洲、欧洲和非洲）

和环绕所有陆地的“O”形海洋，“T”是指将整个世界的陆地分成三部分的三条水道（见图6）。布鲁内托·拉蒂尼<sup>1</sup>（Brunetto Latini）于13世纪60年代用法语创作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宝藏之书》（*Li livres dou trésor*）就反映了这种传统的中世纪世界观。

1 布鲁内托·拉蒂尼（约1220—约1294），意大利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但丁的老师。——译者注

地球被大洋环绕……大洋即海洋，流经地球不同地区的所有其他大洋都是海洋的延伸……整个地球被分为三个部分：亚洲、非洲和欧洲。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亚洲就占据了整个地球的一半。<sup>[2]</sup>

最值得关注的是，《寰宇记》的序言中并没有提到中国——毕竟在现代人的想象中，中国与马可·波罗的联系是最为密切的。而恰恰相反，鲁斯蒂谦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地缘实体的集合——即“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这是一个可扩展的大框架，凸显了13世纪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三城记

就让我们从马可·波罗的家乡说起吧。如今，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是意大利旅游线路上的三个必去之地，不仅因为这三座城市里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还因为这三个地方皆是地中海邮轮的停靠港。然而，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这三座城市都是自治的海上共和国（还有阿马尔菲，其鼎盛时期

要比这三座城市的早两个世纪)，同时也是竞争激烈的贸易对手。事实上，尽管这三座城市的政府经常对地中海南岸和东岸的穆斯林势力发动战争，但他们最为痛恨的还是与他们同为基督徒的商业竞争对手（见图7）。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Jacopo da Varagine）在他的《热那亚城纪事》（*Chronicle of the City of Genoa*）中，将1294年热那亚人在阿亚斯（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王国的重要港口）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击败威尼斯人的胜利，与哈斯蒙尼家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击败塞琉古帝国的胜利相提并论<sup>1</sup>。此外，雅各布还提到，威尼斯人试图用“一些混淆视听的虚构之词”来“粉饰”他们在海上的落败，这又给他们增添了耻辱。<sup>[3]</sup>措辞如此犀利的现实政治观点，均出自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之笔，这位神职人员因其所著的圣徒传记选集《金色传奇》（*Legenda Aurea*）而为现代学者所熟知。而《金色传奇》一书也为1298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和比萨人鲁斯蒂谦被热那亚人俘虏一事提供了生动的背景。

---

1 即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是指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60年，由犹太祭司家族哈斯蒙尼家族领导的反抗塞琉古帝国残酷统治和希腊文化渗透的犹太人大起义。其中起义领袖马塔提亚的儿子犹大表现突出，获得“马加比”（意为“锤子”）的绰号。——译者注



en S. Ballard (2023)

## ++ 威尼斯

1267年，马可·波罗的同胞马丁·达·卡纳尔撰写了《威尼斯史》——和《寰宇记》一样，也是用法语写成——以彰显和赞美这座城市的繁盛。他虔诚地颂扬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和“受人爱戴的福音传道者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圣人<sup>1</sup>），随后他谈到了这座城市。

威尼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最令人愉悦的城市，到处充满了美丽和美好的事物。商品犹如泉中之水，流淌在这座高贵的城市里。威尼斯从海中崛起，咸咸的海水流经这座城市，除了房屋和街道，还流淌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处角落。聚集在广场上的市民，既可以走陆路回家，也可以通过水路回去。

这种对水的关注突出了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因为威尼斯建在威尼斯潟湖的无数岛屿上——一个个教区错落有致，

---

1 守护圣人是指被天主教会选定的为个人、国家、教区、堂区、职业等在天主前代祷的圣人或圣女。——译者注

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教堂、集市广场和显赫家族的豪华宅邸，这些地方都通过渡船和木桥连接起来。然而，作者所说的水流并非字面意思，而是一种比喻。马丁如是说：

商品从四面八方运来，商人们也纷至沓来，准备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然后将它们带回自己的国家。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可以找到种类繁多且数量充足的食物，例如面包和葡萄酒、家禽和水鸟、新鲜和腌制的肉类，以及从海里或河里捞上来的大鱼等。各地商人会聚于此，买卖交易。

富裕的衡量标准不在于精神的富足，而在于食物种类的多样性。即使是出身显赫的贵族，也许在其他城市的市民看来，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但在威尼斯，他们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如商人、手工业者和水手，其地位也被大大削弱。

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许多绅士——老年绅士、中年绅士，还有年轻绅士，他们出身高贵，声名显赫。与绅士一样体面的群体还有做生意的商人、货币兑换商、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公民以及从事各种工作的水手。备受重视

的还有船只，包括负责运输的船只和攻击敌人的战船。此外，在这座城市里，还有许多美丽的女士和少女，她们一个个衣着光鲜亮丽。<sup>[4]</sup>

值得注意的是，与鲁斯蒂谦在序言中的描述一样，体面群体不包括神职人员。

威尼斯是由为躲避蛮族入侵的难民于5世纪建立的。当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时，威尼斯从潟湖中无数岛屿形成的定居点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座水上之城。虽然威尼斯远离君士坦丁堡，且享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但它仍隶属于控制着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828年。根据传统，在亚历山大港经商的威尼斯商人盗走了福音传道者圣马可的遗体。在中世纪，盗窃“圣物”的现象十分普遍，此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商人们将偷来的圣物带回威尼斯，并在现今的大教堂所在地建造了第一座圣马可教堂来存放圣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1099年）后，威尼斯和意大利的其他海上共和国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即运输和补给支持，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战斗。因此，作为奖赏，威尼斯人在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其他十字军



图8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青铜四马雕像（复制品）

国家<sup>1</sup>获得了“领地”和贸易特权。这些领地迅速扩大了威尼斯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贸易。亚历山大港是香料和其他从南亚和东印度群岛通过海路运来的商品，以及糖和明矾等本地或地区产品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1173年，伟大的穆斯

---

1 十字军国家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基督教势力建立的几个王国、公国、伯国，包括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埃德萨伯国。——译者注

林领袖萨拉丁<sup>1</sup>（Saladin）为威尼斯人建造了一种商馆——仿照伊斯兰商栈建造的综合设施，包括住宿、仓库和其他设施，比如教堂（提供给来访的基督徒）<sup>[5]</sup>。

13世纪初，威尼斯的势力空前强大，经济空前繁荣，实力迅速崛起。1204年，在年迈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当时已九十多岁）的鼓动下，原本集结起来准备进攻埃及阿尤布王朝<sup>2</sup>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联军转而攻向了拜占庭帝国，并攻克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关于这次十字军东征，最广为人知的是，威尼斯一些最具标志性的物品，都是此次东征的战利品，其中包括：来自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圣马可之马<sup>3</sup>，如今（以复制品的形式）仍高高地矗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正面拱门之上（见图8）；两对斑岩

---

1 萨拉丁即马利克·纳西尔·萨拉丁·优素福一世（1137—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至1193年在位。——译者注

2 阿尤布王朝是12世纪中晚期至13世纪中期统治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的伊斯兰教王国。——译者注

3 圣马可之马是一座青铜四马雕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据说曾守立在特洛伊城门前。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庭皇帝将四马雕像运到君士坦丁堡，放置在赛马场。——译者注



图9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帝共治斑岩雕像，制作于公元300年

雕像（通常被称为“四帝共治”<sup>1</sup>雕像）被镶嵌在大教堂一层的西南角（见图9）；大教堂南侧外边所谓两根阿卡之柱——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两根柱子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后从十字军的港口阿卡夺来的，但最近发现这两根柱子来自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圣波利尤克托斯教堂（见图10）。

更重要的是，威尼斯与新即位的“拉丁”皇帝（佛兰德斯<sup>2</sup>伯爵的后裔）结盟，因而在君士坦丁堡享有重要的贸易特权，并控制了通往黑海的通道。此外，威尼斯还宣称克里特岛、爱琴海的内格罗蓬特公国<sup>3</sup>（今埃维亚岛）以及爱奥尼亚地区的莫东和科伦（分别为今科罗尼和迈索尼）等地为自己的领土，并将这些地方的港口收入囊中，作为横跨地中海东部的海上中转站，从而巩固和壮大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领地，即所谓“海外帝国”。庞大的威尼斯海外帝国为波罗家族两兄弟的第一次远行（第2章）创造了条件。1260年，波罗家

---

1 四帝共治指的是罗马帝国在293年开始实行的由四个皇帝共同治理帝国的政体。此政策由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提出并实施，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部分由一位皇帝管辖，称为“奥古斯都”，每位奥古斯都再指定一位助手兼继承人，称为“恺撒”。——译者注

2 佛兰德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是古代尼德兰南部的重要地区，主要包括今荷兰南部、比利时北部及法国北部的某些省份。——译者注

3 内格罗蓬特公国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欧洲基督教势力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之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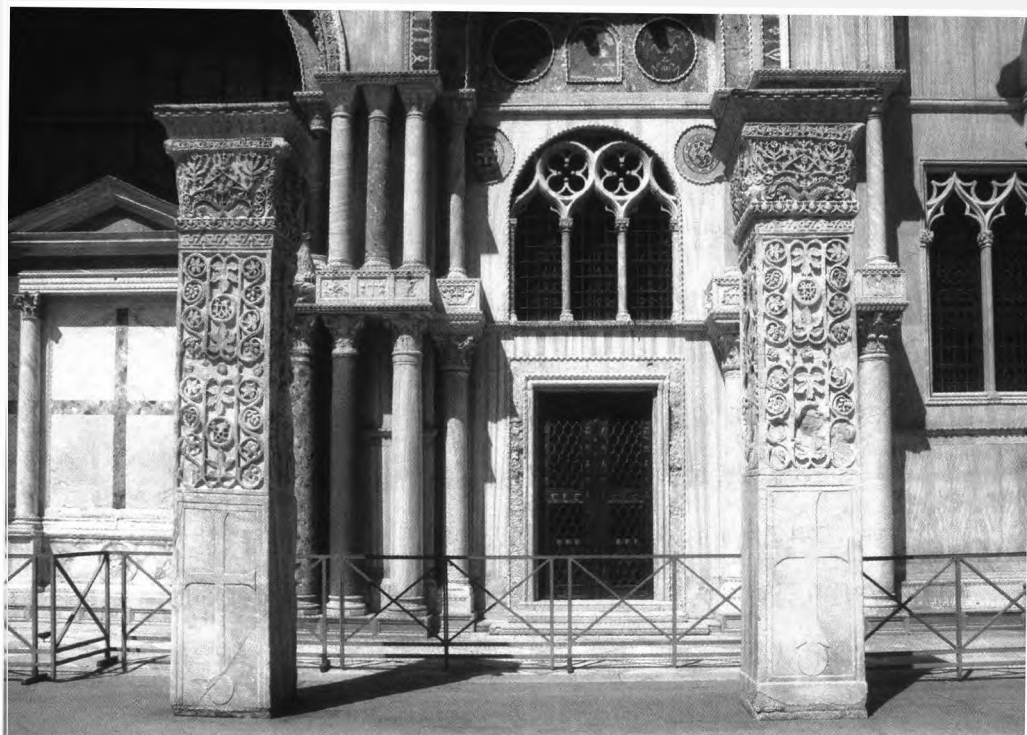


图 10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阿卡之柱。建于 6 世纪

族两兄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克里米亚的苏达克港（今费奥多西亚附近）。然而，第二年，拜占庭皇室后裔、尼西亚帝国<sup>1</sup>残余政权的统治者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Michael VIII Palaiologos）赶走了拉丁皇帝及其支持者威尼斯人。现在轮到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皇帝的盟友热那亚从君士坦丁堡的贸

---

1 1204 年，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联军在威尼斯人的怂恿下攻占并劫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四分五裂，提奥多雷一世建立尼西亚帝国，定都尼西亚。——译者注

易特权中获益了——中世纪地中海两大贸易强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命运出现了大逆转。这就是马可·波罗童年时期的情况，也是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父马菲奥第一次远航前往亚洲的十多年里威尼斯所处的境况。

与大多数城市一样，现代威尼斯的建筑体现了各个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今天游客们所欣赏的许多景点都是在马可·波罗死后建造的，比如与圣马可大教堂毗邻的总督府以及大运河沿岸富丽堂皇的哥特式豪宅（宫殿）都是在14世纪到15世纪之间改建成如今这般面貌的。方济各会的荣耀圣母教堂和多明我会的圣乔万尼与保罗大教堂都建造于14世纪30年代，取代了13世纪较为简陋的建筑，这反映了两个修道会的迅速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里亚尔托桥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古迹之一，直到16世纪末才建成石桥。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著名台词“里亚尔托桥可有什么动静？”（第一幕第三场）反映的正是这一时代。

不过，马可·波罗在世时，威尼斯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尼斯宫殿的基本结构——一楼为储藏室，二楼是中央大厅和居住区——形成于13世纪下半叶。在拉涅里·泽诺（Ranieri Zeno, 1253—1268）和洛伦佐·提埃波罗（Lorenzo Tiepolo, 1268—1275）执政期间，威尼斯似乎一直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建设。1264年，一座木制吊桥建造完成，取代了横跨里亚尔托（中央市场）处大运河的12世纪浮桥，1272年连接里亚尔托市场和圣马可区的梅尔契里埃大街铺设完成。

这些城市改造的核心是圣马可大教堂的改造。与中世纪拉丁欧洲的其他大教堂不同，尽管圣马可大教堂规模宏大，但它不是一座面向公众的大教堂，而只是总督的私人礼拜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式或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不同，这座教堂的穹顶（据说是仿照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的穹顶建造的）和马赛克壁画明显展示了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历史联系。如上文所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人们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掠夺物<sup>1</sup>改变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外观。城市通过炫耀性地展示物质财富，来庆祝自身的胜利并宣传其伟大，是我们所讨论的三个海上共和国的共同做法，但没有哪个城市比威尼斯做得更大张旗鼓、更引人注目。正如我们所知，1261年，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威尼斯商人之前享有的贸易特权落入其竞争对手热那亚人手中，威尼斯的商业由此遭受重挫。尽管损失惨重——或许正是为了弥补

---

1 “掠夺物”（spolia）一词源于拉丁文。在建筑和艺术语境中，它特指从原有建筑或遗址中拆取下来的建筑材料或装饰构件，这些材料或构件通常会被用于新的建筑。——译者注



图 11 布面蛋彩油画《圣马可广场上的游行》(局部),由威尼斯画家詹蒂利·贝利尼创作于 1496 年



这些损失，拉涅里·泽诺总督对圣马可大教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般来说，教堂的壁画展示的都是该城守护圣人的殉难场景或其他生平场景，威尼斯人却选择以自身为核心主题：他们在教堂主立面的四个大门上方镶嵌了四幅宏伟的马赛克壁画，这些壁画描绘的是9世纪时圣马可的遗体被从亚历山大港“迁葬”到威尼斯的过程。如今，这四幅壁画中只有第四幅也就是最后一幅存留下来，但前三幅壁画（在18世纪被其他壁画取代）在詹蒂利·贝利尼<sup>1</sup>（Gentile Bellini）于1496年创作的油画《圣马可广场上的游行》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见图11）。从右往左看，前三幅壁画依次描绘了以下内容：两名威尼斯商人将圣人的遗体从坟墓中搬出并装船；遗体被装上船，并在返航途中奇迹般地躲过风暴；遗体被抬着在威尼斯城中游行。第四幅壁画位于圣阿里皮奥门上方，描绘的是遗体被抬着穿过圣马可教堂中央门廊（教堂的外观被错误地描绘成13世纪的样子<sup>2</sup>）的场景，一队尊贵的威尼斯人在一旁观看。若换作别的教堂，壁画上描绘的肯定是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接受圣物的场景，但在圣马可大教堂的

---

1 詹蒂利·贝利尼（1429—1507），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以宗教画作闻名。——译者注

2 如上所述，圣马可的遗体被迁葬到威尼斯一事发生在9世纪。——译者注

壁画中，这些神职人员被一群贵族取代，画面中的贵族看上去团结和睦，这一视觉形象掩盖了他们内部时常分裂彼此的激烈竞争（见图 12）。

与此同时，大教堂前的广阔空间——如今的圣马可广场——被铺设一新，并被建成一个舞台，用于举行各种精心编排的仪式和纪念活动，以呈现和展示威尼斯的虔诚、荣光与团结。在诸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马可节、圣诞节和每年一月底的圣母节等圣日，拉涅里·泽诺总督都会亲自主持仪式和游行活动，参加者来自全市各个教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活动当属泽诺总督将传统的水之祝福仪式转变成“与海成婚”。正如马丁·达·卡纳尔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所描述的那样，总督走出宫殿，穿过圣马可广场。在水边，“他找到自己的主船，带着所有随从登上船，然后自己划船出海。与总督大人同行的牧师为海水祈福，然后总督大人亲自将一枚金戒指抛入水中。之后，总督大人带着与出发时同样庄严、盛大的庆祝游行队伍原路返回”<sup>[6]</sup>。

在父亲和叔父离家远行前往东方期间，年轻的马可·波罗目睹了威尼斯的这些变化，而威尼斯这些隆重而壮观的场面将成为他衡量忽必烈宫廷的仪式盛大与否的标准。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当 1295 年波罗家族三人回



图 12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圣阿里皮奥门的马赛克壁画





图 13 威尼斯地图

到威尼斯时，这座城市的面貌已与尼科洛和马菲奥 1260 年左右离开时大不相同。当年他们离开时，波罗家族在圣塞韦罗教区（今卡斯泰洛区）拥有几处房产。回国后，他们在大运河东岸、里亚尔托市场对面和稍上游的圣乔万尼·格里索斯托莫教区（今卡纳雷吉欧区）购买了多处房产和土地（见图 13）。随着永久性木桥的建成（1264 年），运河上的商业越来越繁盛。1228 年建立的德国商馆是为了安置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商人而建，毗邻圣巴托洛梅奥教区，那里是香料商的聚居地。布商和金器商聚集在新铺设的梅尔契里埃大街。纺织品商人则聚集在圣乔万尼·格里索斯托莫教区。从亚洲回来后，波罗家族搬到了威尼斯商业活动的中心地带。

## ++ 比萨

对于如今的游客来说，比萨几乎就是斜塔的代名词，通常是佛罗伦萨一日游的目的地。但在 12 世纪中叶，西西里岛诺曼国王罗杰二世宫廷中的穆斯林学者阿尔·易德里斯（al-Idrīsī）却认为比萨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他在自己的地理汇编作品（非正式名称为《罗杰之书》（*Kitāb Rujār*））中这样写道：



图 14 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



它幅员辽阔，市场繁荣，建筑林立，地大物博，花园和果园众多，田连阡陌，其地位显赫，声名远播；其历史悠久，令人钦佩。其防御工事坚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古迹众多。比萨人拥有充足的船只和马匹，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发动海上远征和攻击其他地方的准备。这座城市位于一条来自伦巴第山区的大河之滨，河岸上有无数磨坊和花园。<sup>[7]</sup>

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一样，比萨的繁荣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建立起来的。在11世纪与12世纪之交，比萨商人从十字军东征中获益，在新建立的十字军国家特别是安条克公国获得了贸易特权。1154年，比萨与法蒂玛王朝<sup>1</sup>签订了一项条约，获准在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从事商业活动。作为交换，比萨承诺不参与十字军对埃及的任何军事行动。然而，比萨的主要商业活动范围是地中海西部。从12世纪中叶开始，比萨与突尼斯（因其连接地中海东西部要道的战略位置以及控制通往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通道而具有重要地位）和安达卢斯（即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

---

1 法蒂玛王朝，909至1171年统治北非的伊斯兰王朝。——译者注

林统治者进行谈判，获得了巴伦西亚、德尼亚和塞维利亚等地的贸易特权。

海外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和繁荣在比萨的大教堂中得到了体现。如果说圣马可大教堂显示了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关系，那么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比萨罗马式”风格——底层的灰白色大理石拱廊、细长的圆柱和上层长廊——都在彰显着古罗马的特征（见图 14）。这座主教座堂的建造始于 11 世纪下半叶。到了 12 世纪下半叶，比萨人对大教堂进行了扩建，建造了两座独立的建筑：一座是洗礼堂（始建于 1153 年），另一座是钟楼——即著名的斜塔（始建于 1173 年）。

与圣马可大教堂一样，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也显示了城市对外扩张的胜利，只不过比前者更含蓄巧妙。教堂正立面左侧刻有两首诗，夸耀了比萨在几次军事掠夺中所获的战利品。比萨圣母升天教堂的东侧（见图 15），比萨狮鹫昂然矗立（见图 16），它是现存最大的 11 世纪伊斯兰地中海地区制造的兽形青铜雕像。与圣马可教堂的青铜四马雕像相比，它没有那么张扬，但同样代表了这座城市对地中海权力的渴望和势在必得。

比萨与北非和地中海的密切联系也体现在建筑上，特征之一就是装点 11 世纪教堂外墙的陶盘和陶碗（即巴齐尼）。



图 15 矗立在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上的青铜狮鹫



图 16 比萨大教堂博物馆的青铜狮鹫，约制作于 1000 至 1050 年（照片约摄于 1890 至 1900 年）

这些被镶嵌在屋脊线下假拱中的陶盘和陶碗，展现了该城伊斯兰贸易伙伴的各类代表性陶器，比如突尼斯的绿褐色陶器（迄今为止数量最多）、埃及的虹彩陶器和西班牙的印花陶器等（见图 17）。当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陶器比拉丁欧洲的同类制品要精致得多，而将进口到比萨供普通家庭使用的陶盘和陶碗作为建筑装饰物，镶嵌在比萨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外墙上，远比镶嵌大理石圆形浮雕更加经济实惠。

比萨与地中海地区的联系对中世纪拉丁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来自比萨的莱昂纳多·皮萨诺（Leonardo Pisano），亦称斐波那契（Fibonacci）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莱昂纳多出身比萨的商人精英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贝贾亚（今属阿尔及利亚）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抄写员”（即公证员和外交官）。贝贾亚拥有受保护的港口，其统治者也十分支持商业贸易，因此贝贾亚是个商业中心，既出口当地内陆商品（生羊毛、皮革、羔羊皮、明矾和蜡）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货物，同时也进口佛兰德斯地区、法国和意大利的商品，以及从南亚和东南亚经亚历山大港等港口转运来的各类物资，其中就包括香料、巴拉斯红宝石<sup>1</sup>等极具亚洲特色的珍

---

1 巴拉斯红宝石是古代中亚和东南亚部分矿山盛产的块头很大的尖晶石，由于其与红宝石极为相似，便被误认为是红宝石。“巴拉斯”是地名，可能为阿富汗或斯里兰卡某地的旧称。——译者注



图 17 比萨圣西斯托教堂上的巴齐尼陶器

贵物品。但年轻的莱昂纳多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不仅仅是海外贸易的日常琐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父亲在远离故乡的贝贾亚海关工作，为经常聚集在那里的比萨商人服务。因此，在我年少时，他就将我接到身边，希望为我找到一个能学以致用且生活舒适的职业。他希望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sup>[8]</sup>

莱昂纳多便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北非港口，学习由 9 世纪波斯数学家阿尔·花刺子模（al-Khwarizmi）开创的实用代

数,“算法”一词就是以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sup>1</sup>。根据自身经验,莱昂纳多写成了《计算之书》(*Liber Abaci*)。该书的初稿完成于1202年,并在1228年进行了修订,以呈献给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占星家、哲学家和博学者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计算之书》因其对代数和实用数学的开创性应用而被世人铭记,它清楚地反映了商人的利益,并且重点关注货币兑换与换算、度量衡、船只装载和价格计算等问题。书中有大量以贝贾亚的核心贸易商品为背景的代数应用题,例如:“一百张山羊皮价值四十二又四分之三个拜赞特<sup>2</sup>,那么二十一张山羊皮值多少个拜赞特?”“已知一坎塔尔<sup>3</sup>明矾的重量相当于两坎塔尔皮革,那么装船的最佳方案是什么?”<sup>[9]</sup>书中提到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粗斜纹布、比萨奶酪、胡椒、藏红花、肉豆蔻、棉花、亚麻布、谷物、油、糖和明矾等。同理,我们不难想象,在莱昂纳多去世七八十年后,年轻的马可·波罗也曾为类似的问题伤脑筋呢。

---

1 算法的英文“algorithm”与阿尔·花剌子模的拉丁语译名“Algorismus”读音相似。——译者注

2 拜赞特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标准金币“索利都斯”在西方的通用名称。——译者注

3 坎塔尔,穆斯林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其具体重量因地区而异。但此处可能借用为容积单位。——译者注

## ++ 热那亚

如果说威尼斯是建在潟湖的无数岛屿之上，那么热那亚则是挤在亚平宁山脉利古里亚段的陡坡上。因此，对热那亚人来说，出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 13 世纪与 14 世纪之交，当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被囚禁在热那亚时，一位无名的热那亚诗人曾这样描写他的同胞：

热那亚人可真多啊！

遍布全世界，以至于无论走到哪里，停留在哪里，  
都能创造出另一个热那亚。<sup>[10]</sup>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热那亚被 12 世纪的城墙包围，并被划分成由多利亚和格里马尔迪等大家族统治的多个街区。城市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宏伟程度均比不上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和比萨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但在 1260 年，作为对海滨区域进行改造的一部分，一座新的公共宫殿——圣乔治宫建造完成并投入使用。1295 年（也就是波罗家族三人回到威尼斯的那一年），圣洛伦佐大教堂在派系斗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后于 14 世纪重建，其哥特式风格至今仍清晰可见。

与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热那亚也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崛起的地中海强国。热那亚利用其在十字军港口阿卡获得的商业特权，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网，其中包括印度洋贸易海上航线的终点站亚历山大港。与此同时，热那亚商人也在向地中海西部扩张，与安达卢西亚和北非建立贸易关系。为了争夺这些利润丰厚的商路，热那亚人与东部的威尼斯人和西部的比萨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热那亚人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好斗的坏名声。阿尔·易德里斯在《罗杰之书》中将热那亚人描述为“富有的商人（他们）海陆并进开展贸易，无论易事难事皆能胜任……他们精通兵法和治国之道。在基督徒中，他们最负盛名”<sup>[1]</sup>。热那亚人天生是无畏的水手，他们勇于冒险，越过海格力斯之柱<sup>1</sup>进入大西洋，并于1277年开辟了通往佛兰德斯的海上航线，次年又开辟了通往英格兰的海上航线。1291年（即波罗家族三人启程回国的那一年），来自热那亚的两兄弟乌戈利诺·维瓦尔第（Ugolino Vivaldi）和瓦迪诺·维瓦尔第（Vadino Vivaldi）向西驶入大西洋（船上有两名方济各会修士），试图抵达印度——为两个世纪后瓦斯

---

1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将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耸立的海岬称为海格力斯之柱（或赫拉克勒斯之柱）。它们被看作是已知世界的尽头，越过它们便是大西洋，而大西洋则是未知领域。——译者注

科·达·伽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远航埋下伏笔。然而，遗憾的是，两兄弟出发后便再无音信。

与此同时，13 世纪下半叶，欧洲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革。13 世纪 50 年代末，在所谓圣萨巴斯战争中，威尼斯人将热那亚人从亚洲陆上贸易路线的终点阿卡港驱逐出去，从而使热那亚在十字军王国的贸易额急剧减少，留守在十字军王国的热那亚商人也变得寥寥无几。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尼西亚帝国于 1261 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将威尼斯人之前享有的贸易特权——最重要的是包括进入黑海通道的特权——转给了热那亚人。为了纪念这一命运的转变，热那亚人将从君士坦丁堡运来的石块镶嵌到当时正在修建的圣乔治宫上。13 世纪 70 年代，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建立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心，从事粮食、蜂蜡、毛皮和咸鱼等当地产品的贸易，同时将奴隶贩卖到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拉丁欧洲。与此同时，当蒙古人在波斯确立统治后，热那亚人便积极与伊儿汗国（其统治者为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的后裔）建立政治和外交关系。13 世纪 80 年代，大批意大利人聚集在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其中最突出、最显眼的就是热那亚人。1289 年，一位名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 of Gisolfé）的热那亚商

人，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递交了伊儿汗国阿鲁浑<sup>1</sup>的信件，信中提议结盟以对抗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但未实现）——这是巴斯卡勒尔多次作为官方使节出使西方的其中一次。到了1290年，已有数百名热那亚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为阿鲁浑建造船只，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也提到了热那亚商人在里海的航行（第23章）。

热那亚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在他的《热那亚城纪事》中宣称“现在”是“（热那亚）无与伦比的时代”，并将热那亚的卓越地位追溯到1133年，因为就在那一年，热那亚被提升为大主教区。从那时起，“它的财富和荣耀大大增加”，以至于“它的辉煌和强盛已经比肩甚至超过那些国王、萨拉森人<sup>2</sup>、威尼斯人的城市以及比萨人的城市”。<sup>[12]</sup>事实上，13世纪下半叶，热那亚在各种战斗中屡战屡胜。1284年，因争夺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热那亚与比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热那亚在托斯卡纳海岸外的梅洛里亚海战中取得了胜利。正如雅各布·达·瓦拉金后来描述这次“伟

---

1 阿鲁浑是伊儿汗国的第四任君主，1284至1291年在位。——译者注

2 萨拉森人，中世纪基督教民族对一些东方民族的称呼。源于阿拉伯语的“东方人”（Sharqiyun），罗马时代原用以指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沙漠游牧民族，后泛指阿拉伯半岛居民。——译者注

大胜利”时所说：“从那时起，热那亚人便总以此事来羞辱和压制比萨人，以至于直到今天（1296年），他们还把自己的战船停在港口，禁止其他船只进入。”<sup>[13]</sup>1290年，热那亚人摧毁了比萨的港口，抢走了之前保护港口不受敌船攻击而设置的铁链，并将铁链残段作为战利品悬挂在热那亚的各个角落：城门上、圣乔治宫的正立面以及附近各个教堂的外墙上，其中包括奥贝托·多利亚（Oberto Doria）的家族教堂圣玛窦教堂（见图18）。奥贝托·多利亚是指挥梅洛里亚海战的海军将领。

1287年，一位名为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sup>1</sup>教士，作为伊儿汗国阿鲁浑的使节，带着给教皇以及法国和英国国王的信件路过热那亚。他受到了“一大群人”的热烈欢迎，这些人将他护送至圣洛伦佐大教堂，并特意向他展示存在教堂里的圣物。其中包括装有该城守护圣人——施洗者圣约翰骨灰的银棺，这是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那亚人于1099年返航时，从迈拉（安纳托利亚南海岸）劫掠而来的。还有一个六边形的半透明绿碗，他们向拉班·扫马解释道，这是“我们的主与他的门徒一起共进逾越节晚餐时用

---

1 聂斯脱利派是5世纪由聂斯脱利创立的基督教教派。——译者注



图 18 热那亚圣玛窦教堂

的器皿……是耶路撒冷被攻陷时（1099 年）被带到这里的”<sup>[14]</sup>。有趣的是，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对这件文物的来历始终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如今这件文物仍被收藏在圣洛伦佐大教堂的珍宝博物馆中，并被称为圣卡蒂诺（圣杯，见图 19）。



图 19 约 1 世纪的圣卡蒂诺（玻璃圣杯），现藏于热那亚圣洛伦佐大教堂的珍宝博物馆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能绝对地断言它是圣物，也不能顽固地否认它是圣物。因此，对于任何愿意相信它是圣物的人，我们都不能因其可笑而与之争论；对于任何不愿意相信它是圣物的人，我们也不能因其轻率鲁莽而对其指责。

在雅各布看来，这件器皿——如今被确认为由玻璃制成，可能源于伊斯兰地区——反而证明了神之力优于人之技艺，“因为以这种方式制作的东西完美无瑕，以至于自然和人类技艺都无法企及”<sup>[15]</sup>。

我们不知道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作为俘虏被带到热那亚的确切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受到的待遇与拉班·扫马截然不同。他们很可能看到了热那亚人战胜他们的家乡后夺来的战利品——尤其是悬挂在热那亚城门和圣乔治宫上的比萨港口的铁链残段。1291年，最初作为热那亚共和国政府大楼的圣乔治宫被改建成了热那亚的海关大楼，也许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被囚禁的地方。如果允许他们参观圣洛伦佐大教堂，他们就会看到那幅华丽的纪念热那亚-拜占庭联盟的丝绸刺绣图（与施洗者圣约翰的骨灰和圣卡蒂



图 20 尼姆菲翁的圣劳伦斯生平刺绣图，创作于 1261 年

诺一同保存)。该联盟是根据 1261 年签订的《尼姆菲翁<sup>1</sup> 条约》( *Treaty of Nymphaeum* ) 缔结的，《尼姆菲翁条约》是政治结盟重组的一部分，最终导致威尼斯人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使热那亚人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黑海贸易权。对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来说，尤其令人感伤的是丝绸刺绣图中描绘的圣劳伦

1 尼姆菲翁是尼西亚帝国的皇宫和朝廷所在地。——译者注



斯被囚禁的三个场景（描绘圣劳伦斯生平和殉道的场景共有二十个，见图 20）。战争的不幸将这两人带到热那亚，当时正值热那亚最繁荣的三十年，甚至连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撰写《寰宇记》的同一年去世）都夸口说：“热那亚为意大利人提供了最慷慨的服务，因为其市民从海外运来货物，并将货物与其他城市分享。”<sup>[16]</sup>

1298 年 9 月，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库尔佐拉岛附近爆发

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马可·波罗在海战中被热那亚军队俘虏。据《热那亚城纪事》的匿名续篇记载，在这场海战中，约有 7000 名威尼斯人丧生，而被俘的 8000 人中，大部分被押往热那亚城。第二年，热那亚人“在米兰（统治者）的……敦促下，出于仁慈之心，也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福佑”，与威尼斯讲和，释放了所有的威尼斯俘虏。不久之后，热那亚又与比萨达成和平协议，随后也释放了比萨的俘虏。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大概就是因此才得以重返家园的吧。<sup>[17]</sup>



## 互联互通的世界

为后世所景仰的圣方济各（见图 21）于 1226 年在阿西西去世，与其同时代的伟大的蒙古帝国创建者成吉思汗（见图 22）于 1227 年在征战中去世，两位举世闻名的人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随着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行动，这种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帝国。1237 年，成吉思汗的第三代继承人向东欧发动了一场战争，于 1240 年攻占了基辅，并向西挺进，席卷了波兰和匈牙利。正如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图 21 乔托的木板蛋彩金箔画《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领受圣痕》，约创作于 1300 至 1325 年



图 22 绢本设色《成吉思汗》，作者不详，创作于 1294 年

Paris) 的名著《大编年史》( *Chronica majora* ) 中所记载的,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的入侵, 来自哥特兰岛<sup>1</sup>和弗里斯兰<sup>2</sup>的船队无法正常前往雅茅斯, 这严重影响了英格兰东海岸的鲱鱼价格。然而, 在圣方济各逝世二十年后, 他的追随者之一柏朗嘉宾在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授意下, 于 1245 至 1247 年前往蒙古首都, 恰好见证了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被拥立为大汗。几年后( 1253—1255 ), 另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 代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1226 至 1270 年在位 ) 前往贵由的继任者蒙哥( 1251 至 1259 年在位 ) 的宫廷。两人都用拉丁文为各自的赞助人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 记录了他们的旅程和经历, 其中包括对蒙古人的大量描述。到 1254 年马可·波罗出生时, 拉丁欧洲和蒙古亚洲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体。

马可·波罗出生后的十年间, 蒙古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政治变动。1258 年, 蒙古人征服了巴格达, 结束了阿拔斯王朝<sup>3</sup>长达五百多年的统治。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以“伊儿汗”的身份建立政权——“伊儿汗”意为“从属的汗”, 正

---

1 哥特兰岛是瑞典及波罗的海最大的岛屿。——译者注

2 弗里斯兰位于今荷兰北部。——译者注

3 阿拔斯王朝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 定都巴格达。中国古代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译者注

如我们所知，身居可汗之位的先是他的长兄蒙哥，后来是蒙哥的继任者忽必烈。13 世纪 50 年代，地中海东部的穆斯林统治区域也陷入政治动荡。阿尤布王朝——由 12 世纪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后裔统治——在 1248 至 1254 年艰难地经受住了路易九世领导的十字军东征<sup>1</sup>的攻击之后，最终被马穆鲁克王朝取代。马穆鲁克王朝的奴隶兵一直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直到 1517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政治格局的重组对威尼斯、热那亚和其他拉丁基督教贸易强国的商人来说影响甚大，因为这威胁到他们进入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的机会，而亚历山大港是通往印度的两条主要海上航线之一的西端终点站，也是香料和其他来自东方的珍贵商品的转口港。1260 年，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斯（Baybars）在艾因·贾鲁战役中击败蒙古军队，标志着蒙古在中东扩张的西进攻势止步于此。

与此同时，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征服占领的领土，名义上是由一个大汗统治，但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四大汗国。13 世纪 30 年代末期征战中征服的广袤西北地区，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统治，这些地区就是今天我们所说

---

1 这里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译者注

的金帐汗国<sup>1</sup>（即马可·波罗笔下的“西方鞑靼”）。正是这些土地——包括黑海以北、今乌克兰的广袤草原，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以北的东欧——吸引了波罗家族两兄弟的目光，促成了他们于1260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首次东行（《寰宇记》第2章至第3章）。旭烈兀征服阿拔斯王朝后建立了伊儿汗国（即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鞑靼”），并以首都大不里士为中枢，控制着波斯的核心地带，其影响力向西延伸至安纳托利亚。伊儿汗国经常与金帐汗国争夺两国交界处的宝贵牧场和贸易路线（第222章至第227章）。正是这一冲突，阻碍了波罗家族两兄弟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行程，导致他们继续东行，最后在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布哈拉<sup>2</sup>登陆（第3章至第4章）。在波罗家族旅居亚洲期间，伊儿汗国一直是忽必烈的元朝最可靠的盟友。尽管相隔遥远，两国朝廷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派遣顾问和技术专家，从而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并影响了两国的艺术和手工艺。中亚的核心地带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统治，他们常年与忽必烈的元朝和伊儿汗国不和（忽必烈和旭烈兀都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察合台汗国控制着与古丝绸

---

1 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因汗国统治者的帐顶为金色，故名。——译者注

2 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9至10世纪为萨曼王朝首都，1220年被成吉思汗入侵，1370年被帖木儿征服。——译者注

之路相关的崎岖土地，此汗国的蒙古人最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同族——拖雷的后裔们逐渐适应了其统治下的定居大帝国的农耕文化。这些汗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地区性冲突，扰乱了中亚的陆路交通。这也是13世纪90年代初忽必烈派使团前往伊儿汗国——给了波罗家族三人返回威尼斯的机会——选择经由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上路线的原因之一（第19章）。

然而，在蒙古的几个汗国中，最重要、最强大的无疑是忽必烈所统治的汗国。忽必烈于1260年接替其兄长蒙哥成为大汗。今天，我们常常把马可·波罗在东方的游历等同于他发现“中国”的过程。不过，在《寰宇记》中，马可·波罗将大汗的土地分为“契丹”<sup>1</sup>和“蛮子省”<sup>2</sup>两部分。“契丹”是指蒙古人于1234年从金国手中夺取的土地，而“蛮子省”则指南宋统治的疆域。直到1279年，蒙古人才最终征服南宋（波罗家族三人于1275年到达蒙古）。通过这次征服，蒙

---

1 由于契丹势力庞大，统治中国北方约两百年，蒙古人便将中国北方称为“契丹”。蒙古人统治下的地区以及与这些地区有交往的国度，都已习惯用“契丹”来称当时的中国。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沿用了这一惯称。——译者注

2 蛮子是金国人对南宋政权的蔑称，后被蒙古统治者沿用。蒙古统治者把中国南方统称为蛮子，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沿用了这一惯称。——译者注

古人建立了一个数百年来空前庞大的帝国。按照中国的传统，忽必烈采用“元”作为国号，建立了元朝。该王朝一直延续到 1368 年，之后被明朝取代，而明朝统治中国直至 1644 年。

成吉思汗及其直系继承者窝阔台（1229 至 1241 年在位）、贵由（1246 至 1248 年在位）和蒙哥（1251 至 1259 年在位）通过征服扩大帝国版图的同时，也调整统治结构，以便更好地利用从新臣服的土地和人口中获得的资源和生产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努力在自身的中央集权与从属汗国的汗和地区长官的离心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努力的措施包括窝阔台设立中书省（1231 年）来处理行政（而非军事）。如果我们想了解马可·波罗在效力于忽必烈朝廷期间可能担当的角色，最需要了解的是元朝的四等人制，即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三等级是原来金国的北方汉人，第四等级是 1279 年被征服的南宋汉人。而第二等级则被称为“色目人”<sup>1</sup>，主要由中亚和西亚人——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组成，负责履行帝国的许

---

1 色目人，元代划分的四等人之一。“色目”一词见于唐代，意为“各色名目”，亦将姓氏稀僻者称为“色目”。色目人来自西域及中国西北各族，其中包括哈刺鲁、钦察、唐兀、阿速、康里、畏吾儿、乃蛮、阿儿浑、撒耳柯思、斡罗思、汪古、怯失迷儿等。——译者注

多行政职能。在旅居亚洲的二十多年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以及叔父正是在这支由官僚、技术专家和外交官组成的多语言队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多语言的世界

在《寰宇记》的序言中，鲁斯蒂谦写道，二十岁左右的马可·波罗刚到蒙古宫廷时，“他学会了四种语言的读写”。其中一种自然是蒙古语，“他很快熟悉和掌握了鞑靼人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字，学得又快又好，简直令人惊叹”（第16章，第10页）。当然，除此之外，马可·波罗离开家乡时不仅会说他的母语——威尼斯语，而且可能至少还会说基本的拉丁语，或许还会说一点儿法语。他首先学会蒙古语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波罗家族两兄弟在第一次觐见忽必烈时，就“精通了鞑靼人的语言”（第7章，第5页），因此能够“犹如智者”般流利地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关于“教皇陛下、罗马教会以及拉丁人的习俗”。马可·波罗会说的其他三种语言究竟是什么，我们至今未能确切地得知。

蒙古帝国疆域辽阔，境内生活着各种定居和游牧民族，

因此帝国内通行多种语言，这既是客观必然，也是帝国政府的有意为之。虽然蒙古语是蒙古帝国的“官方”语言，但与其他前现代统治者一样，蒙古可汗们从未试图将自己的语言或文化强加给被征服的臣民，相反，他们雇用的口译员和笔译员来自当地知识分子、商人和其他多语种冒险家组成的官僚队伍。在伊儿汗国统治时期的波斯，宫廷历史学家拉施特丁<sup>1</sup>（Rashid al-Din）曾赞誉道，忽必烈的曾侄孙合赞<sup>2</sup>（其掌权之年正值波罗家族三人最终返回威尼斯之际）除了母语蒙古语外，还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印达维语、克什米尔语、藏语、汉语、法兰克语和其他多种语言”<sup>[18]</sup>。这一赞誉可能有几分拉施特丁对合赞奉承的成分，但他所列举的这些语言，既反映了中世纪世界对多语言的推崇，也解释了为何马可·波罗卓越的语言才能如此受到忽必烈的关注与青睐。

有一部珍贵的手稿记录了当时世界语言的复杂性，这就是《库曼语汇集》（*Codex Cumanicus*）。该手稿可能是由13世纪90年代克里米亚半岛的热那亚商人编纂的（当时波罗家

---

1 拉施特丁（1247—1318），蒙古伊儿汗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医学家。其主要学术贡献为奉合赞之命编纂了中古波斯历史文献《史集》，《史集》也是关于中世纪世界历史的百科全书。——译者注

2 合赞是伊儿汗国的第七位君主（1295至1304年在位），伊儿汗国第四位君主阿鲁浑的长子，文化水平极高。——译者注

族的三人正返回威尼斯，随后马可·波罗撰写了《寰宇记》），其中包含一份三种语言的词汇表：一种是带有意大利语特征的通俗拉丁语<sup>1</sup>；一种是简化的波斯语，当时是亚洲各地商人的通用语言；还有一种是库曼语，一种语法不太规范的突厥语，在13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蒙古人西征之前，它是曾在今乌克兰大草原上占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库曼语汇集》的开篇是语法部分（包括动词、副词、名词和代词的变格表），随后是按大致类别分类的词语：比如宗教词汇（上帝、天使、和平、慈善、天堂、地狱）；四大元素（水、土、火、气）；四种体液；时间表达（年、月、日、夜、祈祷时间、星期的名称、月份的名称）；五官；与天气和方位有关的术语；善、美、长寿和健康等品质类词语；各种香料词汇；与各种交易有关的词汇；有关颜色、宝石、身体部位、亲属称谓等的术语；与战争有关的词汇；与家庭、马匹有关的词汇；最后则是树木、鸟兽和各种食品的词汇等<sup>[19]</sup>。

---

1 通俗拉丁语又称民间拉丁语，是古典拉丁语在民间使用中演变出来的非正式口语，也是“罗曼语族”（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的源头。——译者注

## 描述世界

这让我们回想起 1298 年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和比萨的鲁斯蒂谦机缘巧合的合作。热那亚在梅洛里亚和其他战役中战胜了比萨，这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那就是他们对战俘的利用。由于许多俘虏都是抄写员，因此热那亚人便命这些人去抄写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文稿。其中最受欢迎的法文文稿是一些古代世界史文献，如《恺撒之前的古代史》（*Histoire ancienne jusqu'à César*）等，还有亚瑟王传奇——包括鲁斯蒂谦根据崔斯坦<sup>1</sup>（*Tristan*）传说汇编的亚瑟王传奇的最早版本。在监狱中完成的几份手抄本，其结尾处都有作者或抄写员所作的说明性注释。在这些注释中，抄写员写下自己的姓名，并表明自己是被热那亚俘虏的比萨人。在一个包含三部拉丁文道德论集的法文译本中，收录了某位抄写员用法语韵文写的一段哀切恳求，其内容是恳求读者向上帝祈祷，将他从监狱中解救出来，赐予他今生的自由和来世“天堂的荣光”<sup>[20]</sup>。想象一下被囚禁的比萨人在狱中辛勤制作手抄

---

1 崔斯坦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之一。——译者注

本的情景——其中许多手抄本都是用法语写的——这为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创作提供了生动的背景。



图 23 绢本彩绘《元世祖忽必烈画像》，由元代宫廷画师创作

# MARCO POLO



第二章

《大汗之书》

and  
HIS  
WORLD



现在，我想在这本书里向你们讲述当今大汗——忽必烈汗——的所有伟大功绩和非凡奇迹。在我们的语言里，“忽必烈汗”意为“世界的主宰、万王之王”。当然，他配得上这样的尊号，因为世人皆知，自人类始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有过如他一般的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广袤的土地和最多的财富——将来也不会有。

——《寰宇记》第76章，第67页

在中世纪，《寰宇记》又被称作《大汗之书》。所有被冠以《大汗之书》书名的法语手抄本都问世于马可·波罗去世之后，但因手抄本中有大量精美华丽的插图而成为现存中世纪版本中最著名的几部。其中一个手抄本版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皇家MS 19D1），是1336年左右特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制作的，当时这位国王正在为十字军东征做准备，但那次行动未能成行。在这部手抄本中，马可·波罗



图 24 马可·波罗《大汗之书》中的细密画，约创作于 1333 至 1340 年。该画描绘了波罗家族两兄弟尼科洛和马菲奥觐见拉丁帝国皇帝鲍德温二世、拜见牧首、乘船驶向黑海等场景

的文本前面有两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记载，后面是一些杂集，其中包括两篇游记、一篇关于十字军东征的专题论述、一部法国历史编年史的节选和一篇《圣经》的法语译本（见图 24）。



图 25 细密画《大汗的盛宴》，选自马可·波罗的《大汗之书》，约创作于 1338 至 1410 年

《大汗之书》的另一个版本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MS Bodl. 264)，制作于 15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其中的文本与“皇家 MS 19DI”大致相同，同样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奇事迹的记载（只不过一个是古法语版本，另一个是中古英语版本）。此版本中的插图也与“皇家 MS 19DI”中的插图位置相同，

但在构图和风格上与古法语的《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插图相似，从而使这两个文本在视觉和主题上保持了一致（见图 25）。

让我们回到《寰宇记》。引言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章节叙述了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领导下的蒙古崛起，并以民族志的方式（类似于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和威廉·鲁布鲁克的记述），描述了蒙古人在大草原上的生活。这部分是《寰宇记》的核心内容：介绍了忽必烈崛起为大汗的历史，描述了他的都城“汗八里”（今北京）以及那里举行盛大庆典的景象，然后记述了他“两都巡幸”<sup>1</sup>的路线，最后介绍了他的帝国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引起了欧洲读者的惊叹和好奇（第 76 章至第 104 章）。这些内容本身就非同小可。在中世纪的法国史诗和传奇中，人们推崇和赞颂英雄，并将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查理大帝、亚瑟王或其他历史或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是鲁斯蒂谦所遵循的传统。然而，在《寰宇记》中，作者并未将忽必烈与上述著名人物进行比较，而是认为

---

1 “两都巡幸”是由忽必烈正式确立的一种制度，即皇帝在两座都城之间巡回办公，目的是加强对草原和中原的统一管理。两都，是指元朝的大都和上都。大都即今北京，“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译者注

他独领风骚，在人类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忽必烈本人并不高大威猛：“他身量适中，不高不矮。筋肉四肢，匀称适宜。他的脸白里透红，色如玫瑰。他的眼睛黑亮有神，鼻子端正高挺，恰到好处。”（第82章，第72页）尽管他外表平和、相貌中等，但他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者，这也充分证明了《寰宇记》的第二个书名《大汗之书》名副其实。

1294年，也就是波罗家族三人回到威尼斯的前一年，忽必烈去世了，但这个消息迟迟没有传到西方，直到1298年，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撰书讲述这位大汗的事迹时，仍以为他还活着。与此同时，中国集画家、诗人、文学家于一身，博学多才的名人赵孟頫在一首题为《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的诗中纪念了这位伟大的统治者。

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  
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  
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  
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sup>[1]</sup>

在这短短几行字中，赵孟頫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大汗的

权力范围——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太平洋，并且说他“自古无”[即前无古人，与马可·波罗声称忽必烈是“自人类始祖亚当以来”（第76章，第67页）最伟大的统治者的说法是一致的]。不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赵孟頫明确提到了“秦汉”和“晋唐”，但作为被蒙古人征服的宋朝皇室的后裔，他在列举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如忽必烈伟大时，刻意略去了南宋的统治者。

是什么让这位大汗如此超迈古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强调“当今大汗的所有伟大功绩和非凡奇迹”（第76章，第67页）。忽必烈的功绩是战胜蒙古帝国内部的各个对手，以及对南宋的征服。那么，非凡奇迹指什么？在中世纪，人们普遍对奇迹故事十分热衷和着迷，而且奇迹故事通常与超乎寻常的事情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在自然哲学、游记、传奇故事，尤其是记载圣徒和神圣人物神迹的传记等各种体裁中大量涌现。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中世纪晚期为马可·波罗的作品起的第三个名字——《奇迹之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并非因其作品中记载了许多自然和超自然的奇迹，而是因为作品中描述的蒙古帝国及其治理手段极其独特，与众不同，并且对西欧读者来说，这些内容都充满了异国情调，而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忽必烈这位大汗身上。



## 帝国的奇迹

蒙古人于 1237 年首次入侵东欧，他们所造成的恐慌传遍了整个拉丁西欧。当时在伦敦西北部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撰写作品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援引了呈给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报告，称蒙古人是“从北部山区突然出现”的“可怕种族”，说着陌生的语言，以生肉为食。<sup>[2]</sup>因此，从一开始，西欧人就戴着有色眼镜，把蒙古人与混乱、暴力、无序联系在一起。而拉丁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皆来源于《圣经》和古典作家的作品，所以他们对蒙古人一无所知。但很快，西方统治者便开始从亲历者的描述中了解到蒙古社会的严格秩序。13 世纪 40 年代，柏朗嘉宾对中亚游牧民族常用的十进制军事编制体系进行了详细说明：“十人为一队，称为‘十户’，其头领称为‘十夫长’（或‘十户长’）。十个十户为一个百户，其头领称为‘百夫长’（或‘百户长’）。”以此类推，直至万户。<sup>[3]</sup>13 世纪 50 年代，威廉·鲁布鲁克对金帐汗国的帐篷之城进行了描述。

当他们安营扎寨时，首领夫人会将其帐篷安置在

最西端，其他夫人则按照等级依次安置，因此最后一位夫人便将帐篷安置在最东端。诸位夫人的帐篷相隔一箭之地。<sup>[4]</sup>

在这种背景下，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蒙古人的许多奇迹之事，都与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对帝国的管理手段密不可分，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马可·波罗在蒙古帝国见到的最奇特的事情之一就是邮驿：这是蒙古帝国最为著名且特有的邮驿接力系统，它使蒙古人能够在其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迅速传递消息。这种邮驿接力系统在亚洲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中国的汉朝。但鉴于蒙古人征服的范围之广，其邮驿网络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在13世纪中叶编纂的、以口述实录为基础的叙事作品《蒙古秘史》中，大汗窝阔台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并明确指出“设立驿站，使我们的使臣迅速往返，并运送所需物品”，是他继承其父成吉思汗的汗位后，所做的四项功绩中的第二项。<sup>[5]</sup>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驿站由通政院主管，并且在大都和上都设有分支机构。此外，通政院还设有查验者，以监察驿政，盘查往来人员。据《元史》记载，到忽必烈统治末期，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设置了近1400处驿站，配备了约50000

匹马、1400头牛、6700头骡子、4000辆车、6000艘船、200只狗和1150只羊。

马可·波罗的描述为这份枯燥的官方统计增添了细节，使之更为生动。他写道，驿站遍布“通往各行省的所有主要道路”，每隔40至50公里（偏远地区则是每隔55至65公里）就设有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300至400匹马，这些马是从周边地区征调来的。在这里，信使们会发现“一座非常宽敞且美丽的宫殿”，里面配有“一张富丽堂皇的床，上面铺着上好的丝绸床单”，即便是王侯住在这里也能过得舒适无比。然后，马可·波罗又补充了一些“我忘了说的事情”：每隔3英里<sup>1</sup>就有一群步行信差，他们在指定的路段全速奔跑。他们的腰带上系着铃铛，以便让下一站的信差能从远处听见他们走近的声音，做好接力奔跑、递送信息或物品的准备。“容我告诉各位，通过这种方式……原本需要十天才能送达的消息，现在只需一天一夜就能传抵大汗……原本要花十天才能送到的特供水果，现在一天之内就能呈献到大汗面前。”（第98章，第89页至第90页）

---

1 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英译本，故保留英制单位。——译者注

尽管马可·波罗的叙述篇幅很长且内容详尽，但我们不能把他讲述的所有细节都当真。特别是在帝国较为偏远的地区，当地的情况（包括叛乱或蒙古各敌对派系之间的斗争）可能会破坏现有的邮驿路线——比如忽必烈的堂兄弟海都就“从未与大汗和平相处过，相反，一直在起兵发动叛乱”（第199章，第193页）。这促使忽必烈沿塔里木盆地的南侧边缘开辟了一条通往伊儿汗国（忽必烈唯一的盟友）的备用路线。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所指出的，马可·波罗描述的那种固定邮驿路线和常设驿站皆设在“主要政治中心附近、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和安全受到威胁的边境”。<sup>[6]</sup>或许这也是我们在读到马可·波罗对蒙古帝国大街和小巷的精彩描述时，应该了解的一些背景。

你们要知道，大汗已经下令在供信使、商人及旅者通行的主要道路两旁种植树木，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超过两步。容我告诉各位，这些树木十分高大，远远就能看到。大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每个在旅途中的人都能看清道路，不至于迷路：因为你会在偏僻的地方找到这些树——这对行商和贩卖货物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帮助。这个办法适用于所有行省和汗国的统治者。（第100章，

元朝政府并没有在“大陆和大草原中心”的其他地方设立固定的驿站。邮驿传递的安排要更为灵活，临时性也更强。因此，邮驿系统通常被认为是蒙古帝国的标志，即使在政治解体时期，它也被视为“游牧民族”后勤管理的重要一环。<sup>[7]</sup> 尽管如此，在马可·波罗看来，这个由骑手、马匹和各种资源组成的邮驿网络，依然“十分奇妙，令人惊叹，且价值巨大，难以描述和书写”（第 98 章，第 89 页）。

忽必烈帝国的另一个奇迹是“大汗的纸币发行制”。马可·波罗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奇迹，开头便颇具神秘感：“汗八里有一个大汗的造币厂。大汗对造币厂的秘密了如指掌，我这就给大家揭秘。”（第 96 章，第 86 页）他所说的“造币厂”，原书用的单词是“secque”，这是威尼斯语“zecca”（本身源自阿拉伯语“sikka”）的古法语音译，意为铸币的模具。但是，马可·波罗接下来描述的“秘密”与威尼斯的硬币铸造大相径庭。

大汗制造纸币的方法如下：取树皮——桑树的树皮（桑叶用于养蚕）——并剥下树皮和树干之间的一层薄皮，

然后用这种内皮做成像纸张一样的各种面额的纸币，不过这些纸币都是黑色的。纸币做成之后，大汗让人将其裁成不同大小，面额也各不相同。最小的纸币，其面值相当于半个托内塞洛银币，稍大一点的值一个托内塞洛银币，再大一点的值半个威尼斯格罗索银币。另有几种纸币分别价值两个格罗索、五个格罗索、十个格罗索，以及一个拜赞特、三个拜赞特、十个拜赞特。（第96章，第86页至第87页）

马可·波罗在《寰宇记》的其他地方曾两次提到桑树与丝绸生产的关系（第107章，第94页；第111章，第97页）。在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许多西方人都知道蚕以桑叶为食，因此尽管这是马可·波罗第一次提到桑树，但他只是一笔带过，转而着重讲述纸币这一无比神奇的事物。即使是简单介绍，这些内容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首先，直到13世纪末，意大利才开始生产纸张（1282年，马尔凯大区安科纳省的法布里亚诺镇率先使用了水印），但这种纸张不是用树皮而是用破布制成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使用的货币当然还是金属硬币。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托内塞洛”是威尼斯对“图尔德涅尔”的称呼，后



图 26 洛伦佐·提埃波罗总督执政时期（1268 至 1275 年在任）的威尼斯格罗索银币

者是希腊大陆的法兰克诸公国<sup>1</sup>使用的一种含银量为 20% 的银币。威尼斯于 1353 年开始铸造自己的“托内塞洛”银币。格罗索是 12 世纪末开始铸造的一种大额银币（见图 26）。拜赞特则是拜占庭超纯金币的名称，这种金币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流通，并在法兰克希腊充当记账货币。在马可·波罗外出游历期间，威尼斯于 1284 年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但马可·波

---

1 1204 年，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西欧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随后，西欧封建领主在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一系列领地，这些领地便是希腊大陆的法兰克诸公国，也称“法兰克希腊”。——译者注

罗仍将旧货币作为参照标准。

纸币并非蒙古人首创，元朝之前的朝代——宋朝和金朝，都曾使用过纸币（其中金朝是为了应对铜钱铸造原料短缺的情况）。忽必烈的前任大汗兼兄长蒙哥曾于 1253 年设立交钞提举司，负责管理纸币的印刷和发行。忽必烈继位后，新设户部（这是他新设立的六部之一），将纸币的流通范围空前扩大。在他统治期间，纸币的发行制度和主管机构均经历了多次调整。元朝的纸币上印有汉字（见图 27），并附有部分音译转写的“八思巴字”（一种新的文字，是忽必烈为记录帝国所有语言而专门设计的，并以其创造者吐蕃喇嘛八思巴的名字命名），这是蒙古人显示其统治权威的视觉标志。除了纸币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马可·波罗还强调了它的物理特性。“容我再告诉各位，”他说，“价值十个拜赞特的纸币比一个拜赞特的硬币轻得多。”这种纸币十分便于携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中国，人们通常使用“一贯一贯”的方孔硬币，比纸币要重得多。但是，纸张的耐用性要差得多，因此在流通过程中经常被撕破或损坏。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将破损的纸币拿到造币厂，将其兑换成新的纸币”，只需付被兑换纸币价值的 3% 的手续费。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纸币的作用是控制整个忽必烈



图 27 元朝的纸币

帝国的商品和货物的流动。

当这些纸币按照以上所描述的方式制作好之后，就可用来支付一切费用，并被分发到大汗统治下的所有国土，包括各行省、汗国和土地。没人敢拒绝使用这些纸币，否则就会丢掉性命。容我再告诉各位，大汗统治下的百姓都愿意使用这种纸币，因为他们可以用其购买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所有人都用我所描述的纸币进行交易。（第96章，第87页）

在整部《寰宇记》中，鲁斯蒂谦多次使用“容我告诉各位”“容我再告诉各位”等短语。这些短语的作用与现代排版中的斜体字相同，用来表示强调或感叹，同时也表示提请读者注意，或对有可能引起中世纪读者怀疑的地方郑重声明其真实性。在上述引文中，有两点令人难以置信：第一，这种纸币在忽必烈统治下的“所有国土，包括各行省、汗国和土地”都通用，与当时西欧使用种类繁多的货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这些纸币可以用来交易“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违者将被处死。

事实证明，纸币的流通仅是确保货物向忽必烈帝国中心汇聚的整体机制中的一环。马可·波罗还描述道，根据法令，商人们每年应多次将“珍珠、宝石、黄金、白银和其他物品（即金线织物和丝绸）”交由大汗指定的专家“十二智者”进行估价，以换取纸币。这些物品的价值每年高达“四十万个拜赞特”。商人们则“欣然接受这些纸币，并用它们在大汗的所有土地上购买所有东西”，而忽必烈则从他的所有国土中获取所有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宝石。不过，马可·波罗接下来的叙述很快化解了读者因大汗的垄断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安或不满：“如果一个人想买金银来制作餐具、腰带或其他物品，他可以持纸币去大汗的造币厂，用纸币从造币厂换取黄金和白银。”（第96章、第87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所造成的恐慌与破坏比他们的有序统治更为人所知。马可·波罗在描述巴尔赫（位于今阿富汗境内）这个“宏伟且高贵的城市”时指出，“这座城市过去要比现在宏伟且华美得多，但因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的侵袭，许多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遭到大肆破坏”。许多华丽的宫殿和用大理石建造的房屋“如今仍在，但已是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第45章、第36页）。在这里，他所用的古法语词汇“gasté”和“gastee”（意为“荒废”和“遗

奔”），令人联想到 12、13 世纪圣杯传说中帕西瓦尔<sup>1</sup>故事里的“荒芜之地”（T.S. 艾略特于 1922 年创作的著名诗作《荒原》将这一意象推向顶峰）。因此，在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统治的描述中，我们未必会期待看到题为“大汗如何救济需要粮食和牲畜的百姓”的章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的确是《寰宇记》中的一章，而且开头就明确写道：

容我告诉各位，大汗每年都会派遣使者到其统治的所有领土、汗国和省份去考察，向百姓询问粮食是否因天气恶劣、蝗虫肆虐或瘟疫等其他天灾人祸造成歉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致使他的子民遭受损失，颗粒无收，他不但不会征收这些百姓当年应缴的赋税，反而会从他的储备粮库中拿出一部分来，免费发放给百姓，作为他们的口粮和种子。这真的是大汗体恤百姓、为国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第 99 章，第 91 页）

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在后续章节中再次提及此事，

---

1 帕西瓦尔是亚瑟王传奇中最著名的圆桌骑士之一，以追寻圣杯的核心事迹而闻名。——译者注

并详尽补充了这一粮食分配系统的具体细节和物资分发方式，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容我告诉各位，当大汗看到粮食丰收且价格不高时，就会下令各行省大量收购，然后将之存放在粮仓里，并保管得十分细致，确保三四年后也不会变质。各位要知道，大汗储存了几乎所有种类的谷物，包括小麦、大麦、小米、大米、黍米和其他谷物，而且存量极多。（第103章，第92页）

鲁斯蒂谦再次用“容我告诉各位”和“各位要知道”一类表示强调的表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同寻常。元大都的粮仓布局颇具战略意义：一处位于皇城的东南角与外城墙之间（靠近中书省），其他几处则沿着大都的东城墙，位于崇仁门和齐化门之间。在丰年时储备如此大量的粮食，大汗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若一斛谷物——我说的是小麦——市价卖一个拜赞特，他就给四个拜赞特。”他的仁慈和恩德远播四海：“这样人人都能吃饱，丰衣足食……他对他所统治的国土上的所有百姓都是如此。”（第103章，第92页）尽管这些政策措施旨在施惠于整个蒙古帝国的子民，但忽必烈对汗八里的百姓尤为关注。

凡向官府求取粮食者，无一遭到拒绝……每天前来求取的有三千多人……大汗如此体恤和救济贫苦百姓，其善举令子民万般敬仰，他们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敬拜。（第104章，第92页）

忽必烈对农业资源和生产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以民为本、为满足百姓需求而灵活变通的治国之道。在蒙古人从草原战士转变为帝国统治者、定居安邦的早期阶段，农业并不那么重要。据《元史》记载，最初对元大都的规划是将城墙外的区域皆划为牧场，用于放养蒙古骑兵和邮驿所需的无数马匹。但是，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卒于1281年）出面干预，要求尊重和保留已经分配给当地农民的土地，因为中国民众依赖农民种的庄稼。忽必烈观念的转变以及他对土地分配制度的重新部署，可谓恰逢其时。忽必烈在位时，全球正处于“小冰河”时期的初期，气候寒冷，灾害性天气频发。这种严寒气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始于13世纪80年代，1295年开始泛滥，进入14世纪后，几乎每年都会暴发洪水。1268至1272年，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饥荒。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的读者应该对大汗的慷慨解囊深有感触，因为大约从1270年开始，西方的农业产量开始

下降，导致 14 世纪初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饥荒。

在精心管理帝国农业资源的同时，忽必烈没有忘记牧民的需求。马可·波罗在描述蒙古帝国收集和重新分配剩余粮食的后勤工作时明确指出：“他在夏天这样做。到了冬天，他同样会对那些以牲畜为生的牧民施以援手。如果发现有人牲畜得病死了，他就会赐给他们一些牲畜以作赈济，并免除他们当年的赋税。正如我告诉各位的，伟大的大汗就是这样帮助和支持他的子民的。”（第 99 章，第 91 页）

总之，马可·波罗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忽必烈为确保其治下汉族农耕者和游牧部众的福祉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蒙古帝国统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 三城记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讲述了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三座城市，让读者对 13 世纪的欧洲有了更详细生动的了解。现在，我们转向世界的另一端，将聚光灯投向中国元朝的三大都市：忽必烈的都城汗八里（今北京）、曾为南宋都城

的行在<sup>1</sup>（今杭州）和中国南海边的大港口刺桐（今泉州）。这三座城市的规模之大，超乎西方人的想象，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寰宇记》中描述的大多数奇观——这反而彰显出蒙古帝国大汗的伟大。

## ++ 汗八里

13 世纪 70 年代中期，波罗家族三人第一次来到汗八里（元大都）时，这座城市还在建设之中。蒙古人之前的首都喀拉和林<sup>2</sup>位于贝加尔湖以南的蒙古草原上，而上都——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up>3</sup>（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歌中的“世外桃源”（Xanadu）——位于元大都正北约 350 公里处，是蒙

---

1 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将杭州记为“Quinsai”（“行在”的音译）。所谓“行在”，指的是“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杭州在南宋时期被称为“行在”（临时首都），而非正式的都城“京师”。尽管元朝时官方已将南宋故都临安改名为杭州，但马可·波罗仍沿用了旧称。——译者注

2 喀拉和林，又称“哈刺和林”。蒙古窝阔台七年（1235 年）建都于此。故址即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后将首都南迁，喀拉和林被改设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后被改为和宁路总管府。自元大德十一年（1307 年）后，喀拉和林被为和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皇庆元年（1312 年）后又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元亡后，北元又以此为政治中心。——译者注

3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诗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诗歌《忽必烈汗》是其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古人的夏都。1267年，忽必烈下令在辽国和金国的旧都中都遗址旁修建新的冬都。1272年，也就是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的第二年，大都开始动工建造。1274年，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建成。以下是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的开篇描述：

整个外墙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城墙，每个边都足有一英里长，也就是说，整个城墙共四英里长。城墙很厚，约有十步高，墙体都是白色的，上面有雉堞。城墙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座华美壮观、富丽堂皇的角楼，大汗的一切军需装备——弓、箭筒、马鞍、马辔等——都存放在这里。

城墙有三座朝南的城门，其中中间的城门最大，只有大汗出入时才会打开。大城门的两侧各有一座小城门，供其他人进出。另外，在城墙的两端附近各有一座大门，除大汗以外的其他人也可从那里进出。（第84章，第74页）

这种矩形的皇城设计，很显然是中国历代都城的典范，是以周朝首次明确提出的皇城设计规划为基础的。事实上，元大都由内向外依次环绕着多道城墙，墙外有墙，再外面还有墙。最里面的城墙环绕着忽必烈的宫城，宫城位于皇

城（比宫城更大的建筑群）的中部偏南，皇城中还包括一个人工湖以及皇太后和皇太子的宫殿。皇城则位于最外层城墙的南侧——这道城墙气势恢宏，四周环绕着护城河，由夯土筑成，周长近 30 千米，高 8 米，城墙底部宽 24 米，顶部宽 16 米。元大都共有 11 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城墙各三座，北面城墙两座），每座城门都通向一座横跨护城河的吊桥。城门之间由主干道连接，主干道的方向完全沿南北或东西轴线布置，宽约 25 米（相当于九辆马车并排的宽度）。主干道与辅道相交，辅道宽约 6~7 米。

想象这样一座城市会在年轻的马可·波罗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我们只需想想他的家乡——回顾我们之前引用的马丁·达·卡纳尔的描述：“从海中崛起，咸咸的海水流经这座城市，除了房屋和街道，流淌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处角落。”（亦见图 13）而西欧没有任何一座有城墙的城市能有如此壮观、气势恢宏的景象。比如，热那亚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创作《寰宇记》的地方，其 12 世纪的城墙一方面受沿海山脉的地形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大海的限制，不规则地蜿蜒在城市周围（见图 28），实在难以形成壮观之势。

对商人马可·波罗来说，虽然大都建筑雄伟、气势恢宏，但这座都城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贸易量之大和贸易种类之广。



图 28 热那亚的地图

容我实话告诉各位，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汇聚在汗八里，这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无法企及的……容我告诉各位，其中包括来自印度的珍奇宝物——如宝石、珍珠以及其他贵重之物，还有从契丹和其他各行省运来的所有珍贵物品。所有的稀世珍宝和贵重物品都源源不断

地运到这座城市，可谓举世罕见。在这里交易的商品数不胜数。实话告诉各位，每天都有超过一千辆满载着丝绸的马车驶入这座城市，因为许多金丝织物和绸缎布料都产自这里。（第95章，第85页至第86页）

汗八里位于通往北方草原和中原（通向南方）的战略要地，因此忽必烈特意将此地建设成蒙古帝国的枢纽。马可·波罗写道：“要知道，通往各行省的许多道路都是从汗八里出发的。也就是说，一条路通往这个行省，另一条路通往另一个行省。”（第98章，第89页）除了供旅者行走的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遍布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帝国都城的水路连通也确保了货物向帝都汇集：不仅因为汗八里靠近两条河流，还因为忽必烈的基础设施建设——重新修建和延长了大运河。这既便利了粮食的运输以养活帝国的众多人口，也促进了“珍贵宝石、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等商品的进口。这些商品都是通过与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被运送到中国南方各个港口的。

汗八里的矩形布局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帝国都城，其便利的水陆交通亦是帝国整体规划的一部分。该规划不仅限于此，还包括创制一种名为八思巴文的文字，旨在转写忽必烈

统治下帝国境内的多种语言。马可·波罗笔下流入皇城的奢侈品，与大汗从他所能掌控的最远之地搜罗来的各种动植物有着相似之处，即并不那么实用，而是更具象征意义。在皇城里，“有田野和美丽的树木，其间饲养着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如白鹿、麝、狍子、獐子、双色松鼠及其他漂亮的动物”。在苑林的西北角，他继续介绍道，“有一个很大的湖，湖里有各种各样的鱼，这些鱼都是当初大汗命人放养进去的。每当大汗想吃鱼了，他便让人直接从湖里打捞。”（第84章，第74页）最令人惊叹的是“青丘”<sup>1</sup>，那是一座人工建造的小山，“在宫殿北面约一箭之遥的地方”，山顶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殿，掩映在周围的绿树之中”。

青丘周围及山上栽满树木，这些树木四季常青，枝繁叶茂，从不凋零。容我告诉各位，只要大汗听说哪里有漂亮的树木，就会命人将其连根带土挖出来，然后用大象运到青丘上栽种……因此，世界上最美丽的树木都栽种在这座青丘之上。（第84章，第75页）

---

1 “青丘”很可能指的是元代皇家苑囿的核心景观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译者注

将通过法令征用或作为礼物和贡品收到的珍异之物汇集在一起，本身就是皇权至上的生动体现。例如，腓特烈二世（卒于1250年）在所建的巴勒莫动物园中，饲养了一只埃及苏丹送给他的长颈鹿。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曾为自己建了一个宝库（一部名为《珍宝奇物录》（*The Book of Gifts and Rarities*）的11世纪珍贵文献对宝库中的宝物进行了编目）。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贵族们的珍宝馆或珍品柜的前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忽必烈于青丘栽种珍稀树木这件事中，大象（在战争中被捕获的或作为贡品被献上的）被用作驮兽，而不是像马可·波罗在其他地方描述的那样，被帝王用作展示自身权威的道具。

重要的是，汗八里是忽必烈举行各种盛大典礼的地方，其中最隆重的当属农历正月举行的新年庆典。届时，宫廷里的所有人都身穿白衣，各行省的长官和藩属的统治者都纷纷给大汗进献“大量的黄金、白银、珍珠、宝石等珍贵礼物以及许多白色布匹”。成千上万匹白马被献给大汗，大象和骆驼披着华丽的刺绣，驮运着庆典所需的所有物品。“所有人依次从大汗面前走过，这旷世奇观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第89章，第70页）在一个精心编排的仪式中，所有在场的“王公、贵族、骑士、占星家、医生、驯鹰师以及其他

官员”都跪拜大汗，“把额头贴在地上……朝着大汗跪拜行礼，像敬神一样”（第89章，第79页）。随后，忽必烈接受宾客们的礼物和贡品，接着举行宴会（畅饮）和宫廷娱乐活动。之后，“每个人都尽兴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或家中”，以这样一种吉祥的方式迎来新年，并且继续得到大汗的恩宠。

## ++ 行在

杭州是一座花园城市，距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仅一小时高铁车程，在旅游资料中被誉为“东方威尼斯”。在13世纪，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sup>[8]</sup>南宋时，此地名为临安府。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逃亡到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政权，定都临安。自此，皇帝便驻跸于临安，并将临安称为“行在”，作为他收复北方（可惜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之前的“临时居所”。最初，这里风景如画的丘陵和水道为抵御北方入侵者提供了天然屏障，因为这些入侵者（例如——个世纪后的蒙古人）都是骑马作战的。在成为都城之前，杭州是中国与朝鲜、日本以及来自印度洋的波斯和阿拉伯的船只进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南宋定都于此之后，众多工匠和商人会聚而来，大批隶属于朝廷的士兵和官僚也随之而来，

致使当时杭州的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约有一百五十万。

同样的地形特征使杭州既风景如画，又兼具军事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杭州无法按照长安（今西安）等中国早期都城的传统方式布局成长方形网格（第 111 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传统布局方式最终被用在了忽必烈的新都汗八里。由于地形狭长，人口密度大，多层建筑随之大量涌现，整座城市楼宇林立，鳞次栉比。与中国早期都城规整封闭的街区不同，杭州与之前的北宋都城开封一样，街道宽阔，商店、饭馆、娱乐场所和各类市场星罗棋布。早在马可·波罗到来的两个世纪前，一位日本僧人曾到过杭州，并被夜市上成百上千、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宝所震撼。

某处挂着一排晶莹剔透的玻璃灯笼，足有二百多个……每家店铺前都挂着灯笼，有绿的、红的或白的，五彩缤纷。一些房屋楼宇上还装饰着镶有宝石的窗帘。女人们有的弹奏着古筝，有的吹奏着笛子，还有许多人戴着面具表演，他们的技艺十分高超。此外，人们还用水使各种玩偶跳舞、击鼓或喷水，他们的技艺实在精妙绝伦，我无法用语言一一描述<sup>[9]</sup>

马可·波罗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第152章，第133页）。

宋朝时，杭州不像广州或泉州（马可·波罗称其为“刺桐”）等其他大型贸易城市那样拥有庞大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群体。1276年蒙古征服南宋后，大量来自伊儿汗国的商人聚集在此地，其中主要是穆斯林。马可·波罗称这座城市为“Quinsai”，这个名字源自波斯语“Khinsai”，即汉语“行在”（临时首都）的音译。1281年，一座清真寺〔以及一座景教（聂斯脱利派）教堂〕在城南的前朝皇宫遗址附近建成，这里后来成为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中心。

13世纪的杭州和今天一样，其最大的特色是那片被称为西湖的水域（图29）。

容我再告诉各位，城南有一片湖泊，周长约为30英里。湖的四周有许多华丽的豪门宅邸和漂亮的房子，这些都是达官显贵的住所，雕梁画栋，华美至极。另外还有许多供偶像崇拜者礼拜的庙宇，数量非常之多。容我再告诉各位，湖中心有两座小岛，每座岛上都有一座精美华丽的房子，雕梁画栋，装饰华美，就像皇帝的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当本城居民要举行婚礼或其他豪华庆典



图 29 《咸淳临安志》里的木版印制地图《西湖图》

# 西湖圖

晉



时，他们就会在这两座岛上举行。他们举办婚礼或庆典时所需的一切东西——如盘、碗、碟等，一应俱全。（第152章，第134页）

南宋末年，一位名叫董嗣杲的小官员创作了一部风格新颖的诗集，名为《西湖百咏》。这部诗集基本上是一份环湖游览指南，它突破了中国园林诗歌的传统，重点描绘了诗人在西湖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并且表明在熙熙攘攘、社会多元化的都城中，西湖实际上是城市各类活动的中心。大约在同一时期，人们根据西湖景区的不同特色，选出西湖“十景”——这“十景”各有千秋，组合在一起又代表着西湖胜景精华，其中有些是特定季节的景色，有些是一天中某个时段的特有景色。

这“十景”分别为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和双峰插云。<sup>[10]</sup>

这十景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创作诗歌的灵感，至少有四本十景诗集流传下来，其中几本可以作为微型旅行日记。

西湖还激发了画家创作山水画的灵感，有时画家还会在画作上配上相应的诗句。13 世纪 70 年代末，蒙古征服南宋后，著名学者、博学多才的周密绘制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湖景画<sup>1</sup>，该画以杭州的建筑为背景，描绘了杭州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见图 30）。

西湖美景堪称天下第一，无论晨昏、晴雨，还是四季，皆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因此，杭州人一年四季都在湖上徜徉，或在湖边漫步。不过，春季游览西湖的人尤其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都城居民喜结良缘或辞旧迎新的场面，还可以看到全家团聚或举家送葬的场面，以及讨论经文或祭祀敬拜的场景。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官职任命或皇帝下旨赐下恩典、朝廷委派任务等场面。人们可以看到身居高位的宦官和地位显赫的官员、商人和权贵、春宵值千金的红粉佳人和挥霍无度的赌徒，还能看到痴男怨女以及秘密幽会和私通的男女。<sup>[1]</sup>

---

1 后文中图 30《西湖清趣图卷》的画者不详，并非作者所说的周密。——译者注



图 30 《西湖清趣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设色, 佚名, 创作于 14 世纪



如果说汗八里的标志是城墙，那么在马可·波罗眼中，行在的标志就是桥梁。

据说，行在城墙的周长约 100 英里，有 12000 座大小不等的石桥。每座桥，或者说大多数桥，都可以容大船从桥孔下轻松通过。其他较小的桥，也够小船通过。这座城市有这么多桥并不奇怪，因为容我告诉各位，这座城市建在水上，四周环水，所以为了全城通行，有这么多桥是很必要的。（第 152 章，第 133 页）

要充分了解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景观的印象，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他的故乡威尼斯。里亚尔托桥是如今威尼斯最具标志性的古迹之一，直到 16 世纪末才建成石桥。在此之前，威尼斯的运河上都是没有侧边护栏的木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不是马可·波罗最先留意到的桥梁。在对汗八里道路的描述中，他就提到过“一座非常漂亮的石桥”（见图 31）横跨在白利桑干河<sup>1</sup>上。

---

1 白利桑干河即永定河，上面的石桥即卢沟桥。——译者注



图 31 《卢沟运筏图》，绢本水墨设色，佚名，约创作于 1206 至 1368 年

你们要知道，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美的桥了。容我告诉各位，这座桥长三百步，宽八步，就算十名骑士骑马并行，也不会觉得狭窄难走。桥身有二十四个拱<sup>1</sup>，由二十五个桥墩支撑，桥拱与桥墩都由灰白色的大理石砌成，工艺高超，坚固无比。桥的两侧是由大理石板和大理石柱建成的护栏，具体细节我将描述给你们。桥头立着一根大理石柱，柱子下面有一只大理石狮子，柱子上面还有一只漂亮、高大、制作精美的狮子。离这根柱子一步半远的地方还有一根一模一样的柱子，柱子上也有两只狮子。在柱子和柱子之间，固定着一块灰色的大理石板，这样人们就不会掉进水里了。整座桥都是如此建造，真是精美绝伦。（第105章，第93页）

如今这座桥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从马可·波罗描述的篇幅和详尽程度来看，这座桥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不言而喻。

正如我们所知，临安是在13世纪70年代末蒙古人征服南宋之后，才归于忽必烈统治的。大约在此前五年抵达中

---

1 此处是误记或传抄错误。实际上，卢沟桥的拱洞数量是11个。——译者注

国北方的波罗家族三人亲眼见证了这一世界历史时刻，帝制中国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南宋都城临安无疑是忽必烈王冠上的璀璨明珠。紧随其后的是宏伟的刺桐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它。

### ✦ 刺桐

马可·波罗描述的中国第三大都市是刺桐（今泉州）。它位于台湾海峡西岸，是连接南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与陆路贸易（包括区域贸易和长途贸易）的重要商业枢纽。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港口，所有的印度船只都停靠于此，船上载满了各种商品和奢侈品，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石和大而圆润的珍珠。所有蛮子省的商人都会来到这个港口（蛮子省的商人几乎将整个港口包围了）。因此，大量的商品和宝石通过这个港口流入流出，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商品和宝石也同样通过这座城市和这里的港口运送到蛮子省。容我告诉各位，每有一船胡椒经由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运往基督教国家，就有一百船胡椒运到刺桐港，因为你们要知道，刺桐港是世界上商品进出口

量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第157章，第141页）

在更早的朝代，泉州曾受到那些企图逃避广州关税的不法商人的青睐。到了11世纪末，泉州取代广州成为海上贸易监管机构市舶司的所在地。西亚商人可以用自己的货物从官府仓库中换取同等价值的商品。由于金属、货币、武器、蜡、茶叶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有时会受到限制，官员们便开辟另一个市场，专门销售本地和外地生产的专供出口的瓷器。对此，我们稍后会详细说明。

南宋时期，刺桐城仍保持着繁荣。1225年，负责监管海上贸易的市舶使赵汝适撰写了一部名为《诸蕃志》的著作，其中既有印度洋诸岛、阿拉伯海甚至遥远的地中海的地名名录，也有樟脑、乳香、肉豆蔻和珍珠等商品目录。1974年发掘的一艘蒙古征服南宋前的沉船，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进口商品的丰富程度。船中商品包括檀香木和降真香等芳香木材，槟榔、乳香、龙涎香、朱砂、水银和玳瑁等药材，还有五升黑胡椒，这有助于证实马可·波罗对当时贸易量的断言。海洋考古学家发掘出的文物还揭示了其他一些细节，例如贴在货物上的木质标签根据货主的等级而形状各异，人们可据此确定货主的身份。船的龙骨两端各有一个洞，洞中有一面

铜镜和一些铜钱，用作护身符，并以“七星伴月”状排列（即上面是大熊座，下面是一轮满月）——直到 20 世纪中叶，福建的造船厂还在沿用这种做法。然而，与此同时，猖獗的海盗活动和南宋官员的腐败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因此，商人们对 1279 年蒙古人的征服表示欢迎，这是因为征服后，刺桐的关税被降至其他六处市舶司的一半。

所有这些贸易往来使刺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到 13 世纪时，南宋政府中已经有了穆斯林官员。13 世纪六七十年代，刺桐的市舶司长官是蒲寿庚<sup>1</sup>，他很可能是阿拉伯裔穆斯林。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有许多宗教建筑：六座清真寺，分别由来自波斯湾的锡拉夫港、也门、大不里士（伊儿汗国的首都）和花刺子模的穆斯林捐赠；一座佛教寺庙；一座摩尼教寺庙（后来改建为佛教寺庙）；基督教（可能是景教）墓碑。对于阅读马可·波罗作品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习惯了由基督教（天主教、希腊教派和各种东正教教派）、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组成的地中海宗教景观，而像

---

1 蒲寿庚，宋元之际人，原籍阿拉伯，一说为占城（今越南南部）人，居泉州（今属福建），号海云。拥有大量海船，为沿海地方势力首领，宋末任提举市舶三十年。元兵南下时降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 年）被任为福建行省尚书左丞，招东南亚各国商人，恢复沿海贸易。——译者注

这样的宗教多样性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几乎就像“每有一船胡椒经由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运往基督教国家，就有一百船胡椒运到刺桐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

在马可·波罗的眼中，汗八里、行在和刺桐这三座大都市宏伟壮丽，每座城市的规模都是拉丁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数倍，它们既体现了鲁斯蒂谦开篇所强调的“多样地区的多样性”（第1章，第1页），又证明马可·波罗将忽必烈描述为“世上从未有过如他一般的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广袤的土地和最多的财富”（第76章，第67页）是名副其实的。同时，从人口数量、城墙周长、石桥数量和商业规模来看，这些城市的壮观程度都会让初次得知的读者感到震惊，它们值得被写入《奇迹之书》。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 MARCO POLO



第 三 章

《奇迹之书》

*and*  
**HIS  
WORLD**



与长久以来形成大众普遍认知的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描绘相比，马可·波罗笔下的亚洲明显缺乏奇迹的色彩。

——约翰·拉纳 (John Lamer), 《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sup>[1]</sup>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1413 年，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送给叔父约翰·贝里公爵一份精美的新年礼物。约翰·贝里公爵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其著名的《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 *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 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 ( 见图 32 )。勃艮第公爵送的礼物是一部彩绘手抄本，现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手抄本的扉页上，公爵的秘书写道：“本书讲述的是‘世界奇迹’，即圣地、大汗 ( 鞑靼人的皇帝 ) 和印度之地的奇迹。”整部作品由 299 页对开羊皮纸组成，配有 265 幅细密画 ( 见图 33 )。从内容上讲，这是一部游记汇编，其中包括方济各会修士波代诺内的奥多里克 ( Odoric ) 于 1330 年撰写的关于他在十年前游历印度和中国的记述，还有约

翰·曼德维尔<sup>1</sup> (John Mandeville) 凭想象虚构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 *Travels*, 约撰写于14世纪50年代), 以及亚美尼亚王子赫图姆(Hetoum)的《东方大地的历史之花》( *La Fleur des histoires de la terre d'Orient*, 撰写于1307年)。然而, 这部文集收录的第一个文本就是《马可·波罗关于大亚洲、大印度和小印度以及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奇迹之书》( *Marco Polo's book of the Marvels of Greater Asia, Greater and Lesser India and diverse regions of the world* ), 同样是对开本, 共96页, 配有84幅细密画。在短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这部最初旨在描述世界的作品已经演变成一部描述世界奇迹的游记。

从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最初创作《马可·波罗游记》到勃艮第公爵请人编纂《奇迹之书》完成, 这一百多年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1271年由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于1368年被汉人建立的明朝推翻。到了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 地中海东部和亚洲政治舞台上的新主角

---

1 约翰·曼德维尔(1670—1733), 英国作家, 以《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一书闻名于世。该书共九章, 写作者从英国出发, 一步一步东游, 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 最后来到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国土, 并从位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由于作者并未真正到过亚洲, 全书皆由想象而成, 其描写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 真正的旅行极其困难, 因此本书仍然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译者注



图 32 《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中的细密画，约创作于1416年



图 33 细密画《波罗家族三人觐见忽必烈》，选自马可·波罗的《奇迹之书》，创作于 1400 至 1420 年

成了奥斯曼人和帖木儿（卒于 1405 年）。奥斯曼人在 1396 年的尼科波利斯（位于多瑙河畔，今保加利亚境内）战役中大胜西方十字军联军，使对方遭受惨败。而跛子帖木儿则是中亚的征服者，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其征服的版图可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相媲美。然而，《奇迹之书》中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与我们所见的法兰克 - 意大利方言版本一样，都鲜少描写奇迹，这令人颇感意外。不过，“merveilles”（奇迹）这一概念，为 15 世纪欧洲人对亚洲的集体认知提供了一个

文化框架，这一认知正是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本知识积累形成的。在本章中，我们先探讨一下奇迹对中世纪世界的吸引力，然后再探究马可·波罗的《寰宇记》赋予“奇迹”这个词（概念）的特殊含义。



## 中世纪的奇迹

奇迹是中世纪文化永恒的组成部分。在西方传统中，奇观和奇迹是许多书籍和图画的热门主题。例如，《世界奇迹》（*A Wonders of the World*）就收录在一份豪华手抄本（现藏于美国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MS Ludwig xv 4）中，该手抄本于1277年左右在泰鲁阿讷制作。大约在同一时期，该书坊还制作了布鲁内托·拉蒂尼的《宝藏之书》豪华手抄本（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MS Français 567）。<sup>[2]</sup>

对奇迹的信仰、对圣徒作为代祷者的信仰以及对圣物力量的信仰，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根本和基础。据大主教雅各布·达·瓦拉金在《热那亚城纪事》中的记载，1230年，四名海盗在圣洛伦佐广场被判处公开处决。行刑前，其中两人向施洗者圣约翰的圣物（存放在邻近的大教堂里）祈祷。结果

两人在初次被施以绞刑时未被绞死，最终被赦免。据雅各布·达·瓦拉金任大主教期间的详细记录，大教堂祭坛上方的大理石石棺曾被开启，据说里面装着圣塞勒斯的遗体。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我们当着议会成员、总督、船长、修道院院长以及热那亚城许多其他贵族的面打开了墓穴”。在密封的木棺中发现的骸骨和随附的相关文字，证明了尸体的身份，消除了人们之前的种种疑虑。雅各布下令在圣徒节当天将骸骨和墓志铭展示给人们看，“所有人都怀着最虔诚的心瞻仰它们，并怀着谦卑的心敬拜它们”。<sup>[3]</sup>在当时，这些圣物不仅是人们虔诚敬拜的对象，也是公民引以为傲的珍宝。

在伊斯兰传统中也是如此，人们普遍对奇迹感兴趣。大约在 1260 至 1280 年间，即旭烈兀推翻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之后的几十年里，一位名叫扎卡里亚·伊本·穆罕默德·卡兹维尼（Zakariyya ibn Muḥammad al-Qazwīnī，卒于 1283 年）的法官兼法学学者创作了《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sup>1</sup>（*Aja'ib al-makhlūqāt wa ghara'ib al-mawjūdāt*）一书。卡兹维尼来自加兹温（马可·波罗笔下的波斯“八大王国”之一，位于今德黑兰西北

---

1 《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内容包括行星、四元素、海洋、矿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精灵等。该书对后来的伊斯兰宇宙志和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部)，1220 年他逃过蒙古人的屠杀，先是在摩苏尔<sup>1</sup>找到了避难所，并在那里学习哲学，最后定居在瓦西特（位于底格里斯河畔），那里是一个繁荣的书籍生产中心。1258 年，他在那里躲过了旭烈兀的征服。两部早期的《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手抄本的问世时间正好与马可·波罗的亚洲游历和在热那亚被囚禁的时期重合：第一部为作者本人于 1280 年在瓦西特创作的（见图 34）；第二部是约 1300 年在摩苏尔制作的（见图 35）。这些手抄本因其生动的插图而备受艺术史学家的关注。作为蒙古征服波斯后书籍艺术蓬勃发展的早期范例，它们保存的文本在许多方面开创并奠定了“造物奇迹”这一体裁的基本范式。



## 异域之地和日常奇迹

正如我们所见，鲁斯蒂谦所作的序言，开篇就承诺要向读者揭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所有最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第 1 章，第 1 页）。从

---

1 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译者注



图 34 《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对开页内文，作者为卡兹维尼，创作于 1280 年





图 35 《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中的细密画。作者为卡兹维尼，约创作于 1300 年

一开始，“奇迹”就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该书始终关注的主题。几页之后，在对老波罗兄弟第一次前往忽必烈宫廷的描述中，这种联系得到了强化：“他们见到了诸多奇迹和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正是《寰宇记》的主要吸引人之处，这一点从鲁斯蒂谦巧妙地将其保留到最后以持续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方式上可以看出：“我们不会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奇迹，因为尼科洛先生的儿子马可先生也亲眼看到

了这一切，他将在本书后面详细地告诉你们。”（第5章，第5页）

书中首先令人称奇的其实是老波罗兄弟。由于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之间战事不断，波罗家族两兄弟无法返回家乡，只得深入中亚腹地，最终到达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城市布哈拉。鲁斯蒂谦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在那里待了三年。

当老波罗兄弟寄居在布哈拉时，有一位使臣来到此地，他被统治东方的旭烈兀派去觐见所有鞑靼人的大汗忽必烈。当这位使臣看到尼科洛先生和马菲奥先生时，他大为惊讶，因为他从未在这个国家见过拉丁人。（第4章，第4页）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小段文字颠覆了我们的预期，改变了我们的视角：我们不再通过威尼斯人的眼睛去观察异国他乡的奇迹和奇观，而是通过蒙古人的眼睛来观察波罗家族。在波罗家族的第二次旅行中，这种视角的转换也体现在对年轻的马可·波罗的描述上，他“很快熟悉和掌握了鞑靼人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字，学得又快又好，简直令人惊叹”（第16章，第10页）。此外，当大汗因远道而来的“愚昧之人”对他们所到之处的“奇闻异事和风俗民情”一无所知而感到

失望时，马可·波罗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投其所好，他开始“费尽心思、不遗余力地向大汗讲述”他所看到的“新奇或怪异之事”（第16章，第10页）。结果，回到宫廷后，他“讲得绘声绘色，同时显示出他才华横溢、聪慧过人，令大汗和所有听他讲述的人都惊叹不已，并交相称赞道：‘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长寿，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聪慧、大有作为的人。’”（第17章，第11页）二十多年后，马可·波罗才开始与鲁斯蒂谦合作，而在此之前的时间里，马可·波罗正是通过观察和描述世界的奇迹赢得了大汗的青睐和恩宠，因此马可·波罗书中的第一个奇迹就是马可·波罗本人。

在《寰宇记》正文的前几章中，作者列举了几个地方特色鲜明的自然奇迹的例子，这类记载是中世纪游记——如12世纪晚期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对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描述——的典型特征。例如，在格鲁吉亚王国的圣伦纳德女修道院旁，有一处高山湖泊，每年四旬斋期间，湖中鱼儿成群，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湖中却不见鱼的踪影（第23章，第18页）。又如，在遥远的中亚，有一片名叫罗布的沙漠——一个水质微咸、没有鸟兽的荒凉之地，而且常有幽灵出没。

有些与同伴走散的旅人会听到有人在说话，那声音

很熟悉，像是他的同伴，因为有时那声音会喊他的名字。于是旅人循声而行，很快便迷失了方向，最后消失在茫茫荒漠中，踪迹难寻。许多进入沙漠的旅人都是这样失踪或死去的。容我再告诉各位，即使在白天，人们也能听到幽灵的声音，而且常常听起来像是有许多乐器——也就是鼓——在敲击。（第51章，第44页至第45页）

尽管这些现象引人注目，但《寰宇记》记载不多。该书中的大多数地理性条目，都只是按照固定格式记录了蒙古帝国境内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者、宗教、语言和主要商品（天然或人造商品）。

不过，马可·波罗确实对各种“巫师”的法术和占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克什米尔的偶像崇拜者“懂得如此之多的魔法，令人惊叹：因为他们能让自己的偶像说话”（第49章，第39页）；占星者和聪明的巫师能驱散大汗宫殿周围的恶劣天气（第75章，第65页）。他提到西藏“最聪明的巫师和最出色的占星者”，他们“通过仪式……施展强大的法术和展示伟大的奇迹，让耳闻目睹者都惊叹不已，但这些在我们的书中不宜提及，以免人们过于惊奇”。在描述完巫师们的一些仪式后，马可·波罗转而以更为平实的笔触描写他们用

于狩猎的獒犬和猎鹰（第116章，第102页）。

在《寰宇记》对蒙古人和其他民族及异域之地的描述中，马可·波罗对动物的惊异常常被人们忽略。在描述原契丹西南部的风土人情时，马可·波罗写道：“容我告诉各位一件奇事：这个地区的狗胆子非常大，它们会攻击狮子。”（第130章，第116页）唐古特<sup>1</sup>的特点是“野牛像大象一样大，非常漂亮，因为它们浑身（除了背部）长满毛，黑白相间……漂亮得让人惊叹”（第72章，第60页至第61页）。在喀拉莫兰河（黄河）上，“鸟类之多令人惊叹，用一枚威尼斯格罗索银币就可以买到三只野鸡”（第110章，第96页）。哈刺章（今云南大理）盛产“巨蛇……身形大得惊人”：巨蛇长十步，宽十掌，有“像猎鹰或狮子一样的趾甲”，嘴巴“大得可以把人整个吞下去”（第119章，第105页）。鲁斯蒂谦用“趾甲”一词来形容蛇的腹鳞，这个词原本是用来描述鳄鱼的爪子的。这既表明了鲁斯蒂谦所掌握的古法语词汇有限，也从侧面反映出马可·波罗描述的许多事物极具新颖性。东非也有许多奇异的动物。马可·波罗写道，在摩加迪沙（位于非洲东部索马里半岛），“有奇异的鸟

---

1 唐古特，亦作“唐古忒”。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后渐泛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诸部。清初曾沿用此称，作“唐古特”。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注

类——也就是说，与我们所认识的鸟类完全不同——这真是一个奇迹”（第191章，第181页）。马可·波罗还提到，大汗的使团归来后，使者们“向大汗讲述了许多异域岛屿的奇闻异事”，并带回了“野猪的牙齿……这些牙齿大得无法测量，其中一颗重达14磅”（第191章，第181至第182页）。谈到希赫尔（位于今阿拉伯半岛南部海岸）时，马可·波罗先是描述了那里的绵羊是一种“美丽的小动物”，然后插入了一段话。

容我再告诉各位一件会让你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你们要知道，他们的牲畜——羊、牛、骆驼和他们的小驮马——都吃鱼。各位要知道，鱼也是他们的食物，因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的国家寸草不生……那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

和书中其他地方一样，此处的“容我再告诉各位”和“各位要知道”两句套话，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奇异之事所引发的惊奇感。此外，“动物吃的鱼很小，每年的三月至五月是大量捕获小鱼的时节，捕获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第195章，第189页）。然而，即使是有关动物的奇迹，也要归功于大汗。比如在蒙古边境，大汗下令建造的鸟舍中饲养着“大量的鹫

鸪，我们称之为大鹌鹑……其数量之多令人称奇”（第74章，第63页）。最后，在汗八里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也有令人惊叹的奇观。

容我再告诉各位一件看似神奇的事，这在我们的书中值得提及：一头雄狮曾被牵到大汗面前。狮子一见到大汗，便立即伏在大汗脚下，表现出极为谦卑和顺服的姿态，仿佛承认大汗是它的主人。狮子身上没有拴链子，它就这样伏在大汗面前，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第90章，第80页至第81页）

对于商人马可·波罗来说，商业和手工业与自然世界一样，都能激发他的好奇心。在波斯（伊儿汗国统治时期）的克尔曼省，“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在各种颜色的丝绸布料上优雅地飞针走线，绣出鸟兽以及其他图案。她们为贵族和领主制作的挂毯精美绝伦，令人赞叹不已。她们在地毯、靠垫和枕套上所做的刺绣十分精细”（第35章，第28页）。

在中国北方，东平府（山东西部）的人“生产出的丝绸数量极多，令人叹为观止”（第134章，第118页）。流经忻州的河流“将大量商品途经契丹运往蛮子省，其数量之多令人叹

为观止”。马可·波罗进一步强调，船只往返皆满载货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船只满载着商品顺流而下和逆流而上，那景象令人叹为观止。”（第135章，第119页）在“蛮子省”（刚刚被征服的南宋帝国），大汗从杭州收缴的盐税，其数量之大令人惊叹（第153章，第137页），而通过刺桐港进出的“大量商品和宝石”也“令人惊叹”（第157章，第141页）。



## 蒙古人与奇迹

将《奇迹之书》和《大汗之书》这两个书名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寰宇记》中许多最伟大的奇迹都与蒙古人及蒙古帝国有关。这要从他们在13世纪初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讲起。

成吉思汗是位至高无上且英明神武的君主。我该怎么说呢？他的威名远播，因此所有的鞑靼人都归附于他，这本身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而成吉思汗看到自己统治着这么多勇猛之人，便给他们配备了弓箭、盔甲等武器，率领他们攻城略地，征战四方（第65章，第52页）。

在上述引文中，“奇迹”指的是成吉思汗能召集的军队规模。此外，蒙古人的习俗或传统本身也很奇特。

成吉思汗后裔中所有伟大的大汗去世后，都会被运往名为阿尔泰山的大山安葬。无论他们死在何处，哪怕距这座山有一百日的路程，人们也必须将其灵柩运往那里安葬。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第69章，第55页）

在西方，统治者死后通常会被安葬在大教堂，或其王国（行省）中心的其他圣地，而阿尔泰山这个遥远的埋葬地如此隐秘，以至于时至今日寻找成吉思汗陵墓的努力仍不时见诸报端。所以，蒙古人的这种习俗在西方人看来很奇特。除此之外，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奇异之事。1258年，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攻占巴格达后，发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蜷缩在“一座堆满了金银财宝的塔楼里——从来没有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让旭烈兀感到奇怪的是，哈里发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却没有用它们雇用军队来保卫这座城市（第25章，第20页）。

战斗中常出现奇迹，但奇迹并非我们惯常所想的那般，是战斗者的英雄气概或神明的干预（正如西方一些十字军东征编

年史和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其宏大的规模和场面。在忽必烈与反叛的侄儿乃颜的交锋中，“双方伤亡惨重，其景象之惨烈令人震惊”（第79章，第70页）。在对缅甸蒲甘王国的战役中，当蒙古人的战马受到对方战象惊吓时，蒙古人“射出的箭矢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第123章，第111页）。马可·波罗这样描写忽必烈的儿子和另一个反叛的堂兄弟海都之间的对抗：“容我告诉各位，两军都拉开阵势，等待战斗的到来。鼓声擂响后，他们就开始奏响军乐，高唱战歌，场面壮观，令人惊叹。”（第199章，第195页）在《寰宇记》的最后一章中，当金帐汗国的汗位竞争者交战时，“箭如雨下，场面令人叹为观止”（第232章，第222页）。

不过，与《大汗之书》这一别名相符的是，《寰宇记》中记载的许多奇迹都是有关忽必烈的。忽必烈在汗八里的宫殿“有如此之多的房间，令人叹为观止；规模宏伟、建造精良，世人即使有巧思神力，也不能设计与建造得更好”（第84章，第74页）。与大汗有关的其他奇迹和奇观，还包括参加他的季节性狩猎的人数，以及他的营帐中富丽堂皇的厅堂，里面铺满了银鼠皮和紫貂皮（第94章，第84页）。

然而，书中一些最热情洋溢的描述是关于南宋帝国（也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蛮子省”）的，直到波罗家族三人到达忽

必烈的宫廷之后，那里才被完全征服。即使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正如马可·波罗所说：“全世界没有哪个王国的富裕程度能抵得上它的一半，因为南宋皇帝拥有的权力之大、财富之巨，实在令人惊叹。”（第139章，第124页）忽必烈的新领地，其规模之大，在欧洲或地中海地区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可·波罗在书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容我再告诉各位一件让你们惊叹不已的事：蛮子省大约有1200座城池，大汗在每座城池都设有精兵守卫。”（第152章，第135页）在杭州的前朝皇宫里，“大殿里装饰华丽，绘有精美的壁画，壁画的主题包括故事、兽类、鸟类、武将、仕女以及其他令人称奇的事物。整个大殿看上去非常美丽，因为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都绘满了金碧辉煌的壁画”（第152章，第136页）。一般来说，只要是宫殿，都会引起马可·波罗的注意。在关于日本的章节中——他不太可能亲自去过那里——他写道：“容我告诉各位，这座岛上的天皇宫殿极其华贵富丽，堪称奇迹。房屋或教堂的屋顶通常覆以铅片，而这座宫殿的屋顶则由纯金铺就，价值连城，其奢华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第159章，第144页）

关于亚洲的其他奇迹，我们稍后再详述。除了这些与帝国的辉煌统治相关的奇迹，我们在书中还发现了一些与圣

徒有关的奇迹故事。这些故事虽然与拉丁西方经典故事集中的内容相似，但又独具特色。



## 奇迹与圣徒

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被俘期间，雅各布·达·瓦拉金正担任热那亚大主教。如今，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所著的《金色传奇》。《金色传奇》是一部讲述圣徒生平和基督教教义（后者与宗教节日的阐释有关）的汇编作品，主要供传教士使用。该汇编作品于13世纪60年代完成，是13世纪百科全书编纂盛行时期的代表作。书中引用的资料十分广泛，有《福音书》、《旧约》中的《诗篇》和《以赛亚书》、保罗书信、《使徒行传》、教父作家<sup>1</sup>们的著作、沙漠教父<sup>2</sup>们的生平，甚至还有一些多明我会修士在13世纪早期编纂的文集等。在圣徒的选择上，雅各布更倾向于选择基督教早期的传

---

1 教父作家是指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和作家，其作品通常探讨信仰、伦理和教会的教义，对基督教教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2 沙漠教父是指2世纪到5世纪为逃避罗马帝国的迫害，在沙漠修行的早期修行者。——译者注

统人物，而不是更接近他所处时代的圣徒。《金色传奇》是中世纪的畅销书，早在作者生前，其拉丁文版和各种方言译本便已广为流传。<sup>[4]</sup> 鉴于这部作品的流行程度及其相对保守的基调，我们不妨如此想象：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在热那亚被囚禁期间——也许就被关在雅各布的大主教宫殿附近——他们系统地记述了一些与《金色传奇》中相同的圣徒生平，但加入了陌生的、具有鲜明亚洲特色的元素。

## ++ 圣多马

雅各布·达·瓦拉金在讲述使徒多马<sup>1</sup>的生平事迹时，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名字的可能来源。他写道，这个名字可能源自一个意为“双重”的词，“因为他（多马）通过两种方式知晓了主的复活——不仅像其他人那样亲眼所见，还亲手触摸到了”。这个名字也可能源自一个意为“分割”或“分离”的词，因为“他（多马）起初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从而将自己与其他门徒区分开来”——这暗指《约翰福音》

---

1 多马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天主教称“多默”。他是第一个在印度传播基督教的人，并在那里殉道。——译者注

中“怀疑者多马”的故事。<sup>[5]</sup>多马的远行，源于一位印度国王遣使者至恺撒利亚，寻找能为其建造罗马风格宫殿的建筑师。尽管多马并不情愿，但据说上帝命令他前往，并许诺一旦他改变了印度人的信仰，“你将带着殉道的棕榈枝来见我”。多马抵达印度后，并没有为国王修建宫殿，而是把钱财施舍给穷人，由此触怒了国王。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成功地改变了国王的兄弟（据说此人死而复生）和国王本人的信仰。他向穷人布道，为病人、瘸子和体弱者治病，为数千名新基督徒施洗，他所行的“神迹”使他在印度南部声名远扬。多马在另一位国王的宫廷中殉道：他劝说国王的妻子和弟媳与各自的丈夫保持贞洁，却因此招来一连串的惩罚和审讯，包括被强迫去敬拜国王“亲手制作的偶像”。他呼唤耶稣基督之名，命令藏在手工偶像内的恶魔将其摧毁，结果那偶像“像蜡做的”般融化了。神庙的大祭司怒不可遏，用剑刺穿了多马的身体。多马的信徒们将他的遗体抬走，并为其举行了“体面的葬礼”。两个世纪后，在塞维鲁斯·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皇帝统治时期，多马的遗体被迁至埃德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使这座城市免遭敌人的侵扰。

在《金色传奇》和其他作品中，多马是与印度关系最为密切的圣徒之一。与雅各布的记载不同，马可·波罗将

多马的安葬之地的地理位置描述得更加精确：“圣徒多马”的遗体被安放在马八儿国（中世纪阿拉伯语中对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称呼），更确切地说，是被安放在一个商人罕至的小镇上，“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商品可出口，而且地处偏远”。尽管如此，这个地方还是吸引了朝圣者——不仅有基督徒，还有“很多萨拉森人”，因为“这个国家的萨拉森人都信服他（多马）。他们说多马是萨拉森人，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并称他为阿瓦里安，意思是‘圣人’”（这类圣地反映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亚伯拉罕根源，在前现代世界曾广泛存在）。与该地有关的一个“奇迹”是那里的红土。传说将红土与水混合后饮用，可以治疗四日疟、间日疟或其他发热病，因此红土深受朝圣者的青睐。此外，“整整一年，还发生了许多其他奇迹——尤其是那些身体残疾、体弱多病的基督徒得到治愈的奇迹，凡是听闻者都会深感‘不可思议’”（第176章，第164页）。

然而，《寰宇记》这一章的核心内容是1288年发生在某地的一个“绝妙的奇迹”——五年后，波罗家族三人返回故土威尼斯的途中，正好经过此地。当地一位“崇拜偶像的男爵”擅自占用教堂周围朝圣者的住处，在里面堆满了“大量被称为大米的谷物”。教堂的守护者向多马祈祷，然后多马显圣，向人们展示了“伟大的神迹”。

要知道，就在这位男爵把房子都装满谷物的第二天晚上，圣徒多马向男爵显圣。他将一把叉子抵在男爵的喉咙上，说道：“若你不马上把我的房子都清空，你将死于非命。”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叉子使劲地抵住男爵的脖子，男爵感到非常痛苦，自觉有生命危险。圣徒多马做完这些事便离开了。男爵惊醒后立即站起身，把所有房子里的谷物都搬走了，并向世人讲述了圣徒多马对他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基督徒们非常高兴，激动无比，对圣徒多马万分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且一再称颂他的名字。（第176章，第164页）

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凸显了地方领主与其统治下的宗教少数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它也让人想起马可·波罗在书中描述的忽必烈的粮食管理措施——丰收时囤积粮食，以便在饥荒来临时分发给民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当地稻农是在抵制官府征粮，还是在反抗囤积居奇、不开仓赈济的领主？虽然这个奇迹故事的历史背景已无从考证，但从圣徒多马对侵占其部分圣地的领主进行身体恐吓中可以看出，当地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冲突，而这些冲突的最终结果往往以宗教领袖的胜利告终。

至于圣徒多马的殉道，在马可·波罗的讲述中，他被一位愤怒的偶像崇拜祭司杀死一事，被改写成一次意外的狩猎事故。

一天，多马正在隐居地祈祷。一名偶像崇拜者朝圣人身旁的一只孔雀射出一箭，想将它射杀。他根本没有看到多马，以为自己射中了孔雀，不料箭射中了圣徒多马的右侧身躯。中箭后，多马轻声向造物主祈祷。容我告诉各位，他正是被这一箭射死的。（第176章，第165页）

一方面，这一意外的射杀似乎褪去了圣徒多马为基督殉道的光环。另一方面，多马右侧身躯的箭伤不由得令人联想起这位“怀疑者”门徒亲自探查基督伤口的情景（据《约翰福音》记载），从而使这一原本平淡无奇的事件具有了象征意义。《金色传奇》和《寰宇记》一致认为圣徒多马的传教范围十分广泛。雅各布引用了7世纪圣伊西多尔主教的记载，证明多马曾向“帕提亚人、米底人、波斯人、希尔卡尼亚人和巴克特里亚人”<sup>1</sup>传教，还引用了4世纪教父金口约翰的记

---

1 主要是古代中东地区的一些民族。——译者注

载，证明多马曾在“东方三博士<sup>1</sup>之地”传教。<sup>[6]</sup>这与布鲁内托·拉蒂尼《宝藏之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该书中提到多马“在波斯、米底亚和希尔卡尼亚传教，并在印度向东传教。最后，他被剑和长矛刺伤，在十二月底的前十一天死于印度的卡拉米纳，并在那里得到了体面的安葬”<sup>[7]</sup>。《寰宇记》对多马的传教范围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并补充说明多马“在努比亚<sup>2</sup>改变了许多人的信仰”（第176章，第165页）。多马与东非的联系在该书后面关于“阿比西尼亚”<sup>3</sup>（即马可·波罗所称的“中印度”；第193章，第184页）的章节中另有叙述。

1321年，当时马可·波罗仍在世，四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在南亚港口塔纳（位于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殉道，这让圣徒多马之死的故事显得更加荡气回肠。相比之下，在《寰宇记》中，关于针对一位圣徒的暴力事件，无论讲述得多么

- 
- 1 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时三位博士（也称贤士）在东方看见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上有一颗大星星，于是循着它来到了耶稣的出生地。因为他们带来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所以被人们称为“东方三博士”。——译者注
  - 2 努比亚是位于埃及南部与苏丹北部之间的尼罗河沿岸地区。——译者注
  - 3 阿比西尼亚为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中印度”的命名源于中世纪欧洲人对“印度”概念的模糊划分，他们将非洲之角（包括阿比西尼亚）与印度次大陆混为一谈，甚至将红海沿岸至东非的部分地区也归为“印度”的不同部分。马可·波罗将印度次大陆称为“大印度”，将东南亚称为“小印度”。——译者注

生动，都被稳妥地归入使徒时代发生的事，而书中更靠近马可·波罗所处时代的一次宗教冲突，则以当地基督教团体获胜而告终。

### ++ 从释迦牟尼·薄伽梵<sup>1</sup>到圣徒巴尔拉姆与约瑟法特

如果说圣徒多马的圣祠所供奉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共同尊崇的圣者，那么马可·波罗描述萨兰迪布岛（锡兰，今斯里兰卡）时重点提到的一座山，则是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共同敬拜的一座圣山，相传那里埋葬着两位分别属于不同宗教的圣者。在穆斯林看来，那里是“人类始祖阿丹（亚当）”的安葬之地，而“偶像崇拜者”则认为那里是释迦牟尼·薄伽梵（蒙古人对释迦牟尼的尊称）的归寂之地。<sup>2</sup>马可·波罗撇开亚当的传说不谈（根据基督教传统，他被安葬在耶路撒冷），转而讲述后者的故事。这位王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悉心呵护，远离一切艰难困苦。在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充满死亡和衰老后，他便舍弃了受庇护的生活，隐居到“遥远的山上”。在那里，

---

1 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薄伽梵是“世尊”一词的梵语音译，专用于尊称佛陀。——译者注

2 两种说法都是宗教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或教义内容。——译者注

“他一生都过着简朴而贞洁的生活，刻苦修行。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将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伟大圣徒”（第178章，第169页）。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佛陀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只不过是以基督教圣徒巴尔拉姆（Sts. Barlaam）和约瑟法特（Josaphat）的传说的形式流传。佛陀的梵文传记经历了跨越多种语言、宗教和文化的非凡传播。它首先被译成波斯文，继而在约750至900年间被译成阿拉伯文，书名为《比劳哈尔与布达萨夫之书》（*The Book of Bilawhar and Budhasaf*）。该版本随后被译成格鲁吉亚语，并在被基督教化后以《巴拉瓦里亚尼》（*Balavariani*）为名流传。11世纪初，它被译为希腊语；从11世纪中叶开始，又多次从希腊语转译为拉丁语。这些拉丁语版本后来被多次译成法语：首先是在12世纪，然后在13世纪20年代由盖·德·坎布雷（Gui de Cambrai，撰写过一部有关亚历山大传奇故事的短篇史诗）完成了扩充版的翻译。在同一年代，鲁道夫·冯·埃姆斯（Rudolf von Ems，也是《世界纪事》（*World Chronicle*）和《亚历山大传奇》的作者）将其译成中古高地德语。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创作《寰宇记》时，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的故事已经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

该故事的拉丁文版本被收录在雅各布·达·瓦拉金的《金

色传奇》中，并以“整个印度遍布着基督徒和僧侣”的时代为背景（大概反映了圣徒多马传教的成功）。故事开篇记载，“一位名叫阿文尼尔的强大国王”在登基后开始迫害基督徒。一位被召来庆祝阿文尼尔的儿子约瑟法特诞生的占星家预言，这位王子不会继承他父亲的王位，而是“将作为基督教的信徒而受人崇拜，而基督教恰恰是国王正在迫害的宗教”。于是国王将约瑟法特隔离在一座华丽的宫殿里，不让他接触世间的苦难，并确保“绝不会向这位王子提及关于基督的任何信息”。然而，约瑟法特长大成人后，遇到了一位麻风病人和一位盲人，了解到衰老和死亡，这让他深感不安。一位名叫巴尔拉姆的基督教修士找到了他，向他讲述了一系列寓言故事，阐明为何他应当摒弃世俗的财富，去过一种有德行的简朴生活，进而获得上天更多的恩赐。巴尔拉姆为约瑟法特施洗，但劝他不要和自己一起返回沙漠，而要等待时机。回到宫廷后，国王用各种诡计引诱儿子背离基督教，包括让一个假冒巴尔拉姆的人和宫廷神学家进行宗教辩论，以及让巫师用一群美女诱惑约瑟法特。其中最大的诱惑来自一位国王的女儿，她怂恿约瑟法特：

如果您想拯救我的灵魂，请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今晚和我同寝，仅此而已。我向您保证，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如果真如您所说，凡有罪人悔改，上帝的天使就会欢喜，那么，促成罪人悔改的人，岂不应当得到丰厚的奖赏？就这一次答应我的请求吧，这样您就能救我！

约瑟法特泪流满面，他做了个梦，梦中揭示了这一阴谋背后的邪恶，最终他被梦所救，并且使巫师改变了信仰，信奉了基督。

阿文尼尔无法阻止儿子过度虔诚的生活，于是将半个王国赐给了他。约瑟法特接受了这一赏赐，“以便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开来”。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建造了许多教堂，让所有在他统治下的臣民都皈依了基督——甚至包括他的父亲，使其“献身于善行，以高尚的品德结束了一生”。约瑟法特随后放弃了王位，逃到了沙漠。他逃脱了魔鬼设下的重重陷阱，花了两年时间寻找巴尔拉姆，最后得以重逢，两人欣喜若狂。

约瑟法特在沙漠生活了许多年，生活简朴，品德高尚。巴尔拉姆于380年安详离世。约瑟法特在二十五岁时放弃王位，度过了三十五年的隐士生活。他一生至德至善，

最终安详离世，安葬在巴尔拉姆的墓旁。

约瑟法特将王国让给了他的继任者，新国王将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两人的遗体运回了都城，据说后来“在他们的墓前出现了许多奇迹”。

尽管基督教圣人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的故事在西方以拉丁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广为人知，但马可·波罗的版本所讲述的是“释迦牟尼·薄伽梵”的生平，他称其为“（偶像崇拜者）所尊崇的第一人，他们还以他的名字制造偶像”（第178章，第169页）。佛陀的故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他面对三万名“非常美丽、花容月貌”的侍女的诱惑而不为所动；二是他看到一具尸体和一位老人后，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于是决定舍弃尘世，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不过不是在沙漠，而是在“一些遥远的大山上”。故事中并没有像巴尔拉姆那样教导他或向他示范圣洁生活的其他人物。相反，这个故事着重描述了王子父亲的视角：当他发现儿子“对世俗权力毫无兴趣时，他愤懑欲绝。这也难怪，因为王子是他唯一的儿子，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托付王国”。王子死后，国王为他树立了雕像，将他奉为偶像。

当他看到自己爱之如生命的儿子死去时，你无须问他是否伤心痛苦，他当然悲痛万分。他用纯金和宝石为儿子竖立雕像，并令所有臣民将儿子奉为神明来崇拜。（第178章，第169页）

与圣徒多马的故事一样，马可·波罗的主要关注点始终是朝圣地本身。这促使他探究其充满争议的历史：“容我告诉各位，偶像崇拜者从很远的地方来朝圣，就像基督徒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一样。”<sup>1</sup>与此同时，“众多前来朝圣的萨拉森人则宣称，这里是人类始祖阿丹（亚当）的安息之地”。双方都宣称此地保存的遗物——牙齿、头发和一个碗——属于各自尊崇的圣者。起初，马可·波罗将偶像崇拜者的朝圣地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北角的基督教朝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与耶路撒冷、罗马和坎特伯雷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朝圣地）相提并论，从而淡化其异域色彩，但他最后这样补充道：“但唯有上帝知道他是谁，他曾经是谁，而我们则不相信亚当被葬在这个地方，因为据神圣教会

---

1 基督徒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是为了纪念使徒圣雅各。——译者注

的经典记载，亚当被葬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第 178 章，第 169 页）

不过，对马可·波罗来说，这个故事的最终意义在于这些遗物引起了忽必烈汗的兴趣。正如他所说，当大汗听了这些遗物后，“心想这些圣物应为他所有”。于是，1284 年，他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向当地国王再三请求，最终国王赐予使团“两颗大白齿、几缕头发和一个非常精美的绿斑岩碗，据说是亚当的遗物”。在汗八里，人们“怀着无比喜悦、欢庆和崇敬的心情”出城迎接圣物。马可·波罗补充道：

容我告诉各位，据他们的文献记载，这只碗具有这样的特性：虽然它只能盛够一个人吃的食物，但实际上碗里的食物足够五个人吃。大汗说他已经试过了，证实这是真的。

就这样，大汗得到了你们听说过的圣物，并为此花费了大量钱财。（第 178 章，第 170 页至 171 页）

简而言之，佛陀的遗物从遥远的朝圣之地——同时也是穆斯林所称的人类始祖阿丹的埋葬之地——被移走并运到忽必烈的宫廷，像是被一种向心力吸引，逐渐进入蒙古帝

国的势力范围，并被记载在《大汗之书》中。正如圣马可的遗体被从亚历山大港迁葬至威尼斯一样，佛陀的牙齿、头发和托钵的获得，象征并彰显了忽必烈及其都城的权势。

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讲述的其他奇迹故事，都发生在同时代人的记忆范围之内。第一个“伟大的奇迹”，讲的是巴格达“一位希望基督徒遭受大难的哈里发”为难基督徒却未得逞的故事。他设下计谋，企图令基督徒改变信仰，否则就将他们处死（第26章，第21页）。他引用《福音书》（《马太福音》17：20）中关于信心能移动山的那段话，要求当地的基督徒移走附近的一座山，否则就处死他们。马可·波罗用长达四章（第26章至第29章）的篇幅讲述了这个故事：基督徒们找到了一位以虔诚著称的独眼鞋匠（他在为一个女人试鞋时，抵挡不住其秀腿的诱惑，于是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鞋匠的虔诚祈祷最终成功地移走了那座山。

哈里发和萨拉森人看到这一幕后，都惊骇不已，其中有几个人立刻转信了基督教。哈里发本人也秘密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一直不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因此，萨拉森人没有把他葬在其他哈里发的陵墓里，而是把他安葬在了另

马可·波罗所讲述的基督教徒获胜的故事，与一份11世纪的科普特教会<sup>1</sup>文献的记载极为相似，该文献记载了10世纪发生在开罗的一个奇迹故事。在马可·波罗的版本中，这些基督徒是“聂斯脱利派和雅各派”（第26章，第21页）。尽管这两个东方教派的成员广泛分布于亚洲各地，但其与拉丁基督教的分歧，令1253至1255年间出使蒙古的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感到震惊和愤慨，这一情况在鲁布鲁克呈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报告中有记载。<sup>[8]</sup>最为关键的是，马可·波罗将这个故事的成立时间设在1275年，也就是他在前一章中所述的旭烈兀攻占巴格达的二十年之后。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将独眼鞋匠祈祷移山这一神迹放在了一个时间矛盾的背景下，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个基督教奇迹故事，发生在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城市撒马尔罕。故事发生在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死后（察合

---

1 科普特教会是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进入埃及时对埃及人的称呼，后来专指信奉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译者注

台的后代经常与忽必烈“发生冲突”；第52章，第41页），当时该城的萨拉森人要求当地的基督徒归还一块巨石，这块巨石是基督徒为建造一座供奉施洗者约翰的新教堂而取走的。而基督徒则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应对。

正如我将要告诉各位的，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在他们要归还石头的那天早晨，石头上的柱子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竟自行升起，离基石足有三掌高，而且牢牢地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从那天起，这根柱子就一直保持在那个位置，直到如今仍是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第52章，第42页）

巴格达和撒马尔罕的奇迹都发生在人们记忆犹新的年代，而这两座城市都曾遭受过蒙古征服者的蹂躏。1220年，成吉思汗横扫中亚时，撒马尔罕被洗劫一空。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在其《世界征服者史》（*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中详尽地描述了撒马尔罕人民所遭受的毁灭。<sup>[9]</sup>如前所述，巴格达于1258年被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攻占。阿尤布王朝曾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其宫廷中的一位书记员（因

此可能不是事件的目击者）撰写了一首阿拉伯语的诗歌，其中哀叹道：“哈里发的王冠、彰显信仰荣光的殿堂，从此被荒废了。”<sup>[10]</sup>历史证据表明，巴格达遭受的破坏并不像诗中描述的那么严重，而这首诗显然属于阿拉伯文学中传统的“城市哀歌”体裁。《寰宇记》突然开始叙述奇迹故事——比如撒马尔罕的奇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认为是世界上发生的伟大奇迹之一”（第52章，第42页）——似乎是为了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使之忽略蒙古人精心塑造的、对所有抵抗者施以毁灭性打击的军事征服者形象。



## 《印度之书》

在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和蒙古人描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的同时，鲁斯蒂谦却始终将印度的奇迹作为全书的核心。在详尽描述了“蛮子省、契丹及许多其他行省的人民、鸟兽、金银、宝石、珍珠、商品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之后，鲁斯蒂谦卖关子地说，他们的书里仍然缺少关于印度地区的所有事实。

理应让那些不了解印度地区的人知晓这些事实，因为那里有许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奇妙事物，把这些真实情况写进我们的书里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也是大有益处的——执笔者会把它写得清清楚楚，就像马可·波罗先生讲述和描述的那样……的确，有些奇妙之事会让听到的人大吃一惊。然而，我们会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并且与马可·波罗先生讲述的内容一致（第157章，第142页）

在拉丁基督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统印象中，印度是一个充满奇迹的特殊之地。在西方文献的记载中，印度始终笼罩在朦胧、神秘的迷雾之中，那里栖息着1世纪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及其他古代作家笔下的所谓“怪物种族”<sup>1</sup>。例如，佛罗伦萨人布鲁内托·拉蒂尼在其《宝藏之书》的“被称为亚洲的东方地域”条目下写道：

各位应该知道，在印度……生活着许多不同的人种……有脑袋是狗头的人，还有眼睛长在肩膀上的人，

---

1 “怪物种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欧洲文化精英为凸显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对异域“无奇不有”的想象和构建。——译者注

因为他们没有脑袋。有人出生时头发已花白，年老时反而变黑了。有的人只有一只眼睛，有的人只有一条腿。还有女人怀胎五年，但孩子生下来后活不过八岁的情况。<sup>[11]</sup>

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 13 世纪的读者来说，这种源自古代拉丁语文献的描述，其权威性远胜于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在他看来，《寰宇记》不过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道听途说。印度与这些“怪物种族”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 15 世纪初，勃艮第公爵请人编纂的《奇迹之书》中赫然出现了无头人和独脚人（其巨大的独脚可用作遮阳伞），而这两种怪物种族在《寰宇记》中都没有被提到（见图 36）。

我们现在来谈谈阿拉伯语的传统文本资料。《印度珍异记》（*Kitāb ajaib al-hind*，又名《印度的奇观》）是一部成书于 9 世纪末或 10 世纪初的作品，作者是拉姆霍尔木兹一位名叫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Buzurg ibn Shahriyar）的船长。该书汇集了环印度洋地区的 136 则奇闻异事，这些故事是从有名有姓或无名无姓之人的口述中收集而来的。这些奇闻异事五花八门，内容包括陆地和海洋生物（如鲸鱼、蛇、猴子、长颈鹿、鳄鱼等）、人兽杂交生物、奇珍异宝（如用丝绸制成的花朵打造而成的中式花园），以及海上冒险中的幸存者或受害者等。<sup>[12]</sup>



图 36 细密画《无头人》。选自马可·波罗的《奇迹之书》，创作于 1400 至 1420 年

其中一些故事与《寰宇记》中的奇迹故事颇为相似，比如在班卒儿岛（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拉穆里岛（即马可·波罗笔下的南淳里岛）之间的一个岛屿上，岛上的男性居民都有尾巴<sup>[13]</sup>。

体现不同传统的文本相互交融的例子很多，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马可·波罗对安达曼群岛的描述。安达曼群岛是孟加拉湾的一个岛屿群（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用马可·波罗的话来说，这里的人们“非常值得讲述”（第 172 章，第 155 页）。

容我实话告诉各位，岛上所有人的脑袋都长得像狗头，牙齿和眼睛也跟狗一模一样。因为容我告诉各位，他们的脑袋像大型獒犬的头。岛上的居民极其残忍。凡不属于他们族内的人，只要被抓到，就会被吃掉。岛上盛产各种香料，而且产量很大。岛上居民的食物是大米、乳制品和各种肉类。此外，岛上还出产一些我国所没有的水果。（第172章，第155页）

《寰宇记》中记载的最接近老普林尼笔下“怪物种族”（这里指“犬头人”）的，就是马可·波罗提到的“脑袋长得像狗头一样的人”。然而，在这段文字中，马可·波罗并没有将这种现象称为“奇迹”。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在描述这种“脑袋长得像狗头”的食人族时，巧妙地将其奇特特征与当地的商品（盛产各种香料）和饮食习惯（大米、乳制品和各种肉类）等普通事物融合在一起。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细节之后，马可·波罗随即将目光转向更值得关注的锡兰岛（即马可·波罗所说的萨兰迪布岛）。

这样一来，《寰宇记》的第172章似乎汇集了拉丁欧洲人关于“卑劣他者”的所有贬低之词，堪称最恶毒的殖民话语的先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马可·波罗的这段记述其

实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文本传统的一部分。早于《寰宇记》问世的三部文学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描述。最早的一部作品是成书于9世纪中叶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in wa-l-Hind*）第一部分。《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一部阿拉伯语作品，分为两部分，前面的内容由波斯湾锡拉夫港的一位匿名作家写就，后续部分则于10世纪由阿布·赛义德（*Abū Zayd al-Sirāfi*）撰写完成<sup>[13]</sup>。第二部作品是11世纪埃及的阿拉伯语宇宙论著作《科学之好奇与眼界之奇观》（*Kitāb Ghara'ib al-funūn wa-mulak al-ʿayūn*）。第三部作品则是12世纪晚期的《诸蕃志》，作者是南宋泉州港（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刺桐）负责监管海上贸易的市舶使。这三部作品都将锡兰岛上的岛民描述为黑人，其中第一部作品的描述极具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第二部作品虽然形容岛民“像狗一样吃人”，但没有称他们为“犬头人”。<sup>[14]</sup>这三部作品都一致认为岛民会生吃人肉，正如第三部作品所言，“以至于水手们都不敢在这片海岸抛锚停泊”。将这些作品与《寰宇记》并观，其中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根植于前现代印度洋贸易航线、相互关联的文本世界。

在马可·波罗的《印度之书》的其他篇章中，同样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奇迹。比如，在讲述蒙古人入侵日本失败时，

他提到一种能保护佩戴者免受铁器伤害的魔法石。而描述班卒儿王国的情况时，马可·波罗罕见地忆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重点记载了用树木制作出面粉这一奇迹：“他们制作了很多可食用的糊状物，味道很好。因为容我告诉各位，我们亲自尝了很多，还吃了好几次。”（第170章，第154页至155页）更多时候，他描述的“奇迹”都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比如，马可·波罗以平静的笔调记述道，马八儿国的国王巡行时赤身裸体，但他所佩戴的“美丽珍珠和其他宝石”，其数量却“令人叹为观止”（第174章，第158页）。当这位国王去世时，那些一直伺候他的侍从会“纵身投入火海，与国王一同火化，以便在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他”（第174章，第158页）。在记述同样位于印度东海岸的“拉尔省”时，马可·波罗描述了瑜伽行者的苦修生活。他将其定义为婆罗门的“正规神职人员”（与拉丁基督教修道会的修士相对应），称赞婆罗门“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人，也是最诚实的人”（第177章，第165页）。婆罗门本就过着节制的生活，他们不吃肉、不喝酒，也不放纵情欲，“除非与妻子在一起”（第166页）。然而，瑜伽行者却将这种节制的生活方式实践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们不杀生，不吃任何新鲜的蔬菜或植物，只吃晒干的；他们全身赤裸地睡在地上，身上不盖任何被子，身下也没有任何垫子。

“这真是一大奇迹——他们不仅没有死去，还能像我前面描述的那样长寿。他们在饮食上非常节制，因为他们终年斋戒，只喝水，不喝别的。”（第177章，第168页）在这位拉丁基督教观察者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是预想中的谴责，而是对商人诚信的赞美与对“正规神职人员”苦修精神的钦佩。

在印度洋航行期间，马可·波罗遇到的最大奇迹是当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描述小爪哇岛（苏门答腊岛）时，他写道：“首先容我告诉各位一件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各位要知道，这座岛屿位于极南之地，以至于连北极星都看不到。”（第166章，第151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他又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容我告诉各位，这里根本看不到北斗七星（大熊星座）。”（第167章，第152页）直到航行至印度次大陆最南端，马可·波罗才抵达了一个可以看到北极星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北极星，自爪哇岛航行至此，我们才得以重新看到北极星。从这里出发，往海里航行约30英里，就能看到北极星距离海面约一肘<sup>1</sup>高”（第181章，第173页）。沿着马拉巴尔（今印度喀拉拉邦北部）海岸航行时，“北

---

1 肘是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通常指从中指指尖到肘关节的距离。不同文明中的“肘”的长度差异显著，大约为43-56厘米不等。——译者注

极星的位置更高了，似乎高出海面约两肘”（第 183 章，第 174 页）。最后，到达古吉拉特<sup>1</sup> 王国时，“北极星更加明显，看起来约有六肘高”（第 184 章，第 175 页）。马可·波罗对北极星重新出现和相对高度的仔细追踪提醒我们，南半球的天空对于航海的威尼斯人来说是多么令人迷失方向。在马可·波罗关于印度的记述中，最令人惊讶的差异并非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是显现在天空之中，因为婆罗门和瑜伽行者的生活习惯可以与我们的西方风俗相类比，而对食人族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

---

1 古吉拉特位于印度西部。——译者注

# MARCO POLO



第 四 章

动物、植物与矿产：商人和他们  
的世界

and  
HIS  
WORLD



信息的传播路径与船只和长途商队的路线相同……甚至可以说，信息是通过商人传播的。这些人通常对补给站点、交易方式、具体行程和人脉关系等信息守口如瓶，即使他们偶尔健谈，也往往只对可能有利于他们生意的商业据点和势力感兴趣。<sup>[1]</sup>

——弗朗索瓦-泽维尔·福维尔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 《金色的犀牛：非洲中世纪的历史》  
(*The Golden Rhinoceros: Histories of the African Middle Ages*)

多明我会修士威廉·亚当 (William of Adam) 在他的著作中，将印度指认为拉丁基督教世界在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战争中遭遇“一切祸患”的根源，这个根源“是确凿且长期的，而不是偶然或偶尔的”。那么原因何在？

因为当时在埃及出售的所有商品，如胡椒、生姜等

香料、黄金和宝石、丝绸和那些染上印度独特颜色的珍贵织物，以及所有其他贵重物品，都是从印度运到埃及的。当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商人前往亚历山大港购买这些商品时，他们会让自己面临被逐出教会的危险，因为他们为了交易，不再服从母教（基督教），也不再敬重宗座。<sup>[2]</sup>

威廉的谴责提醒我们，拉丁欧洲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求，是通过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等商人群体得以满足的，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的各大港口获得这些商品。长期以来，亚历山大港一直是此类贸易的核心枢纽，然而，在1291年，即波罗家族三人启程回国的那一年，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征服了十字军港口阿卡（如《寰宇记》第194章所述），使亚历山大港的重要性骤然提升。阿卡是十字军在中东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曾是来自波斯湾或穿越亚洲的陆路商道的终点。鉴于阿卡陷落前后十字军与马穆鲁克之间持续不断的敌对冲突，教皇颁布禁令：严禁所有拉丁基督徒在埃及进行贸易。这项禁令对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其他西方商人的生意构成严重威胁，以致他们越来越暗中无视这项禁令。

因此，威廉·亚当谴责拉丁欧洲人与马穆鲁克的商业往来，凸显了神职人员与商人之间思想和观念的差异。像威

廉这样的多明我会修士将世界划分为“基督徒”与“萨拉森人”，而马可·波罗却时常以“商人”与“非商人”来划分世界，这种划分方式恰恰超越了宗教差异的藩篱。比如，在记述云南行省的情况时，马可·波罗提到那里“有许多商人和工匠……当地居民分为几类，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也有偶像崇拜者，还有少数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第118章，第104页）。这种多元共生的世界观，在马可·波罗对伊斯兰世界中心巴格达的记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巴格达是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全世界萨拉森人的哈里发驻蹕于此，正如全世界基督徒的领袖居于罗马一样。一条宽阔的大河穿城而过，顺着这条河可以顺利抵达印度洋。

在那里，商人们带着商品往来不绝。要知道，沿着这条河从巴格达航行到印度洋，需要十八天。想去印度的商人沿着这条河顺流而下，到达一个叫基什的城市，然后从那里进入印度洋。（第25章，第20页）

在同一章节中，马可·波罗还重点讲述了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于1258年征服这座城市的过程，这一事件对世界

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结束了阿拔斯王朝长达五百多年的统治。马可·波罗——或者更有可能是鲁斯蒂谦——虚构了一场胜利的征服者与战败的哈里发之间的对话。旭烈兀没有进行任何明显的拉丁基督教式的说教，而是谴责战败的哈里发一味囤积财富，却没有用这些财富雇用军队来保卫自己的王国。此外，马可·波罗还重点描述了从事印度贸易的商人们——其中大部分商人肯定是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他们频繁往返于巴格达和波斯湾之间。

威廉·亚当对商人们在亚历山大港交易香料和其他印度奢侈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提醒我们，在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完成《寰宇记》后的十五到二十年间，在绝大多数拉丁基督徒眼中，埃及仍然是获取这些东方商品的门户。鉴于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寰宇记》中对某个城市或某个行省所产商品的罗列显得重复且公式化，但这些信息无疑深深吸引了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令他们迫切想要弄清那些珍贵商品的来源——毕竟，他们通常只能通过非基督徒商人的中介，才能在亚历山大港等港口获得这些商品。在成书于10世纪中期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阿布·赛义德描述了印度和中国之间海上贸易的种类之丰富。

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珍珠和龙涎香等海产，宝石和黄金等矿物，象牙等动物制品，乌木、苏木、藤条等林木产品，樟脑、肉豆蔻、丁香、檀香、沉香等香料和芳香木材，鹦鹉和孔雀等鸟类，麝猫和香獐等动物，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珍奇物产，实在难以一一列举。<sup>[5]</sup>

这些由商人经欧亚大陆流通的异域商品（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究竟都有哪些？它们在前现代世界的不同地区是如何被使用的？关于这些商品的来源，马可·波罗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 动物

在前现代世界，动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其重要性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绵羊、山羊、牛、骆驼，当然还有马，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蒙古人和其他中亚民族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另外还有大象，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者在战斗中使用大象，并在彰显王权的仪式表演中骑乘大象。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马可·波罗在

整部《寰宇记》中始终对各类动物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用平淡的口吻描述火葬等习俗（这些习俗可能令他的基督徒读者感到震惊），却用最生动的语言描述世界各地的动物。他的热情始终与“多样性”这一核心主题紧密相连，《寰宇记》的开篇就对这一主题予以强调。对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作者往往通过与我们熟悉的拉丁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而予以消解，如他说巴格达的聂斯脱利派主教（东方教会的首领）“像罗马教皇一样”处理事务（第24章，第19页），又将印度的瑜伽行者称为“正规神职人员”（第177章，第167页），让人联想到西方严格按照教规生活的修士。然而，在描述鸟兽时，马可·波罗却着重突出它们的新奇特性。例如，马可·波罗写道，在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那里的动物“与我们欧洲的动物有许多不同之处”（第174章，第161页）。在印度西南海岸的故临（今奎隆）有“许多不同的动物”，包括狮子和孔雀，“与世界上其他的同类不同……因为气候炎热，（这里的动物）更美丽、更健硕”（第180章，第172页）。最令人难忘的是位于今阿富汗东北部山区的巴达赫尚，这里有“许多体型硕大的野羊，其羊角足有六个手掌那么长……当地牧人用这些羊角制作吃饭用的大碗。牧人还用这些羊角做成围栏，用以圈养他们的牲畜”（第50章，第40页）。如今，这些体型硕大的



图 37 马可·波罗盘羊（帕米尔盘羊）

动物——如今是大型动物狩猎者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关注的对象——被称为马可·波罗盘羊（图 37），其拉丁学名为“*Ovis ammon polii*”。

然而，对于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商人来说，动物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中世纪世界广泛交易的数种奢侈品的重要来源，这一点他在整部《寰宇记》中都特意指出过。

## ++ 芳香的世界：龙涎香和麝香

如今，龙涎香和麝香通常是人工合成的，但在中世纪，它们却是制作香水和药物的主要原料。10 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所著的《典仪论》（*The Book of Ceremonies*）中将龙涎香和麝香（与糖、乳香和肉桂一起）列为进行军事行动时必须携带的物品。而梅迪纳亚萨拉<sup>1</sup>（西班牙穆斯林政权中心哈里发宫城所在地）出土的一个 10 世纪的象牙浮雕罐，其盖子上刻有如下铭文：“这是一个盛放樟脑、麝香和龙涎香的容器。”（见图 38）伊本·马萨维赫（Ibn Mūsawīh）的《论简单的芳香物质》（*On Simple Aromatic Substances*）、肯迪（al-Kindi）写于 9 世纪的《香精的化学》（*Book of the Chemistry of Perfume*）以及诗人萨里·本·穆罕默德·拉法（al-Sarī bin Muhammad al-Raffā）写于 10 世纪的《所爱之人与所闻之香及所饮之物》（*Book of the Beloved and What Is Smelled and What Is Drunk*）等阿拉伯语著作都提到了香水，证明了龙涎香和麝香在中世纪伊斯兰文化中的价值。

虽然龙涎香和麝香经常被相提并论，但它们的动物来

---

1 意为玫瑰之城。——译者注



图 38 梅迪纳亚萨拉出土的象牙浮雕罐，约制作于 966 年

源截然不同。龙涎香（阿拉伯语为“anbar”）是抹香鲸消化道分泌出的一种蜡状物质。和珍珠在牡蛎壳中形成的过程一样，龙涎香是抹香鲸在消化道内包裹乌贼内壳等刺激物时产生的分泌物。因此，它是一种海产品。龙涎香通常漂浮在印度洋的海面上或被冲到岸边，其来源长期以来是个谜。人们对它有各种不同的推测，有人说它是海底泉眼的涌生物，有人认为它是海洋真菌，还有人猜测它是某种海洋动物的排泄物等。《中国印度见闻录》的匿名作者立足于波斯湾的视角，用阿拉伯语写道：“龙涎香形如蛋，圆润而呈青灰色。”在月光皎洁的夜晚，经过专门训练的骆驼会“沿着海岸扫描式搜寻龙涎香，一旦发现便屈膝跪地，以便让骑乘者下来拾取”。这位作者接着写道，有时，漂浮于海面的龙涎香会被鲸鱼吞食，渔民便会捕杀鲸鱼，从其体内取出龙涎香。

任何与鲸鱼的胃接触过的龙涎香都是不纯净的，这种带有馊味和腥味的龙涎香，在梅迪纳萨拉姆（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药商那里都有出售；而未受鲸鱼胃部臭味污染的龙涎香，都是极为纯净的<sup>[4]</sup>。

在拉丁西方世界，古法语中的“ambre gris”或“grey

amber”（灰色琥珀）是现代英语“ambergris”（龙涎香）一词的来源。人们常将其与“ambre jaune”（琥珀）或“yellow amber”（黄色琥珀）对应看待，后者指常被冲上波罗的海沿岸的树脂化石，因为两者都是从水中采集的。<sup>1</sup>

由上可知，龙涎香产于印度洋西部海域。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最上乘的龙涎香”产自巴巴拉（索马里海岸）、桑吉（阿拉伯语对赤道以南东非海岸的古称）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赫尔港附近。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从穆斯林旅伴和从事印度洋贸易的同行商人那里间接了解到龙涎香的，他对上述龙涎香产地的说法基本赞同，并将摩加迪索岛（很可能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桑给巴尔岛列为龙涎香的产地，“因为那里能捕获很多鲸鱼”（第192章，第183页）。不过，他并没有采纳《中国印度见闻录》中那些更为离奇的说法，只是提醒读者“各位要知道，龙涎香来自鲸鱼”（第191章，第181页），略去了鲸鱼吞食海上漂浮的“龙涎香蛋”的奇谈。

产自印度洋西部的龙涎香，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并不为

---

1 法国人起初根据龙涎香的阿拉伯名称“anbar”（安巴尔），将其称为“ambre”；后来又用“ambre”来指“琥珀”，这样就造成了名称上的混乱。最后法国人改称龙涎香为“ambre gris”，称琥珀为“ambre jaune”，以示区别。“ambre”进入英语后作“amber”，仍指“琥珀”；“amber gris”进入英语后则连写成“ambergris”，意思仍是龙涎香。——译者注

人所知，但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备受珍视。10 世纪的波斯医师兼博学家拉齐（al-Rāzī）、11 世纪的伊本·西那 [Ibn Sīnā，拉丁名为 Avicenna（阿维森纳）] 和 12 世纪的安达卢斯哲学家伊本·鲁世德 [Ibn Rushd，拉丁语名为 Averroes（阿威罗伊）] 等人，都对龙涎香的药用价值赞誉有加。与麝香一样，龙涎香也被用作香水的定香剂。此外，在 13 世纪叙利亚阿拉伯“黄金时代”的烹饪书《宴会宾客钟爱的美味佳肴与香料》（*Kitāb al-Wuṣṭah ilāl-Habīb fi Wasf al-Tayyibāt wal Tib*）中，许多香水的调制都用到了龙涎香，尤其在调制被称为“安巴里纳”的香水时。书中提到一种檀香安巴里纳，据说在夏天或炎热的天气里使用，可以“使体液变凉”，因此很受欢迎。其制作方法为：“将檀香削成碎屑，碾成粉末，用玫瑰水调成糊状，然后铺在瓷碗里。用龙涎香熏制五遍，加入黄蓍胶、玫瑰水和麝香的混合溶液，最后塑形成香，制成安巴里纳，是为香中极品。”<sup>[5]</sup> 另外，龙涎香还可以添加到饮料中，也可以用来熏制液体或盛放液体的器皿（最常见的）。龙涎香还被用于制作口气清新片、洗手粉以及用作烹饪羊肉和鸡肉菜肴的佐料。

与龙涎香一样，麝香也是一种动物 [用马可·波罗的话来说，是“一种像瞪羚一样的小动物”（第 72 章，第 61 页）] 的腺体分泌物，

被用于制作香水、医药和烹饪菜肴。伽色尼（今阿富汗东部）王朝的苏丹马哈茂德（Mahmūd）的宫廷诗人温苏里（Unsuri）在一首诗中写道，维齐尔<sup>1</sup> 宫殿的花园里有一处“麝香喷泉”。在烹饪书《宴会宾客钟爱的美味佳肴与香料》中，麝香的用途与龙涎香相同，甚至在某些食谱中的使用也与龙涎香毫无二致。此外，麝香还用于腌菜和抓饭的调味，以及各种糖果和烘焙食品的制作中，通常与玫瑰水混合使用。法赫鲁丁·古尔加尼（Fakhraddin Gorgani）在 11 世纪中叶的波斯浪漫爱情小说《维丝和莱明》（*Vis and Ramin*）中暗示，麝香要比龙涎香更加珍贵：为了让维丝相信莱明优于其他追求者，维丝的奶娘说：“如果那些人是星星，那他就是太阳。如果那些人是龙涎香，那他就是纯麝香。”<sup>[6]</sup> 在《寰宇记》问世一二十年后，一位名为希哈卜·丁·努韦里（Shihāb al-Dīn al-Nuwayrī）的埃及官僚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The Ultimate Ambition in the Arts of Erudition*，又译为《文苑观止》）。在这部书关于芳香剂的章节中，作者将麝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他指出麝香的产地是西藏，并引用以前的权威人士的观点解释说，麝香品质的差异取决于其在运

---

1 维齐尔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译者注

输途中(经由伊朗东部的呼罗珊是一条颇受欢迎的路线)耗费的时间,或产香动物所食牧草的质量。

在拉丁西方世界,麝香比龙涎香更出名。对波罗家族来说,麝香尤为重要。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在他的财产清单中,就列有三箱价值217杜卡特的麝香。此前,马可·波罗的叔叔于1310年去世时,其遗嘱显示,马可·波罗和马菲奥曾接受商业伙伴用麝香来抵偿部分欠款。同年,马可·波罗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与一位威尼斯同乡建立了临时合伙关系,共同出售1.5磅麝香——但由于那位负责海外销售的合伙人未能全额归还所欠利润并私自扣留了部分麝香,这笔交易最终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麝香还是马可·波罗向一位香料商的妻子提供贷款时获得的部分抵押品。

我们不知道波罗家族对麝香的兴趣是否早于他们的亚洲之行,但自他们返回威尼斯后,麝香贸易显然已成为整个家族商业经营的核心。因此,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对麝香尤为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特别指出“世界上最好和最优质的麝鹿”来自唐古特。猎人捕到麝鹿后,“会在其腹部发现一个囊袋,这个囊袋位于麝鹿的皮和肉之间。猎人会把它连同皮一起切开,把里面的分泌物取出来。这种分泌物

就是麝香，它能散发出浓烈的香味。要知道，此地盛产麝香，而且品质优良，这些我前面已向各位叙述”（第72章，第61页）。

马可·波罗写道，在西藏地区，能产麝香的动物被称为“古德利”（第115章，第101页）；而在建都<sup>1</sup>，“猎人们捕获这些动物，获取大量麝香”（第117章，第10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汗八里（元大都）皇城外的苑囿中，那些“能产出麝香的动物”与黄占鹿、黑松鼠、白隼等珍禽异兽一同被豢养（第84章，第74页）——这些想必是忽必烈从帝国疆域内征集的贡品，用以彰显其都城的恢弘气象。

虽然在我们的印象中，中世纪是一个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难闻气味的时代，但马可·波罗对龙涎香和麝香的着重描述提醒我们，那也是一个充满馥郁香气的时代。

## ++ 珍珠

蒙古人在迅速崛起之前，只知道淡水珍珠产自他们的祖地——满洲北部的河流。然而，军事征服很快让他们获得了数量惊人的优质珍珠。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其著作中

---

1 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译者注

写道，1226年，当中国北方的金国皇帝向成吉思汗俯首称臣时，他进献的贡品中就包括一盘硕大华贵的珍珠。成吉思汗赐给所有穿耳孔的随从每人一颗珍珠，然后下令将剩余的珍珠撒在地上，“让百姓去捡”。经过三代大汗之后，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宫廷对珍珠的流通和再分配进行了严格控制。如前所述，珍珠与宝石、黄金、白银、丝绸一样，都是商人定期上缴国库以换取纸币的珍贵商品。在大汗的新年庆典上，臣属的各个行省、地区的长官和藩属统治者都会进献珍珠（同时还会进献黄金、白银、宝石和华美的白布），以敬祝大汗“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百福具臻”（第89章，第79页）。从建都的一个湖中采集珍珠的数量受到严格管制，以免过度采集降低珍珠的价值：“如果大汗想要珍珠，会特许一些人为他采集珍珠。但其他人不得擅自采集，否则会被处死。”（第117章，第103页）然而，实际上，大多数珍珠都产自印度，经由新近被征服的中国南方港口运抵汗八里：福州是“珍珠和其他宝石交易的大集市”（第156章，第140页）；“许多大而优质的珍珠”和其他“价值连城的宝石”都从刺桐进口，税率为10%（第157章，第141页）。

这些珍珠后来都流向了何处？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珍珠在蒙古人的礼服中随处可见。在宫廷画师为忽必烈的察必

皇后所绘的著名肖像画（见图1）中，察必的孛黑塔（即蒙古妇女在宫廷场合所戴的高高的圆柱形头饰）上装饰着簇拥成花朵图案的珍珠，还有几串长长的珍珠流苏垂在这位高贵可敦的耳际两侧，一直垂到肩部以下几英寸处。十三套质孙服<sup>1</sup>（只有一种颜色的长袍）上都饰有“十分华贵的”珍珠，大汗会在节日庆典场合将这些长袍赐给他的一万两千名禁卫军成员（第90章，第80页）。

鉴于珍珠对蒙古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性，马可·波罗的《寰宇记》中频繁出现对珍珠的记述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可·波罗写道，日本的珍珠“呈淡红色，非常美丽，圆润、硕大而饱满”，其价值“等于甚至超过白色珍珠”（第159章，第144页）。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产珍珠最多的地方是印度。在马八儿国，商人们组成不同的团队，再组建一支由小船构成的船队，雇潜水员出海采集珍珠。出海后，他们会请婆罗门给鱼“施咒”，使它们不伤害潜水员。

---

1 在元代的宫廷大宴上，与宴者的服装都是同色的，称“质孙服”。据记载，忽必烈曾在一次质孙宴上选出一万两千名禁卫军（类似明朝的锦衣卫），赐予每人十三套质孙服，一套一个颜色，十三套便是十三个颜色，并且每套质孙服都镶有珍珠、宝石，十分华贵。——译者注

他们潜入海底，寻找人们所说的牡蛎，因为牡蛎的壳里含有大小不一的珍珠。他们尽量长时间地待在海里，以捕捞更多的牡蛎，直到无法再屏气，才浮出水面呼吸。珍珠就是这样被采集上来的，其数量之多，难以计数。要知道，从这片海域采集的珍珠，被销往世界各地（第 174 章，第 157 页至第 158 页）

马八儿国的国王戴着一条用丝线串起“104 颗硕大而美丽的珍珠和红宝石”、价值连城的项链（第 174 章，第 158 页）——这是他对珍珠采集者征收 10% 的税而积累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据马可·波罗记载，那些无法直接进入珍珠渔场的人不得不采取其他策略，比如拉尔省（印度的一个省，学者们至今未能确认其具体位置）“富甲一方的国王”，“与国内所有的商人约定，凡是他们从马八儿国（那里盛产最优质的珍珠）带回的珍珠，他都愿意出双倍的价钱收购。于是，许多婆罗门前往马八儿国，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上好的珍珠全部买下来，然后将它们呈献给国王，并如实告知他们花了多少钱。国王立即付给他们双倍的价钱，且从来只多不少。正因如此，他们为国王带来了大量质量上乘的硕大珍珠”（第 177 章，第 166 页）。

正如我们所见，来自马八儿国的珍珠通过海上航线运抵中国南方的各大港口。正如马可·波罗所言，福州市场上充盈着珍珠和其他宝石，“因为许多印度商船载着往来于印度洋诸岛的商人云集于此”（第156章，第140页）。

不过，珍珠同时也向西流通，尤其是流向波斯湾的霍尔木兹，那里是商品转运中心。商人们从印度运来珍珠，还有“各种香料、宝石……丝绸和金丝织物、象牙以及诸多其他商品”，然后将之“卖给其他商人，后者再将这些商品分销到世界各地”（第37章，第30页）。正如我们所知，这是印度奢侈品被运往亚历山大港的一条路线，到了亚历山大港之后，这些奢侈品会被转售给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中间商。但商品在运输途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要到达霍尔木兹，船只必须经过古吉拉特王国沿岸的危险水域，在那里，珍珠是海盗们的必抢之物。

这个王国有世界上最猖獗的海盗。容我告诉各位，他们犯下的恶行就如我所描述的那样。每当这些穷凶极恶的海盗抓住商人，他们会让商人喝酸角汁与海水混合的液体，致使商人剧烈呕吐，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海盗们把商人吐出来的东西收集起来，在其中翻找是否

有珍珠或其他宝石，因为海盗们说，商人被俘后会把珍珠和其他宝石吞进肚里，以防被劫掠。（第184章，第175页）

不出所料，马可·波罗谴责那些伤害商人的人和做法是“邪恶”的，却只字不提他们的宗教、种族或政治立场。那些有幸躲过古吉拉特海盗和其他海上危险的人，可以继续航行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和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亚丁港扼守着红海的入口，“所有来自印度的船只都载着货物驶向那里”（第194章，第187页），然后再将商品从那里运往亚历山大港。

## ++ 马

在中世纪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拉丁欧洲对印度及东南亚香料、珍珠等奢侈品的需求，导致贵重金属——尤其是白银——从西方大量流向东方，这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波斯和阿拉伯半岛来说，他们却拥有能用来换取运抵霍尔木兹和亚丁等港口货物的特殊商品——马匹。

有趣的是，《寰宇记》让我们能够将中世纪西方历史学

家们所忽略的亚洲内部长途贸易的一些节点串联起来。例如，由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的后裔统治的伊儿汗国——波斯的蒙古汗国：“上好的战马数量众多，其中许多被运往印度出售。要知道，这些战马价值不菲，每匹马的售价高达 200 法磅<sup>1</sup>，而且大部分马匹都值这个价……这个王国的商人将我描述的这种上好的马运到印度洋沿岸的盖斯和霍尔木兹。他们将马匹卖给那里的商人，然后后者将马转运到印度，以我前述的高价售出。”（第 33 章，第 27 页）

是什么刺激和推动了这种出口贸易？在关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描述中，马可·波罗解释道：

容我……告诉各位，这个王国不产马。因此，该王国每年出产的所有财宝，或者说大部分财宝，都用于购买马匹。我来告诉各位具体情况。来自霍尔木兹、基什、佐法尔<sup>2</sup>、希赫尔和亚丁等地的商人——这些地区盛产战

---

1 法磅又叫里弗尔或利弗尔，是法国历史上使用过的一种重要货币单位，最早出现于查理大帝时代，直到 1795 年被法郎取代。该货币在多个地理区域（如法国、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英国等）流通，并延续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甚至一直沿用至 1971 年。——译者注

2 佐法尔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译者注

马和其他马匹——正如我告诉各位的那样，他们会购买上好的马匹，把它们装到船上，运到这里卖给国王和他的兄弟们，也就是另外的四个国王。每匹马的售价高达500金萨吉，价值超过100银马克。容我告诉各位，该王国的国王每年要买2000匹这样的马，他的兄弟们也会买同样数量的马。但到了年底，能活下来的马不到100匹：因为缺少专门驯养马的人，该国国民也不知道如何饲养马，所以马都死于照料不周。容我再告诉各位，贩卖马匹的商人不让会驯马的人随行，因为他们正希望这几位国王买的马死掉。（第174章，第159页）

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波斯湾的船只“满载货物和马匹”，驶向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卡伊尔港。该港口由五兄弟中的老大统治，是一个“贸易的好场所和好市场”，因为“许多商人从世界各地来此购买商品、马匹和其他物品”（第179章，第171页）。当拉丁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因进口南亚和东南亚商品而面临贸易逆差时，马可·波罗的记载，揭开了伊斯兰世界通过前现代印度洋贸易体系中这一鲜为人知的方面来维持贸易平衡的帷幕。

## 植物

要评估中世纪香料贸易的深远影响，你可以从货架上取下一瓶做南瓜派的香料，看一下其成分。在其中最常见的香料成分里，只有多香果（因其被认为融合了其他香料的味而得<sup>①</sup>名）来自美洲新大陆。而其他成分——肉桂、生姜、丁香和肉豆蔻——这些都产自南亚或东南亚，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它们会通过陆路或（更可能通过<sup>②</sup>）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海上贸易路线被运到欧洲。正如我们所见，威廉·亚当曾抨击印度贸易，因为它引诱拉丁基督教徒，尤其是意大利商人到马穆鲁克统治下的亚历山大港做生意。然而，就在他写下那部抨击作品大约五年前，另一位作者（与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一样用法语写作<sup>③</sup>）对流入亚历山大港市场的货物做了如下描述：

在尼罗河流入埃及之前的河段，人们习惯于每天傍晚将渔网张于宽阔的河面上。当清晨来临时，他们便能从网中捞起进口到这个国家时通常按重量出售的货物，我指的是生姜、大黄、沉香和肉桂。据说这些宝物都来自人间天堂，风把它们从天堂的树上吹落，就像在我们

这个国家，风会把森林里的枯枝吹落一样。<sup>[7]</sup>

上述文字出自《圣路易传》（*The Life of Saint Louis, 1309*），这是一部关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70年逝世，1297年被追封为圣徒）的传记，作者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是路易九世的臣子和忠实伙伴。这段对尼罗河的描述，为后续讲述这位“十字军国王”于1249至1250年在埃及遭遇惨败的军事行动埋下伏笔。上述文字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人们从尼罗河中捕捞东方香料这一“事实”的描述；二是对这些香料源自人间天堂（令人想起《创世记》2：10—14中伊甸园里的四条“天堂之河”）的二手解释。

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创作《寰宇记》时，让·德·茹安维尔亲历的十字军远征埃及之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尽管如此，在14世纪的前十年，茹安维尔写出上述文字，说明即使是在地域或文化上十分相似的人，对印度贸易的看法也是存在差异的。对“十字军东征”的辩护者威廉来说，西方对东方奢侈品的追求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诱使基督教商人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做生意并从中获利。而在让·德·茹安维尔这位曾参与13世纪中期法国国王进攻

马穆鲁克王朝的前身阿尤布王朝（统治者著名的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后裔）的远征军老兵看来，来自东方的异域商品是从尼罗河中打捞上来的漂流物，尼罗河则是四条天堂之河中的一支。由此看来，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所记述的一些特产情况，如马拉巴尔地区盛产胡椒、生姜、肉桂等香料（第183章，第174页），又如爪哇岛盛产胡椒、肉豆蔻、甘松、高良姜、丁香、肉桂以及世界上能找到的所有昂贵的香料（第163章，第149页）等，绝非例行的旅行记录，更不是枯燥的罗列和盘点，而是试图向他同时代的人揭示，他们（西方人）习惯于从亚历山大港的穆斯林商人那里获得的贵重商品的终极源头。马可·波罗对东亚各地的详细描述更是令人称奇，比如他对元帝国内陆城市肃州（今甘肃酒泉）的描述：“容我……告诉各位，这座城市的山里盛产最优质的大黄和生姜。容我实话告诉各位，花一个威尼斯格罗索币就可以买到四十磅新鲜的生姜，而且质量非常好。”（第151章，第132页）

然而，推动香料贸易发展的主要商品，来自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航线。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其中的两种商品——胡椒和樟脑，以及它们在中世纪世界的诸多用途。

## ++ 胡椒

马可·波罗在书中写道，马拉巴尔地区“盛产胡椒和生姜，还出产大量的肉桂，以及数量可观的其他香料和印度坚果”（第183章，第174页）。马可·波罗还提到了黑胡椒，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它实际上原产于这一地区，在16世纪之前，这里一直是黑胡椒的主要产地。胡椒生长在内陆高地，然后由中间商贩运到故临、希利和古吉拉特等沿海城镇的穆斯林商人手中，并由此通过海路，向西运往伊斯兰世界，向东运往中国。正如马可·波罗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每有一船胡椒经由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运往基督教国家，就有一百船胡椒运到刺桐港”，刺桐由此获得巨额财政收入，因为政府对胡椒征收的税高达44%（第157章，第141页）。

众所周知，胡椒是中世纪西方香料贸易的核心商品，自罗马时代起便广受欢迎。在1世纪阿比修斯<sup>1</sup>（Apicius）所著的烹饪书中，八成食谱都要求大量使用胡椒，这种奢侈的做法令脾气暴躁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感到既困惑又恼怒，他

---

1 阿比修斯是1世纪罗马帝国的美食家及美食理论家，其著作《论烹饪》举世闻名，书中记录了古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四百多种食谱。——译者注

认为胡椒无论是味道还是外观都令人讨厌：“想想看，胡椒唯一的可取之处竟是苦味，而我们竟远赴印度求此物！”<sup>[8]</sup>

在中世纪的盖伦<sup>1</sup>派医学中，健康代表着四种“体液”的平衡。和大多数香料一样，胡椒被认为具有“性热”和“生燥”的特点，因此在调和“寒性”食物（包括牛肉、鹅肉、鹌鹑肉等肉类以及动物的脑和舌头等部位）和“湿性”食物（如大多数生鲜水果和蔬菜）方面价值显著。虽然价格不菲，但胡椒仍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普及，价格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参加1101年征服恺撒利亚的热那亚步兵，每人曾获得四十五枚银索币<sup>2</sup>和两磅胡椒籽的犒赏。13世纪中叶，法国诗人吕特伯夫（Rutebeuf）创作了一首讽刺诗，诗中描写了一位自称是“开罗之主”御医的草药医生对贩卖“胡椒和小茴香”商人的蔑视。而创作于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与《寰宇记》的成书时间大致相同）的一首匿名诗，写到一位商人在兜售各种服装和饰品的同时，还贩卖胡椒、孜然和其他异国香料，如生姜、高良姜和藏红花等。

在13世纪的叙利亚烹饪书《宴会宾客钟爱的美味佳肴

---

1 盖伦即克劳迪乌斯·盖伦（129—199），古罗马时期最杰出、最具影响的医学大师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译者注

2 索币是罗马帝国后期及拜占庭帝国前期所使用的钱币。——译者注

与香料》中，胡椒虽然没有出现在麝香或龙涎香做成的复合香料配方中，不过却是广泛使用的调味品，用于烹制各种食物，比如鸡肉、茄子，尤其是羊肉类菜肴。书中特别记载了一道格鲁吉亚烤肉串，作者写道：“我曾为我的叔叔马利克·阿什拉夫<sup>1</sup>（al-Malik al-Ashraf）做过这道菜，愿至高无上的真主慈爱他。”（第6章第14节，第81页）还有一道纳尔吉西耶——一种用羊肉烹制的炖菜，上面放有鸡蛋（蛋黄和蛋清摆成水仙花的形状）。此外，胡椒还用来调制面包屑馅料、制作各种凉菜和腌菜以及“法兰克人和亚美尼亚人”（第7章第103节，第191页）爱吃的味道浓郁的蛋香面包等。胡椒还出现在治疗恶心的药物中。如今，胡椒常与盐搭配使用——盐虽是人类维持身体运转必需的矿物质，也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贸易推动力——但作为典型的进口奢侈品，胡椒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

1 马利克·阿什拉夫（1242—1296），13世纪也门拉苏勒王朝的第三任苏丹，伊斯兰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君主。——译者注

## ++ 樟脑

马可·波罗在《印度之书》中提到，班卒儿王国出产“世界上最优质的樟脑”，且“其售价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相等”（第170章，第154页）。正如百科全书编纂者努韦里在其著作《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中所写的那样，樟脑是从樟树中提取的物质，是“所有树脂中最尊贵的，也最有资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广泛用于各种复方药物和香料”<sup>[9]</sup>。在8世纪的唐朝宫廷里，人们将越南北部进贡的一种上等樟脑制成蝉形和蚕形的护身符，佩戴在衣襟内侧。据《宴会宾客钟爱的美味佳肴与香料》记载，樟脑常被用于香水蒸馏配方，特别是与玫瑰水搭配使用效果极佳，其香味“胜过所有香水”<sup>[10]</sup>。努韦里引用了11世纪伟大的波斯医生阿维森纳（伊本·西那）的话来阐述樟脑的药用价值。

樟脑的药性属三级寒燥，使用过多会使人早生白发。它能消肿止痛，与醋、生枣汁、桃金娘水或甜罗勒水混合，可止鼻血。另外，樟脑还有助于缓解灼热性头痛，并能增强发烧患者的感官功能。不过，它会降低性欲，且可能导致肾结石和膀胱结石的形成。<sup>[11]</sup>

樟脑也用于烹饪。在《宴会宾客钟爱的美味佳肴与香料》中，樟脑与麝香和龙涎香一样，被用于烹饪食物，且三者常搭配使用。比如书中有一道名为“樟脑白肉丸”的菜肴，用剁碎的鸡肉和羊肉制成，需要用到肉桂、芫荽籽、生姜、孜然以及包括坚果和玫瑰水在内的其他配料。这道菜中没有用到樟脑，只是借其名来说明菜肴的颜色：用菜刀将混合好的鸡肉和羊肉剁至“胡椒粒般大小”，使肉末变成白色。<sup>[12]</sup>由此可见，樟脑在当时已如胡椒般深入人心，不仅是一种配料，更化作指导厨师烹饪的精妙隐喻，或许也承载着激发食客食欲的美学意趣。

马可·波罗对优质樟脑产地的认定，与当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旧大陆普遍认知一致。《中国印度见闻录》反映和描述了9世纪中叶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经商情况，它同样将班卒儿王国列为最优质樟脑的产地。12世纪的《诸蕃志》也持相同观点，并补充说樟脑采自一种类似松树的树木，这种树木生长在“山丘深处和最偏远的山谷中”<sup>[13]</sup>。采集者将樟树砍倒，然后在树干上凿出一些凹槽，以便让樟脑液渗出，形成晶体。百科全书编纂者努韦里也证实，班卒儿王国的樟脑是“所有种类中最上乘的”，而“最差的一种樟脑”则产自三佛齐（今爪哇岛附近）。诸多文献对

班卒儿王国樟脑品质的一致认可，充分说明《寰宇记》虽然写于 13 世纪末的热那亚，且用法语写成，但其记载根植于一个跨越多个世纪、涉及多种语言的商业知识网络，这一网络的范围从台湾海峡边的刺桐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有趣的是，马可·波罗并没有提到樟脑被伊斯兰西亚地区的居民用于制作香水和医药或烹饪食物等。相反，他着重讲述了樟脑在南亚和东亚地区被用于防腐和丧葬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在唐古特，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棺材里，以布帛覆盖，“并用樟脑和其他香料加以处理，这样尸体的异味就不会影响到屋子里的人”（第 58 章，第 46 页）。《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关于中国人的丧葬习俗也有类似的记载：普通百姓的尸体用生石灰包裹防腐，而统治者的尸体则用龙涎香和樟脑防腐——这些香料都以市场价的两倍购买，从而人为地抬高了它们的价格（第 1 章 8.3—8.5，第 17 页）。在锡兰（即马可·波罗所说的萨兰迪布），樟脑与檀香、藏红花一起被用于王室葬礼（第 1 章 9.2，第 24 页）。最后，关于樟脑的用途，与用于埋葬或火化国王的遗体不同，马可·波罗描述了苏门答腊岛上某个王国居民的特殊做法。他们专门捕捉“脸长得像人”的猴子，捉到后便剃去它们身上的毛，仅留下巴和胸部的毛发，然后“把它们晒干、塑形，用樟脑和其他东西涂抹，使它们

看起来像人”。马可·波罗愤慨地断言，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和骗局”（第166章，第152页）。



## 矿产

### ++ 宝石

在《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的《关于不同事物的地方特性》一章中，百科全书编纂者努韦里写道：“关于珠宝，人们谈论的是尼沙普尔<sup>1</sup>的绿松石、萨兰迪布的红宝石、阿曼的珍珠、埃及的祖母绿、也门的红玉髓、扎法尔<sup>2</sup>的玛瑙、巴尔赫的石榴石以及伊弗里基亚的珊瑚。”<sup>[14]</sup>当然，《寰宇记》不是根据物质对象（这里指的是宝石），而是根据地理分布来叙述的。尽管如此，通过分析这两种大致同时代描述的异同点，可以勾勒出一幅有趣的知识图景：一方面，学者型官员主要依据阿拉伯传统权威著作获取知识，而另一方面，为大汗效

---

1 尼沙普尔位于今伊朗东北部。——译者注

2 扎法尔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译者注

力的威尼斯商人则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道听途说结合起来。正如我们所见，珍珠在《寰宇记》全书中反复出现，这既是因为它在蒙古宫廷仪典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因为其采集和流通的细节值得玩味。努韦里提到的其他宝石在《寰宇记》中记载较少，这些差异恰恰为我们了解马可·波罗与泛亚洲商品及知识交流的联系提供了线索。

绿松石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努韦里在撰写《关于不同事物的地方特性》一章时，将绿松石与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城市尼沙普尔联系起来。该城是由前伊斯兰萨珊王朝<sup>1</sup>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3世纪建立的，后来成为以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西部)为中心的四个穆斯林帝国的首都。这种“天蓝色的石头”仅产于沙漠地区，在现代早期伊斯兰欧亚大陆上，它逐渐成为帝国辉煌的象征。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的苏丹和君主们都将绿松石作为互赠的礼物，并在他们的建筑和物质文化中突出展现绿松石的颜色——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商人从16世纪开始对绿松石产生了兴趣。马可·波罗称绿松石为“非常美丽的宝

---

1 萨珊王朝(224—651)，又称波斯第二王朝，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译者注

石”（第117章，第103页），但他并没有将其产地定在呼罗珊（绿松石最著名的产地，《寰宇记》对此地记述较少），而是定在了波斯的克尔曼（今伊朗东南部）。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还提到了一个位于中国的绿松石产地——建都，大汗垄断了那里的绿松石开采权。

努韦里提到的其他宝石，《寰宇记》大多只是一笔带过，而对于红玉髓和玛瑙，更是只字未提。祖母绿宝石仅出现在马八儿国国王佩戴的珠串项链中，且珠串上还有许多其他珍贵宝石。珊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正如努韦里所说，珊瑚产自伊弗里基亚（今突尼斯附近），更确切地说，它产自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地中海海域。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亚洲销售的西方奢侈品。马可·波罗在记述克什米尔时写道：“从我们那里采集的珊瑚，在这个国家的销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第49章，第4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关于红宝石，情况却恰恰相反：《寰宇记》中关于锡兰的记载，与努韦里认为最好的红宝石出自萨兰迪布的论断完全吻合。马可·波罗称红宝石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容我告诉各位，此地出产的红宝石品质上乘，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美丽、更高贵。”（第173章，第156页）

正如我们所知，锡兰有一座圣山，佛教徒认为那里是

世尊释迦牟尼的归寂之地，而穆斯林则认为那里是“人类始祖阿丹(亚当)”的安息之所。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的《印度珍异记》是一部成书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的笔记体文献，此书将上述两种说法结合在一起，将发现亚当足迹的地方记述为“一座遍布红宝石和钻石的险峻高山”<sup>[15]</sup>（另一部9世纪或10世纪的波斯湾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没有提到红宝石或其他宝石）。然而，马可·波罗的记载却为这个说法注入了时代的新元素。

此地的国王拥有一块世界上最罕见且最华美的红宝石：它大约有一掌长，一臂粗，是世界上最璀璨夺目、最华丽无比之物。它完美无瑕，炽红如火，华贵至极，实为无价之宝。（第173章，第156页）

在前文中，我们曾读到忽必烈将佛陀的遗物据为己有，而此处他又迅速对锡兰的另一件稀世珍宝提出要求：“容我实话告诉各位，大汗派使者向国王求购这颗红宝石，并且表示，如果国王肯割爱，他愿以一座城市相赠。”（第173章、第156页）然而这一次，忽必烈的愿望落空了：“国王表示，无论给他什么他都不会出让，因为这块宝石是先祖传下来的

宝物。正因如此，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其让予他人。”（第173章，第156页）由于岛上的居民“并非善战之人”，因此国王的拒绝就更加令人震惊了。这块独一无二的红宝石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大汗朝贡权力的局限性。

此外，马可·波罗还记载了两种努韦里在《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中没有提到的宝石。一种是钻石。他说，钻石“全世界无处可寻”，只有印度东海岸的卡卡提亚王朝都城莫图帕利有“大量”的钻石。据他描述，当地人通过三种方式采集钻石。其一，待暴雨引发的山洪退去后，收集从岩壁上脱落的钻石原石。其二，在夏季，人们会顶着酷暑，冒着被毒蛇咬伤的危险，钻到岩石洞穴里采集钻石。其三，也是最奇妙的采集方式：人们把肉块扔进人迹罕至的幽深山谷，钻石便会粘在肉上。然后，被谷中蛇群吸引而来的白鹰会将粘有钻石的肉块叼走。猎人会追踪这些白鹰，要么把它们吓跑，然后从白鹰丢下的肉中获取钻石；如果白鹰把肉吃掉了，猎人就等着从它们的粪便中收集更多的钻石。尽管人们直觉上会觉得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事情不可思议，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讲述恰恰与流传更广的亚洲口述传统相吻合。在《印度珍异记》中，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记载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不过故事的背景不是

锡兰，而是克什米尔；故事中的鸟不是白鹰，而是秃鹫。另一个类似的记载见于 4 世纪地中海的东方基督教文献。塞浦路斯主教萨拉米斯的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 of Salamis）在他的《宝石论》（一部关于宝石的论著）中写道，在《圣经》提到的宝石中，“红锆石”正是人们通过将肉扔进“斯库提亚峡谷”获取的。<sup>[16]</sup>至于锡兰的天赐珍宝，马可·波罗（或许是鲁斯蒂谦）特别指出：“不要以为上好的钻石会被带到我们基督教的土地上。”事实上，“这些钻石都被呈送给大汗，以及各个地区与王国的国王、王公贵族，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足以买下所有昂贵的宝石”（第 175 章，第 163 页）。

此外，在《寰宇记》中，马可·波罗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巴达赫尚王国（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的矿产资源。其中着重记载了“从山中的岩石里开采出一种名为巴拉斯的宝石，非常美丽，价值连城”。这种宝石即巴拉斯红宝石或尖晶石，也可能是努韦里提到的与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城市巴尔赫有关的石榴石。巴尔赫位于巴达赫尚王国的西面约 500 公里处，大约在 1220 年被蒙古人攻陷。和银矿一样，从“深藏于山体内部的巨大（人工）洞穴”里开采巴拉斯红宝石，受皇家控制和垄断。任何人未经许可私自开采或贩运，都将被处以死刑。与锡兰的红宝石一样，巴拉斯红宝石是巴

达赫尚王国外交和财政的基石。

国王派遣使臣将红宝石献给其他国王、王子和王公贵族——有的作为礼物赠送他人，有的作为贡品呈给君主，还有一些会卖给商人以换取金银。国王垄断宝石开采权，是为了让他的红宝石保持昂贵的价格和巨大的价值。因为如果他任由国民随意开采红宝石，并将其卖到世界各地，红宝石的价值必然会下降，价格也会更低。正因如此，国王对私自开采宝石者处以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开采宝石。（第47章，第38页）

除了对巴拉斯红宝石的描述，马可·波罗还补充道：“容我再告诉各位……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座山脉中，人们发现了可以制作青蓝色颜料的石头：这是世界上最优质、最上乘的青蓝色颜料。”（第47章，第38页）这里的石头指的就是青金石，它没有出现在努韦里的宝石名单中，但自古以来就非常珍贵。早在公元前3500年，人们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上埃及<sup>1</sup>

---

1 上埃及指的是埃及南部地区。——译者注

的墓葬遗址中发现了青金石。在中世纪的西方，青金石被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用于制作彩绘手抄本中使用的亮蓝色颜料。到了 13 世纪，颜料的制备技术不断革新，使画家能够调制出深浅不一的蓝色。2019 年，考古学家在一位 11 世纪或 12 世纪德国北部女修道士遗骸的牙结石中发现了青金石的痕迹，这一发现促使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女性在中世纪手抄本制作中的角色。

最后，《寰宇记》中从未提及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至关重要的宝石——玉石，这有力地证明了马可·波罗致力于向读者描述的不是中国，而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世界。

## ++ 瓷器

容我告诉各位，这个行省……出产瓷碗——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你能想象到的最漂亮的瓷碗，都是这个城市烧制的。这些瓷碗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这里有许多大市场，只花一个威尼斯格罗索币就能买到三个碗，每个碗都美得无与伦比。（第 157 章，第 142 页）

这是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唯一一次提到瓷器，

文中所说的城市位于中国南方大港刺桐附近。马可·波罗提到瓷器时,用的是古法语“porcellaine”一词,而在《寰宇记》的其他章节中,“porcellaine”指的是在前现代世界中作为货币广泛流通的贝壳币。尽管马可·波罗盛赞瓷碗的美丽,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它们的颜色,而且奇怪的是,他只提到了瓷碗,而没有提到中国瓷器中特有的罐、盒、枕头或各种人物(还有动物)造型的器物,也没有提到出口到伊斯兰世界的典型瓷器造型。

中国瓷器因其半透明的质地而备受人们珍视,其制作工艺在18世纪之前一直不为西方人所知。长期以来,中国瓷器一直是销往伊斯兰世界的奢侈品。《中国印度见闻录》第一部分提到,中国人有一种“上好的黏土,用它制成的杯子像玻璃一样通透;将杯子对着光,可以看到杯中的液体,尽管它是用黏土做的”<sup>[17]</sup>。福斯塔特(古代开罗)遗址出土了各种形状、釉色、颜色和质量的中国瓷器。中国瓷器在波斯非常流行,以至于波斯工匠为仿制中国青瓷,专门研发出一种名为“砂玻器”<sup>1</sup>

---

1 砂玻器是一种特殊的陶瓷制品,其胎体原料包括石英砂、玻璃熔块和黏土等。砂玻器萌芽于9世纪的两河流域,成熟于11世纪的埃及,是中东地区独有的发明,与陶器、瓷器、釉砂并列为世界古陶瓷体系的四大类制品。——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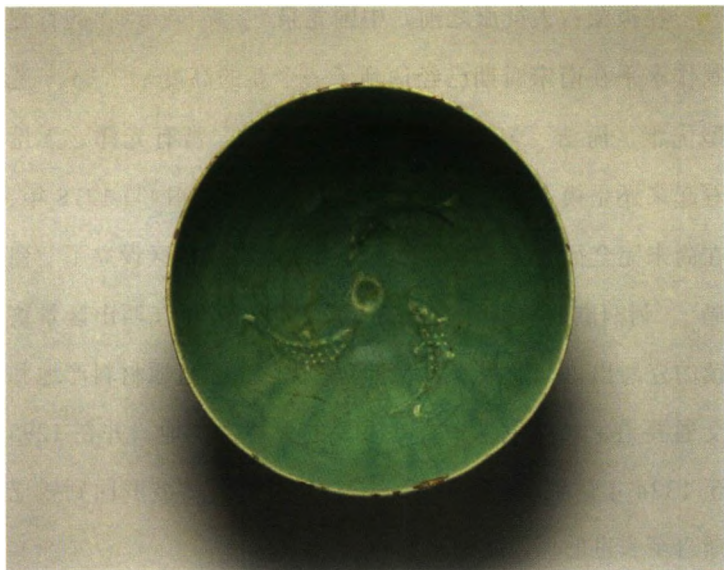


图 39 仿中国青瓷的三鱼纹砂玻碗，伊朗出土，约制作于 1300 至 1350 年

的陶器（见图 39）。在埃及和伊朗发现的中国瓷器，在形制和用途上都不同于供国内使用的瓷器，这表明当时中国已存在专门面向海外市场的规模化陶瓷产业。事实上，瓷器（以及丝绸）也是中国向东南亚（包括大陆和岛屿）出口的主要商品，用以交换高棉、爪哇（印度尼西亚西部群岛的转运站）和占婆（越南中部沿海低地）出产的香料、芳香植物或药物，以及犀牛角或象牙等珍稀商品。

在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龙泉（今浙江西南部）的青瓷制作水平在南宋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青瓷）造型优雅、简洁、匀称，釉色浓厚、光滑、富有光泽，无论看起来还是摸上去都像抛光的玉石。”<sup>[18]</sup>（见图 40）1278 年，在尚未完全征服南宋之际，蒙古人便已在该地区设立了“瓷局”。刺桐港的穆斯林商人负责监督内陆省份江西山区景德镇的瓷器出口。景德镇的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原材料产地和交通要道，长期以来一直是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并在 1295 至 1324 年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正是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直至去世的那段时期（见图 41）。

要理解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瓷器的简短赞誉为何如此热情洋溢，我们只需回想一下鲁斯蒂谦的故乡比萨众多教堂外墙上镶嵌的陶盘和陶碗（图 17）。这些陶器来自比萨的伊斯兰地中海贸易伙伴，有北非和安达卢斯的绿褐彩陶（见图 42）、埃及的虹彩陶器（见图 43），以及同样来自安达卢斯的印纹陶器。总的来说，这些陶器大多制作于 11 世纪，当时伊斯兰世界的陶器要比拉丁欧洲的同类产品精致得多。到了马可·波罗的时代，伊斯兰世界的陶器质量有所提高，部分原因是仿制了进口瓷器。然而，要想与“美得无与伦比”（第 157 章，第 142 页）的中国瓷器相媲美，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图 40 龙泉窑浮雕鱼纹青瓷盘，制作于 13 世纪



图 41 景德镇窑青花蕉石花果纹大盘，制作于 14 世纪



图 42 马拉加锡釉绿褐彩陶，现藏于圣伯多禄大殿



图 43 埃及虹彩陶盘，现藏于比萨的圣西斯托教堂



## 结 语

就在“十字军东征”辩护者威廉·亚当谴责意大利商人在亚历山大港大量收购印度奢侈品之际，百科全书编纂者努韦里对印度贸易这样记载：

据说，印度的海里满是珍珠，印度的山上遍布红宝石，印度的树芳香无比，印度的花馥郁芬芳。印度的沉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香料之一。印度有大象、犀牛、老虎、孔雀和鹦鹉。印度还盛产红宝石、白檀木、象牙、各种芳香精油、天鹅绒，以及用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缠头巾和其他精美织物等。<sup>[18]</sup>

与威廉·亚当一样，马可·波罗也来自地中海北岸，但他对世界的认知与努韦里的更为接近，这既体现在他以商人身份对印度地区动物、植物和矿物奢侈品的欣赏上，也反映在他作为大汗近臣所获得的跨文化阅历里。



# MARCO POLO



第 五 章

肖像画廊：马可·波罗的

同时代人

and  
HIS  
WORLD



在第一章中，我们以 1226 年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 1227 年成吉思汗相继离世时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视角为起点，开启了 13 世纪晚期欧亚大陆互联性的探索。在随后的数章中，我们通过《寰宇记》本身所提示的几个方面来探究马可·波罗世界的复杂性：它的两个别称《大汗之书》和《奇迹之书》；马可·波罗在有关亚洲和印度洋的章节中列出的一系列商品。而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回到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成吉思汗放在一起讨论的灵感源头。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马可·波罗的著作之外，谈一谈恰巧与马可·波罗的生卒年（1254—1324）相近的三位杰出人物——一位来自中国，一位来自印度，一位来自拜占庭帝国和伊儿汗国——他们为 13 世纪下半叶到 14 世纪前二十五年间丰富多彩又相互关联的世界增添了一些别样的色彩和深度。他们各具非凡之处，一位是画家，一位是诗人，还有一位是宗教建筑的赞助人。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彰显了其所属世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内涵往往是学者们在研究蒙古人、蒙古帝国以及全球中世纪的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时所忽视的。

## 赵孟頫

1287年，一位刚到忽必烈宫廷不久的俊逸贵族引起了大汗的注意。

世祖（忽必烈）见之甚喜，令其坐在左丞相叶李上首。有人说，孟頫是宋朝皇室后裔，不宜与皇帝如此亲近，但忽必烈对其抱怨之词并没有理睬。事实上，忽必烈立即任命赵孟頫为尚书省官员，并当场令赵孟頫起草颁行天下的诏书。忽必烈看了赵孟頫起草的诏书后，连连夸赞：“得朕心之所欲言者！”<sup>[1]</sup>

《元史》中记载了大汗对这位“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的新晋才俊极为欣赏的场景。这与鲁斯蒂谦对马可·波罗十几年来到忽必烈宫廷的描述极为相似。然而，除了两人进入蒙古宫廷时年龄不同，他们的身份地位实则存在天壤之别。

赵孟頫于125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926—976）的直系后裔。其父赵与峕（1213—

1265)曾在南宋担任要职，而孟頫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本已做好入仕朝廷的准备。然而，忽必烈征服南宋后，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沦为“遗民”，在蒙古人的“四等人制”中处于最底层。与其他不愿与以大都（**汗八里**）为中心的新政权有任何瓜葛的南宋忠臣一样，孟頫以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归隐于故乡吴兴（**今湖州**），吴兴位于南宋都城杭州（**马可·波罗**笔下的“**行在**”）以北。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太湖南岸，一个以艺术和文学著称的地区，他潜心于传统文人的笔墨研习，一心钻研绘画和书法艺术。

虽然忽必烈早在1271年便采用了一个中国式王朝的名称“元”，但传统史学通常强调的是蒙古征服者与昔日的南宋“遗民”之间的分裂。这一过渡时期的生存现实要复杂得多。随着蒙古的征服，新政权的管理者大量来到南方，其中包括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人和中亚人，他们开始与南方的精英阶层在诸如艺术收藏和鉴赏之类的文人活动中进行交往。这一点在赵孟頫的一些诗作和题跋中可以得到印证。1286年，他成为被特召入仕的二十位江南士人之一。次年，他迁居到大都（**汗八里**），随后有了本节开头描写的那次会面。

鉴于赵孟頫作为宋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他来到大都将有助于提升蒙古统治的威望和合法性。但对元朝政权来

说，赵孟頫作为学者型官员的才干同样宝贵。起初，他受召入职翰林院，翰林院是自唐朝以来的皇家秘书机构，负责校录典籍（包括佛教和道教经文）和撰写新的文书，如纪念碑上的碑文或官方公告（赵孟頫正是凭借其起草诏书的精妙措辞，获得了忽必烈的青睐）。赵孟頫还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兵部负责管理元朝著名的邮驿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赵孟頫因公务频繁往返于大都和南方之间。这些差旅为他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结识了越来越多与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和文人学者，诗歌、绘画和其他文化艺术形式都是他们畅谈和交流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孟頫在官场可谓平步青云，上升速度很快，他曾就重大政事向大汗建言，并最终赢得了大汗重臣阿儿浑·撒里的信任。然而，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多次与忽必烈的首席大臣——权相桑哥发生冲突（最终桑哥失去了圣心，于1291年被处死）。赵孟頫作过一首题为《罪出》<sup>1</sup>的诗，表达了诱使他卷入朝廷“尘网”的“远志”与难舍家乡“高山”、“丘壑”和“南云”之间的矛盾心境，诗中有云：“昔为水上鸥，

---

1 《罪出》全诗为：“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谁为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译者注

今如笼中鸟。”<sup>[2]</sup>

13世纪90年代，即从波罗家族三人离开中国到马可·波罗撰写《寰宇记》的十年间，赵孟頫在不同的职位间辗转，时而入朝为官，时而退隐，这既反映了他为元朝效力的不情愿，也体现了当时政局的动荡。1292年，赵孟頫想要离开京城，于是到济南任职。1295年，即忽必烈去世的第二年，他被召回京城，协助编纂《世祖实录》。任务完成后，他以身体欠佳为由返回吴兴。不过，他于同年所作的一首诗表明，健康问题并不是他致仕的唯一原因。

池鱼思故渊，槛兽念旧藪

官曹因窘束，卯入常尽酉

简书督期会，何用传不朽？

十年从世故，尘土满衣袖

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个不情愿入仕的人。正如《元史》中他的官方传记《元史·赵孟頫传》所言，“孟頫尝累月不

---

1 引自《次韵周公谨见赠》。——译者注

至宫中”。1297年，他被任命为一州长官<sup>1</sup>，但他没有接受。1298年，他与其他著名书法家一起“奉敕以泥金抄录《孝经》”。随后，他拒绝了朝廷作为奖励而授予的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宁愿回到南方老家。

致仕后，赵孟頫一心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与同为画家和诗人的友人交流频繁。与他同时代的年轻画家、收藏家和艺术鉴赏家郭畀（1280—1335）所写的日记<sup>2</sup>，让我们了解到这些退隐乡间的士大夫的社交生活。赵孟頫和他的朋友们互相拜访，游览当地的道观和佛寺，泛舟于附近的水道，尽情享受美酒佳肴，吟诗作画，并互相点评（现存的郭畀作品包括十一幅纸本水墨手卷，描绘的是雾气缭绕的山景和竹林——稍后我们会明白，这是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所钟爱的题材）。这些作品往往为雅集即兴创作，比如郭畀在六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食罢，偕众人游玄同观，见观中四棵梓树苍劲挺拔，遂坐于树下，感微风习习。另作酒诗二十首，赠予赵伯骥。”翌日，郭畀又“为赵兄作《枯石图》一幅……所画之石，其形甚异，然不见凿

---

1 即汾州知州。——译者注

2 此处的日记即郭畀所著的《云山日记》，又名《郭髯手写日记》。因该日记现存为手抄残本，故原文不可考。以下引文皆为译者根据英文翻译的。——译者注

痕，鬼斧神工，仿若仙人雕刻而成”。酷热多蚊的白天过后，夜晚凉风习习，月色如银，清爽宜人。郭界性喜饮酒，他在日记中经常提到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喝得微醺，然后在友人的要求下即兴写字作画（朋友一般会提供适合创作的纸张）。因此，他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以及以兰花、墨竹和“两棵古树”等为题材的画作。在日记中，他提到有一次自己冒雨乘船回家：“乘船者皆凡夫俗子，我跟他们无话可谈。”<sup>1</sup> 这揭示了他和同伴们所处的、那种仅为极少数人享有的特权环境。<sup>[4]</sup>

对于赵孟頫来说，13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是其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他最著名的两幅作品创作于 1296 年，均为高约 30 厘米的纸本设色手卷，即《三世人马图》<sup>2</sup>（见图 44）和《人骑图》<sup>3</sup>（见图 45），前者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作品形象生动、构图洗练，画中的主体人物形象有时被视为画家的自画像，而后一幅作品中的人物有时被视作其弟赵孟頱的肖像。事实上，这些作品

---

1 这句话是译者根据英文直译的，原句已不可考。——译者注

2 《三世人马图》由赵孟頫、赵孟頫次子赵雍、赵雍次子赵麟祖孙三人所画的人马图拼接而成。——译者注

3 《人骑图》是赵孟頫因观唐代韩幹《圉人呈马图》而仿作，该图画一着唐代官服者执鞭骑马，仪态雍容不凡，很可能是赵孟頫的自画小像。——译者注



图 44 《三世人马图》(局部), 纸本设色手卷, 赵孟頫, 创作于 1296 年



图 45 《人骑图》(局部), 纸本设色手卷, 赵孟頫, 创作于 1296 年

体现了赵孟頫作品中社会、文化和个人的紧密联系。在中国文化中，画马有着悠久的历史。伯乐和九方皋的传说家喻户晓，这两位被誉为相马高手，“伯乐”一词则常被用来比喻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的领导或官员。一方面，《三世人马图》将观者置于品鉴者的位置，邀请观者审视赵孟頫履行公务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肥壮的骏马和神态自若、自信满满的马倌，又使这幅画与赵孟頫同时代的两位画家的作品进行了对话：一幅是龚开（1222—1307）的《骏骨图》（见图46），其笔下的马瘦骨嶙峋，暗喻蒙古统治下国家的衰败；另一幅是任仁发（1254—1327）的《二马图》（见图47），根据其题记，画中的马一肥一瘦，象征着廉洁官员和贪腐官员之间的对比。赵孟頫同年创作的《人骑图》，描绘的是一位官员赴任途中的情景。在卷轴装裱处和卷后的一系列题跋中，赵孟頫与其弟之间的问答揭示了画家对自身才华的认知，以及他对前代大师的自觉传承关系。正如孟頫所言：“吾自少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幹<sup>1</sup>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见图48）孟頫很可能在大都第一次看到这些唐代画作，因此《人

---

1 韩幹（约706—783），唐代画家，以画马著称，代表作有《照夜白图》《牧马图》等。——译者注



图 46 《骏骨图》(局部), 纸本设色手卷, 元代, 龚开



图 47 《二马图》(局部), 绢本设色手卷, 元代, 任仁发



图 48 《照夜白图》(局部)。纸本水墨手卷。唐代，韩幹。约创作于 750 年

骑图》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孟頫出仕元廷的决定，不仅为其绘画带来了新的主题，更让他接触到新的风格范本，从而促使他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转变。1295 年回到吴兴后，孟頫很可能将这些早期艺术家及其画风重新介绍给他的南方同僚和文人雅士——此前，由于北方的金朝和蒙古与南宋之间

的政治隔阂，他们与这些艺术传统隔绝已久。

赵孟頫在南方期间可能经常接触的文人包括他父亲的朋友周密，本书第二章描述行在社会生活的那段引文的作者便是此人。在《云烟过眼录》中，周密详细著录了赵孟頫私人收藏的四十三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一些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家之作，如以花鸟画著称的黄筌（后蜀）、以江南山水画著称的董源（南唐）等的作品；还有 11 世纪末北宋绘画大师李公麟的作品，李公麟尤善画马，其骏马图对孟頫及其同时代的人影响颇大；还包括宋太祖另一位后裔赵孟坚（约卒于 1264 年）的作品，赵孟坚擅长画墨竹、古木和花卉。赵孟頫必定格外珍视其藏品中与宋徽宗有关的作品。宋徽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狂热的收藏家，可惜作为皇帝，他太过软弱，



图 49 《五牛图》(局部)，纸本设色手卷，唐代·韩滉

在 1126 年金兵入侵时被迫退位，并被俘虏，最后在囚禁中去世。赵孟頫拥有一幅宋徽宗亲笔所绘的《竹禽图》和两幅经徽宗题跋的作品（一幅书法卷轴和一幅绘画作品）。他还收藏了一幅唐朝画家韩幹的《五陵游侠图》，上面有宋高宗的题跋。赵孟頫收藏的两幅手卷画作尤为特别，因为这两幅画至今仍然存世：一幅是相传为唐代画家韩滉所作的《五牛图》（不过也可能是 13 世纪的摹本，见图 49）；另一幅是前文提及的赵孟頫的《水仙图》（见图 50），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外，赵孟頫还收藏了数件文玩清供：一根白玉簪、几个白玉手镯、一些青铜器、一个香炉和各种石刻砚台等。<sup>[5]</sup>

得益于周密的著录注释以及各种手卷上的题跋，我们得以一探赵孟頫某些藏品背后的“故事”，这些记录的详尽





图 50 《水仙图》(局部)，纸本水墨手卷，赵孟坚，创作于 13 世纪中叶

程度令人惊叹，13 世纪的欧洲藏品极少有这样的记载。据周密记载，赵孟頫收藏的一个嵌金丝小型礼器“鼎”原本是属于贾似道的（贾似道为南宋权相，于 1275 年被诛杀，当时蒙古尚未完全征服南宋）。后来贾似道将此鼎献给当时垂帘听政的谢太皇太后。1276 年，谢太皇太后将南宋都城临安献降于元朝，并在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的保护下于大都度过了余生。此后，此鼎“落入一位高丽商人之手，后来高丽商人将其卖给了胡永<sup>1</sup>”。胡永曾是南宋官员，后在元朝官至高位。其人性情慷慨，乐于交友（无论士庶）。他还是一位鉴赏家——根据周密

---

1 此处为音译。——译者注

对其收藏的描述，可知他尤其喜爱精美的玉器。

赵孟頫为韩滉的《五牛图》写了三段题跋。第一段题跋列举了他见过的韩滉的五幅画作，并提到这幅手卷的两位前主人，他向第二任主人<sup>1</sup>提出购买这幅画作，但这位主人将此画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第二段题跋则引出了6世纪早期的一幅画，画中有两头牛，一头以金络羁首，身形富态但形态拘束，另一头则欢快自由，在水草丰美之地自在地吃草——画家借由这幅画暗指自己正面临着是否入仕为官的两难选择<sup>2</sup>（与伊索寓言中《家犬和狼》的故事异曲同工，是做能吃饱喝足但终日戴着链子的家犬，还是做经常忍饥挨饿，却自由自在的狼，同样难以抉择）。因此，赵孟頫与韩滉《五牛图》的关系尤为复杂：他对韩滉作品的迷恋与韩滉对更早期画作的痴迷相似。1301年，赵孟頫以韩滉画作中的一头牛为原型，创作出了《古木散马图》（见图51）。而对《二牛图》典故的间接援引，更预示了赵孟頫日后常以动物意象来表达蒙古统治下的江南文

---

1 《五牛图》的第二任主人是赵孟頫的胞亲赵伯昂。——译者注

2 出自一则典故：梁武帝萧衍曾请归隐山林的陶弘景出山做官，陶弘景画《二牛图》回赠。梁武帝见了此画，明白了陶弘景的意思，于是不再勉强他。——译者注



图 51 《古木散马图》，纸本水墨手卷，赵孟頫，创作于 1301 年

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就如他在著名的绘画手卷《二羊图》<sup>1</sup>（见图 52，约创作于 1300 年至 1305 年）中所展现的那样。该手卷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1314 年，《五

---

1 《二羊图》中，左边是绵羊，昂首挺立，神情孤傲；右边为山羊，低头吃草，姿态卑微。有学者认为绵羊象征苏武，被俘匈奴仍坚守气节，不肯投降，而山羊象征李陵，兵败后投降匈奴。还有人认为两只羊均代表汉人，绵羊与山羊代表人性的两面，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是抬头还是低头，事关生存。赵孟頫本为宋代宗室后裔，元朝征服南宋后，他应忽必烈的征召，入仕元朝。在当时，入朝为官被江南一带的很多文人所不齿，认为是“投敌”。赵孟頫心中同样有这样的挣扎。——译者注

牛图》被元仁宗的皇太子收藏——据推测，这是赵孟頫在1311年回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朝廷后送给太子的礼物。因此，这两件藏品背后的历史，体现了赵孟頫与南宋和元朝皇室的密切关系。

赵孟頫与周密的交谊远不止于对艺术和艺术收藏的共同雅好。1295年，赵孟頫离开蒙古朝廷后，绘制了一幅题为《鹊华秋色图》的手卷（见图53），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中的鹊山和华不注山位于今山东济南以北，赵孟頫曾在济南任职三年，而济南是周密的祖籍所在，但周密本人从未去过那里。赵孟頫在手卷上写道：“罢官来归，为公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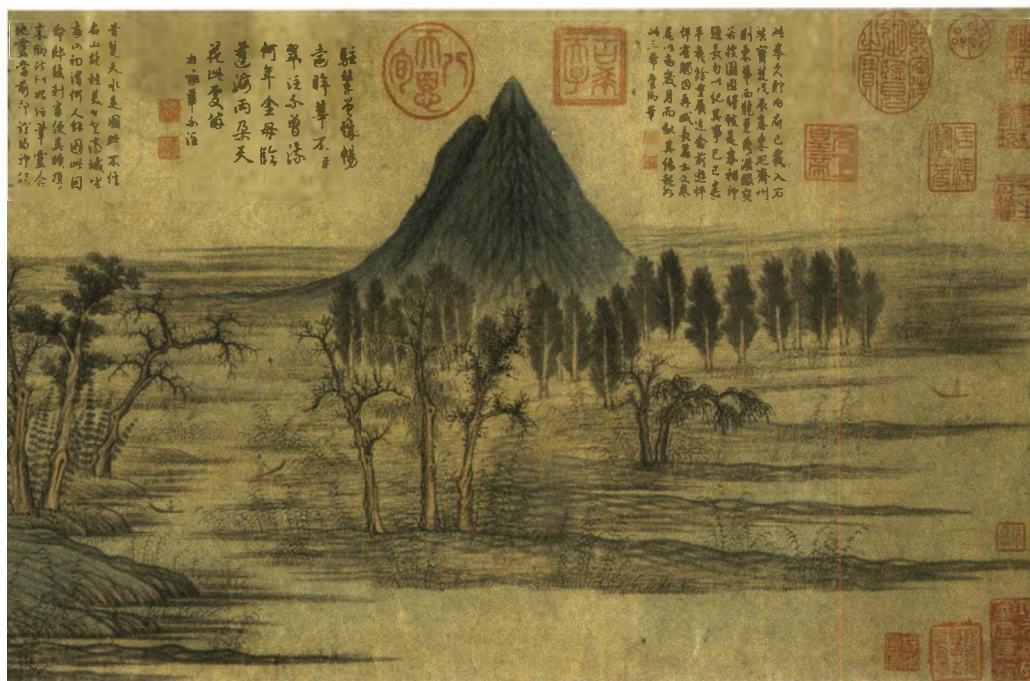
图 52 《二羊图》（局部），纸本水墨手卷，赵孟頫，约创作于1300至1305年



图 53 《鹊华秋色图》(局部), 纸本设色手卷, 赵孟頫, 创作于 1295 年

齐之山川。”他还提到,华不注山因《左传》记载而闻名,“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为作此图”<sup>[6]</sup>。正因为赵孟頫有在元廷中任职的经历,他才有机会为周密描绘其从未见过的祖籍之地。

除了赵孟頫与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也关注他的



妻子管道昇（1262—1319）的生平和创作。管道昇也是知名的诗人和画家，与赵孟頫于1286年成婚，也就是赵孟頫初次前往大都之前。管道昇出身名门望族，两人似乎早就注定了彼此的缘分。赵孟頫后来在妻子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管公性倜傥，以任侠闻乡间。夫人生而聪明过人，公甚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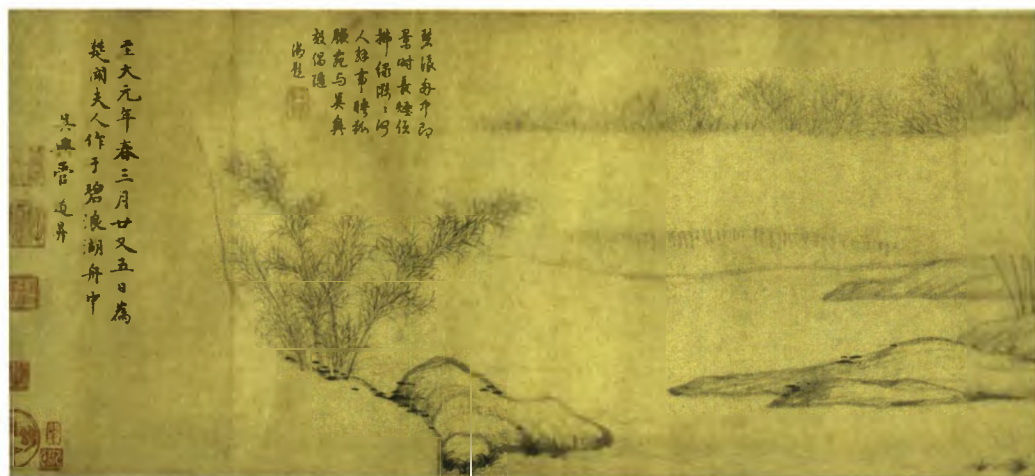


图 54 《烟雨丛竹图》(局部)。纸本水墨手卷。管道昇，创作于 1308 年

必欲得佳婿。予与公同里闾，公又奇予，以为必贵，故夫人归于我。”<sup>[7]</sup>

在夫妇二人隐居吴兴期间，管道昇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 1988 年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展览的图录中，有三十三件真迹或临摹作品均出自管道昇之手，其中最早的作品创作于 1296 年，与赵孟頫《三世人马图》和《人骑图》的创作年份相同。

现存唯一一幅可确定为管道昇真迹的画作是《烟雨丛竹图》(见图 54)，该画作绘于 1308 年，并有题跋注明为“魏



国夫人”<sup>1</sup>所绘。管道昇后来被誉为元初四大绘竹名家之一。竹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它常被称为“君子”，这源于一则轶事，说的是4世纪的一位书法家<sup>2</sup>在自家花园里种竹子，以便与“此君”为伴。北宋末年的诗人兼书法家苏

---

1 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被册封为“魏国夫人”，这也是她被称为“管夫人”的主要原因。——译者注

2 《太平御览》记载了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王羲之的儿子）的故事：“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王徽之平生爱竹，就算暂住在他处，也要与竹共处。——译者注

轼曾调侃道：“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sup>[8]</sup>14世纪初，人们对竹的兴趣愈发浓厚。1307年，也就是管道昇绘《烟雨丛竹图》的前一年，画家李衍的《竹谱》一书问世，该书对中国各地不同种类的竹子加以研究和分析，并配有木刻版图画。这些文人墨客的逸事、言论或作品皆赋予了竹子刚正不阿、高风亮节、坚韧不拔的品质和气质。管道昇的姐姐管道杲为一幅创作于1309年的绢本水墨手卷（现收藏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写了一段题跋。

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国夫人仲姬见访于南浔里第。宴坐君子轩，夫人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爰使奴磨墨，写此幅于轩中……他日妹丈松雪来看，当可乞题咏也。<sup>[9]</sup>

第二年，管道昇在一幅以竹为图的手卷上写道：“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鄙拙可愧耳。”<sup>[10]</sup>

1298年，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共同创作了《寰宇记》，此后，马可·波罗基本上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而赵孟頫在14世纪的头二十年依然活跃在文化舞台上。1300年

到 1309 年间，他在杭州担任浙江等处儒学提举。在那里，他继续写诗、作画、撰写墓志铭，还为他人的作品写题跋，并收集他人为自己的作品写的题跋。1310 年，忽必烈的曾孙、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将孟頫召回京城。次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了其兄长的帝位（即元仁宗），1311 至 1320 年在位。元仁宗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资助并促进汉文典籍的传播和流通，最重要的是，他恢复了被先祖废除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制度。他授予学者和画家显赫的职位和官职。1316 年，赵孟頫被元仁宗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这标志着其仕途达到了巅峰。正如《元史·赵孟頫传》中所记载的，“上眷之甚厚”。在与侍臣讨论文采斐然的文人学者时，元仁宗“尝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等唐宋时期的名人。又言孟頫过人者数事：“一帝胄，二美姿仪，三博学，四操履纯正，五文词高古，六书画绝伦，七旁通佛老之学。”<sup>[11]</sup>管道昇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元仁宗封她为“吴兴郡夫人”，并命人制作了一幅长卷，“令后世知我朝有善书妇人”。随后，元仁宗命孟頫和其子赵雍将他们的作品与管道昇的作品放在一起，“合公及子雍书，善装为卷轴，识之御宝，藏之秘书监，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sup>[12]</sup>。

如今人们多以画作铭记赵孟頫，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且精通乐理，并收藏了许多古琴等雅器。但是，书法才是其艺术世界的核心。无论是在其为官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在其作为文人学者和艺术鉴赏家的私人生活中，尝试不同的书法风格是他应对历史变迁的一种手段。作为南宋末年的皇室后裔，赵孟頫的早期书法作品显然深受其皇室先辈的影响。然而，随着蒙古征服南宋以及他于13世纪90年代进入元朝的官僚体系，他开始更多地借鉴唐朝的书法风格。唐朝是7世纪初至10世纪初的强盛王朝，其中亚渊源使唐朝像元朝一样，乐于向外国敞开大门，与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交流，相互影响。而后，从14世纪初开始，赵孟頫的书法转向了北宋风格。他的一生经历了忽必烈等五任元朝皇帝，可以说其政治生涯既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且成就斐然，而他的书法风格也日益精进，并最终臻于登峰造极之境。

不过，元仁宗对赵孟頫的倚重和恩宠，引来了一些同僚的嫉妒和怨恨。妻子管道昇病倒后，赵孟頫多次上书请求致仕，最终获准携家眷返乡。然而，管道昇在回乡途中去世（1319年）。年近古稀的孟頫对妻子的离世深感悲痛。在管

道昇逝世两周年之际，他给一位得道高僧<sup>1</sup>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派弟子为妻子做佛事。信中这样写道：“先妻必然有超度之望，无非皆出老师之恩。孟頫伏楮，不胜悲感之极。”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赵孟頫将创作重心倾注于亡妻最钟爱的题材——在此之前，他只是偶尔画竹（包括1299年与管道昇共绘了一幅手卷）——其中有一幅题为《古木竹石图》的挂轴，以及已知的他的最后一幅作品《竹石幽兰图》<sup>[13]</sup>。1322年，赵孟頫在吴兴家中去世。



## 阿米尔·库斯劳

与赵孟頫一样，阿米尔·库斯劳（Amir Khusrau, 1253—1325）也是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他一生都生活在德里苏丹国，这是一个穆斯林帝国，由与古尔王朝（位于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有联系的突厥征服者于12世纪末建立。库斯劳的父亲来自巴尔赫附近，巴尔赫是丝绸之路的名城，位于今天的阿富汗境内。13世纪20年代初，库斯劳的父亲在成吉思汗发动征

---

1 即中峰明本禅师。——译者注

服战争之前逃往南方，为德里苏丹国的建立者伊勒图特米什（Iltutmish，卒于1236年）效力。库斯劳的母亲来自德里的一个名门望族，其家族也效忠于伊勒图特米什。库斯劳出生时，德里已是一个世界性大都市。

在伊斯兰世界，它（德里）以学术机构闻名遐迩，是流浪学者和诗人的避风港……当地居民主要由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两大类穆斯林组成：印度教本土皈依者和来自中亚的移民，他们或作为难民定居于此，或被学术机构吸引……这些学术机构也吸引了苏菲派教徒，而德里繁荣的市场也吸引了许多批发商和商贩……<sup>[14]</sup>

与许多中世纪名人一样，阿米尔·库斯劳也是一位博学多才之人，他能同时用波斯语（不仅是德里苏丹国的宫廷语言，也是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的通用语言）和印达维语（德里的方言）写作。据一部14世纪的库斯劳传记记载，库斯劳出生那天，一个疯子预言他将成为最杰出的诗人。库斯劳的父亲（英年早逝）和外祖父（本身也是文学赞助人），都为库斯劳提供了极好的教育，然而库斯劳对诗歌的痴迷使他偏离了正规学业的轨道。正如库斯劳后来回忆的那样：“我刚开始创作诗歌和加扎

尔<sup>1</sup>，就令长辈们赞赏不已、惊叹连连。”<sup>[15]</sup>他与德里另一位最杰出的诗人阿米尔·哈桑（Amir Hasan）一起，成为魅力非凡的苏菲派长老尼扎姆-丁·奥利亚（Nizam al-Din Auliya）的追随者。他的诗作在波斯世界广为人知且极受推崇，甚至赢得了当时来自波斯西南部法尔斯省的著名诗人萨迪·设拉子（Sa'di of Shiraz）的赞誉。

库斯劳生活在政治动荡的时代，当时德里苏丹国的统治权在不同王朝间频繁更迭。库斯劳成年时正值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Ghiyas ud-Din Balban）苏丹在位，这位统治者出身奴隶，在伊勒图特米什之子纳西尔（Nasir）去世后夺取了政权。尽管当时几乎每位君主统治末期都会出现继位危机，但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长达二十年（1266—1287）的统治，为库斯劳文学生涯的开端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1276年，德里城外的一口井上刻有一段梵文铭文，称颂巴尔班“有一份名单将德里苏丹与当地统治者（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并列是‘如珍珠项链一般的七海之地上最中间的那颗宝石’”。这

---

1 加扎尔是一种古老的抒情诗体，起源于7世纪的阿拉伯，后在波斯文学中发展到极致，并随着波斯文化的影响，传播到南亚、中亚等广大地区。——译者注

段铭文以对印度教神祇伽那帕蒂<sup>1</sup>和湿婆的敬颂为开篇，继而历数巴尔班的军事胜利，最后赞叹道：“毗湿奴神……将拉克希米<sup>2</sup>拥在怀中，抛开一切烦恼，安睡在乳海之上。”这无疑是对巴尔班的极高赞誉，因为毗湿奴是在人们危急时刻出现的神灵化身。<sup>[16]</sup>然而，巴尔班建立的王朝在他死后并没有延续多久。他的孙子兼继承人凯库巴德（Qaiqabad）在位仅三年，便于1290年被推翻。新的统治者是七十多岁的贾拉尔-丁·卡尔吉（Jalal al-Din Khalaji，1290至1296年在位），后来他所建立的王朝又被其侄子阿拉-丁（Ala al-Din）推翻。尽管统治残酷，但阿拉-丁在位二十年（1296—1316）还是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他死后，混乱争斗的局面重新出现。阿拉-丁的儿子兼继任者库特卜-丁（Qutb al-Din）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1316—1320），库特卜-丁死后，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Ghiyas ud-Din Tughluq，1320—1325）夺取了政权，开创了另一个新的王朝<sup>3</sup>，该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413年。

---

1 伽那帕蒂即象头神，又称伽内什，是印度教及印度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破除障碍之神、财神以及学识之神。——译者注

2 拉克希米，吉祥天女的梵语音译，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幸福与财富女神，也是乳海之女，据传是毗湿奴的妻子。——译者注

3 即图格鲁克王朝。——译者注

马可·波罗在亚洲的所有时光都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度过的，而阿米尔·库斯劳则经历了德里苏丹国所有的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他为一个又一个王子写诗作赋，为其服务，依附于一代又一代王室赞助人的宫廷和随从。从 1272 年开始，未满二十岁的库斯劳就获得巴尔班侄子的赞助，作为受宠的宫廷诗人安然度过了两年，随后又得到了巴尔班的儿子、孟加拉的统治者布格拉汗（Bughra Khan），以及法定继承人、木尔坦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的青睐。后来，穆罕默德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战死，而库斯劳本人也在战斗中被俘。

库斯劳的文学创作成果丰硕。正如 14 世纪的库斯劳传记作者所言：“图书馆里摆满了他（库斯劳）用波斯语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sup>[17]</sup> 至今最为世人传诵的是他的加扎尔及其《五卷诗》（*Khamasa*），后者改编自 12 世纪波斯文学大师尼扎米·甘贾维（Nizami Ganjavi，卒于 1209 年）的五部著名的浪漫叙事诗集。不过，库斯劳的许多作品都是为不同赞助人撰写的应景之作，其中包括颂诗，如一首创作于 1289 年的长诗，内容是纪念凯库巴德苏丹与他的父亲（库斯劳的前任赞助人）和解；一首创作于 1291 年，讲述的是贾拉尔-丁·卡尔吉取得胜利的故事。此外，还有一首诗创作于 1316 年，是为纪念阿拉-丁之死而作的挽歌。

大约在赵孟頫准备从蒙古朝廷致仕归隐的同时，阿米尔·库斯劳完成了诗歌《九重天》（*Nub-Sipibr*）的创作。这部作品分为九个章节，每个章节采用不同的韵律，颂扬了卡尔吉王朝苏丹库特卜-丁·马利克沙（*Qutb al-Din Malik-Shah*）的统治。诗歌开篇就称颂苏丹，接着讲述了这位苏丹登上王位的过程，并赞美了德里的繁荣，尤其是库特卜-丁建造的宫殿和聚礼清真寺。后面的章节阐述了针对苏丹（以放荡不羁著称）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治国之道和道德教诲。另外，诗中还讲述了苏丹的一次狩猎远征及其儿子出生时的情景，还描绘了不同时节节庆场景。全诗以作者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的自夸结束。

在阿米尔·库斯劳创作的九个章节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三章：作者用自创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对印度进行了详细描述，旨在夸赞印度胜过鲁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对拜占庭及后续塞尔柱帝国<sup>1</sup>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的称呼）、罗马、呼罗珊和于阗（古代佛教王国，位于今中国新疆）等地。他为何认为印度远胜他国？只因印度是他的故乡，更因他的精神导师、苏菲

---

1 11世纪塞尔柱家族统率乌古斯诸部侵入西亚建立的帝国。帝国极盛时领有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大部及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等地。——译者注

派长老尼扎姆 - 丁·奥利亚已将印度打造为“举世瞩目的中心”<sup>[18]</sup>。库斯劳认为，印度是“人间天堂”，首先因为这里气候宜人。他将印度的温煦和暖与阿拉伯盛夏的异常炎热，尤其是与呼罗珊冬季的极度寒冷进行对比，从而将印度与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以及古尔王朝（德里苏丹国创始者的前朝）的所在地区分开来。与雷伊（前伊斯兰时期帕提亚帝国的首都，位于今德黑兰附近）或鲁姆等地不同，那些地区的花仅能绽放两三个月，而“这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且芬芳无比”。在印度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各种植物都蓬勃生长，有芒果、番石榴和葡萄等水果，有小豆蔻、樟脑和丁香等香料，还有香蕉和槟榔这两种“罕见的美味”。另外，这种舒适的气候环境也孕育了一些独特的鸟兽，如鹦鹉，它们能“像人一样说话”，能复诵从《古兰经》经文到祈祷词的任何内容；还有“稀有而美丽”的孔雀——这让我们想起马可·波罗记述的使徒圣多马之死，圣多马就是被一个猎杀孔雀的偶像崇拜者误射身亡的。<sup>[19]</sup>

尽管阿米尔·库斯劳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对故土的热爱使他对印度非穆斯林族群及其文化持包容态度并心怀敬意。他特别盛赞婆罗门的学识：“虽然其他国家也有文人学者，但任何地方的学者写的智慧书或哲学书都没有印度学者的深邃。”除了伊斯兰教法，所有的学术分支，包括

逻辑学、占星术和诗歌，都能在印度找到。除此之外，印度还是自然科学、数学和地理学的发源地之一。阿米尔·库斯劳特别提到了三种奇特的“艺术”，他说，这三种艺术已经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成为“世界上每个体面家庭必会的知识”。一是数学（“0”的概念为印度人首创）。二是寓言故事书《卡里来和笛木乃》（*Kalila and Dimnā*），它源自梵语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hatantra*）——“这部作品如此精彩绝伦且寓意深远，已被翻译成波斯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达里语<sup>1</sup>等”。三是国际象棋，这是“印度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外国人曾试图在这项游戏上超越印度，但未能成功，最终不得不谦卑地承认自己技不如人”<sup>[20]</sup>。

和马可·波罗一样，阿米尔·库斯劳对印度教徒身上发生的奇迹和奇事惊叹不已：比如巫师可以起死回生，可以通过控制呼吸延长寿命（据说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呼吸配额”），可以化身为动物，还能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能像鸟一样飞翔，能在水下待很长时间，能控制雨云，还能隐身。他写道：“其中有些是巫术，有些则只是传说。”和马可·波罗相似，他记载印度教妇女“会为丈夫焚身殉葬”，印度教

---

1 达里语，波斯语的区域性变体，被广泛使用于中亚地区。——译者注

男子则“愿为神灵或长老牺牲生命”。虽然这种自我牺牲“不被伊斯兰教允许”，库斯劳却令人惊讶地称其为“伟大而高尚的行为”，并认为若伊斯兰教允许，“善良的信徒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命”。<sup>[21]</sup>

印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印度语言的多样性上。对于库斯劳来说，这要从伊斯兰教的三种语言说起：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它们“如同散落在地上的珍珠”，每种语言都“起源于特定区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自然，阿拉伯语占据首要地位。它是“学者的语言”，有“固定的、既定的”语法和用法规则，“阅读《古兰经》等宗教书籍和其他科学书籍时必须经常遵守这些规则”，因此需要刻苦学习才能掌握和巩固。

阿拉伯语需要花费毕生时间学习，才能掌握和精通，  
否则就连一页阿拉伯语文献都无法正确理解

这并不是因为学阿拉伯语的人迟钝或愚笨，而是因为  
为学习阿拉伯语需要非凡的悟性和毅力<sup>[22]</sup>

还有波斯语——“一种以设拉子为中心的温婉甜美的语言”，已成为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的宫廷通用语言。波斯

语与阿拉伯语不同，阿拉伯语仅限于学者和精英阶层使用，而波斯语则在平民中迅速普及。库斯劳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波斯语创作的。他认为波斯语缺乏“自成体系的语法”，但人们从未尝试整理出一套语法。对此，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且务实的解释：“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购买者，如果没有需求，它就毫无价值。”<sup>[23]</sup> 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语言中的第三种是突厥语，它随着突厥的统治从其发源地中亚一路传播过来。由于突厥语是统治阶级政治和军事精英使用的语言，因此学者们特意为那些“着迷”于这种语言并用其“处理正式公务”的贵族和军官编纂了词典和语法书。<sup>[24]</sup>

库斯劳指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荣光源自其广袤的地域。尽管其他语言可能“也很优美”，但与贵如“珍珠”的这三种语言相比，它们“既不够甜美，也不够发人深省和启迪人心”，因为它们“仅局限于本国的疆界之内……未能传播开来”——这与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同时代的人选择用法语写作的理由如出一辙，因为“法语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无论是读起来还是听起来，都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悦耳动听”。<sup>[25]</sup> 然而，当话题转向印度本土语言时，库斯劳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标准。他特别强调印度本土语言的多样性：“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语言，每

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体系和特点。”这与马可·波罗记述的南亚沿海城市和王国都有“自己的语言”相呼应。库斯劳接着列举了十几种地区方言，并指出这些语言“自古以来便是印地语系的语言……为普通民众所使用”。此外，还有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语言”，那就是梵语，即“婆罗门的语言”。与阿拉伯语一样，梵语也有“语法、定义、体系、特点和规则以及文献”。梵文的文献包括涵盖“所有艺术和科学”的“四部圣典”（指《吠陀经》）。库斯劳总结道，梵语是“珍珠中的珍珠。它或许稍逊于阿拉伯语，但绝对优于最好的波斯语”。最后，他重申之前的观点，“印度人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印度之外的人”，如汉人、蒙古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不会说这些印度方言”<sup>[26]</sup>。

事实上，除了大量的波斯语作品外，库斯劳还用印达维语——现代印地语的方言前身——进行文学创作。虽然这些作品在他生前未被正式结集，但托名于他的诗作通过口耳相传得以流传，并于18至19世纪被整理出版。其中既有献给他的苏菲派精神导师尼扎姆-丁·奥利亚的虔诚之诗，也不乏诙谐的谜语诗，比如下面这首：

他每年来我的小镇一次

他用亲吻和花蜜填满我的嘴  
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身上了  
他是谁，姑娘，你的男人吗？  
不，是一个杧果 <sup>[27]</sup>

他甚至在一首诗歌中混合使用了波斯语和印达维语，为人们展现了 13 世纪晚期和 14 世纪早期德里地区语言的复杂性。这也是马可·波罗所处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动态语言和文化互动的典型特征。<sup>[28]</sup>

阿米尔·库斯劳的晚年恰逢这位诗人一生中经历的第三个王朝，其建立者为吉亚斯 - 乌德 - 丁·图格鲁克，在位五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新任苏丹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军事统帅。他和儿子联手，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征服在前朝动乱中宣布独立的帝国分裂势力。父子二人先后在孟加拉和卡卡提亚王国（《寰宇记》第 175 章中有提及）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德里举行的凯旋庆典中，年老的苏丹死于一场看似意外事故——有人怀疑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本·图格鲁克（Muhammad bin Tughluq）与此事有关。在后者漫长的统治时期（1325—1351），德里苏丹国的疆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印度王朝，直至其去世才再度收缩。

然而，阿米尔·库斯劳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切。据其传记记载，当他的精神导师尼扎姆-丁·奥利亚去世时，他“把脸涂黑，撕破衣服，在地上打滚”，并预言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果然，库斯劳在六个月后去世，他被安葬在导师的花园尽头，比马可·波罗离世晚一年——正如我们的最后一位主人公拜占庭公主和蒙古可敦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一样。<sup>[29]</sup>

+

## 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

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位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名叫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约1253—1325）。此人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的痕迹少之又少，然而这些仅有的记载，也足够吸引我们去了解。她是尼西亚的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的私生女，尼西亚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产生的残余国家之一。1265年，在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十二岁左右时，米海尔八世将她许配给了巴格达征服者、伊儿汗国的旭烈兀。然而，当她到达伊儿汗国时，旭烈兀已经去世，于是她被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兼继承人阿八哈。大约十七年后，阿八哈去世，玛丽亚便回到君士坦丁堡，



图 55 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的捐助者画像。现藏于伊斯坦布尔的卡里耶博物馆

成为一名修女，并建立了一座非正式的修道院，世人为纪念她，称她为“蒙古圣母玛丽亚”。

玛丽亚的婚姻是当时一系列政治变动和调整中的一环，这些政治变动对波罗家族的远行产生了重要影响。1260 年，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亚洲之行（见《寰宇记》第2章）。自1204年以来，拜占庭帝国一直由佛兰德斯伯爵的后裔“拉丁”（西方基督教）皇帝统治。然而，到1261年，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被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赶下台。正如我们所知，米海尔八世的登基意味着拉丁皇帝的亲密盟友威尼斯人势力的衰落，而对米海尔八世的盟友、威尼斯人的宿敌热那亚人来说却大大有利。因此，当波罗两兄弟于1269年从忽必烈宫廷首次返回威尼斯时，他们没有取道君士坦丁堡（他们最初的出发地），而是绕道十字军的前哨阿卡，这绝非偶然，因为威尼斯人那里仍保有大量的殖民据点。米海尔八世重新掌权，却被众多相互竞争、潜在敌对的国家包围，于是他开始着手实施外交策略，通过出嫁女儿，与诸多王国建立了联盟。

他将嫡出的女儿们许配给周边的基督教统治者：尤多基娅嫁给了特拉比松帝国（拜占庭的另一个残余国家）的皇帝约翰二世·大科穆宁（John II Grand Komnenos）；伊莲娜嫁给了保加利亚沙皇伊凡·阿森三世（Ivan III Asen）；安娜嫁给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的儿子德米特里奥斯（Demetrios）。然而，当时两个最大的地区强国都由蒙古人统治：一个是金帐汗国，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统治；另一个是伊儿汗国，由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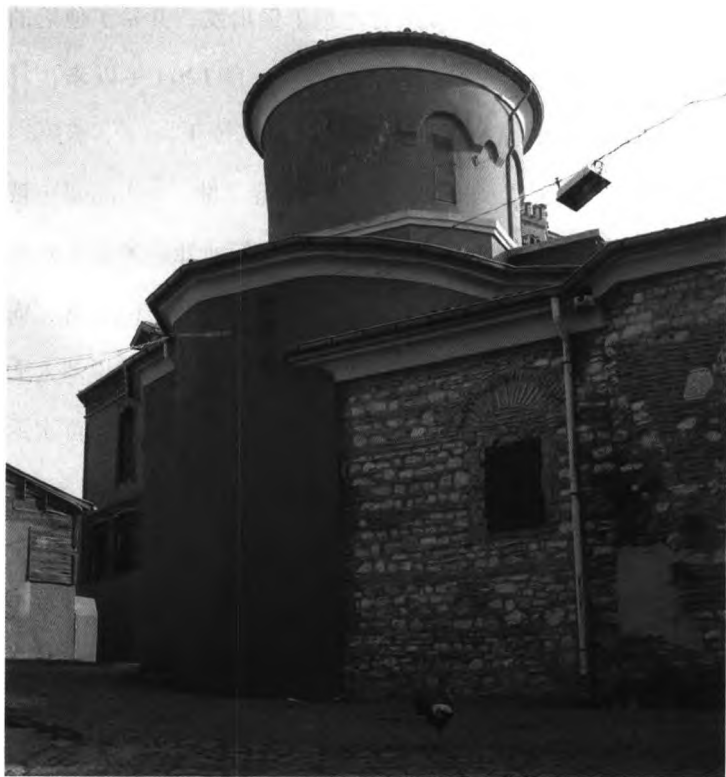


图 56 蒙古圣玛丽亚修道院 (Kanli Kilise, 土耳其语意为“血红教堂”), 伊斯坦布尔

烈兀征服巴格达后（1258年）建立。于是米海尔八世便将自己的私生女嫁给了这些非基督教统治者：尤弗罗西涅嫁给了金帐汗国最西端、黑海以西的诺盖（那海）可汗，玛丽亚则嫁给了旭烈兀。

在伊儿汗国，玛丽亚进入了一个以贵族女性拥有巨大影响力而闻名的世界。她被尊称为“黛丝庇娜可敦”，这个称谓结合了希腊语的“女士”（黛丝庇娜）与蒙古语的“皇后”（可敦）称号。虽然蒙古汗国奉行一夫多妻制，但每个可敦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宫帐。正如马可·波罗在谈到忽必烈的四个妻子时所说的那样：“她们都被尊称为皇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宫廷。”（第82章，第72页）得益于蒙古人对不同宗教的包容，玛丽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她抵达伊儿汗国首都大不里士时，随行的有君士坦丁堡潘托克拉特修道院的院长，还带了一顶装饰着丝绸画像的帐篷，很可能被用作移动礼拜堂。作为可敦，她是当地基督徒（主要是聂斯脱利派，即东方教会的信徒）的保护者和赞助人，但她也推广东正教，特意从拜占庭首都请来艺术家，为她装饰伊拉克北部的一座教堂。

1282年阿八哈去世后，玛丽亚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由她的同父异母兄弟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II）统治。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即使伊儿汗国

因一系列继位争端而动荡不安(见《寰宇记》第 202 章至第 216 章), 玛丽亚仍与她的夫家属保持着联系。她从亡夫的侄子拜都 (1295 年登基 那里得到了 4 世纪伟大的圣徒格雷戈里( Gregory ) 的十字架, 并在几年后作为中间人试图与阿八哈的孙子完者都 (1304 至 1316 年在位) 结成拜占庭 - 蒙古联盟, 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苏丹王朝的创始人奥斯曼 (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在 14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某个时候, 玛丽亚发愿成为一名修女, 并取教名为梅拉尼娅。作为乔拉修道院 (今伊斯坦布尔的卡里耶清真寺) 的赞助人, 她的捐助者画像出现在一幅描绘基督和圣母的马赛克壁画上, 上面题有“蒙古人的圣母, 修女梅拉尼娅”(见图 55) 的铭文。最有名的是, 她赞助修建了一座修道院, 供奉圣母马利亚。为了纪念她, 人们非正式地称这座修道院为“蒙古圣玛丽亚修道院”(见图 56)——这是拜占庭时期唯一一座至今仍保留着基督教风格的教堂。



## 结语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在本章探讨的历史人物出生后十多年降世, 大约在 1320 年完成了《神曲》

的第三部《天堂》。在《天堂》第十九章一些常被引用的诗句中，但丁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出生在印度河畔，那里没有人宣讲基督的教义，也没有人阅读或书写关于基督的事迹”，且“到死都没有受洗，也没有信仰”，他一生无罪，那么让他遭受永罚是否公正？<sup>[30]</sup>作为回应，他的引路人兼对话者——罗马诗人维吉尔斥责他，仅凭人类的理性怎可理解上帝的审判。在拉丁欧洲的背景下，但丁对未受洗礼的印度人命运的悲悯，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早在二十多年前，正如我们所见，马可·波罗就曾以全然平和的态度，描述过“赤身裸体行走”“崇拜牛”，并用牛粪灰涂抹身体的瑜伽行者（第177章，第167页）。将马可·波罗的记载与他同时代、稍年轻一些的作家的著述相比较，更能凸显马可·波罗世界观非凡的包容性——这种世界观无疑源自他的父亲和叔叔展现出来的重商务实精神，以及他对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亲身体认。13世纪70年代中期，马可·波罗来到蒙古宫廷并获得大汗的赏识，这与十余年后赵孟頫的经历颇为相似。13世纪90年代初，马可·波罗随父亲尼科洛和叔父马菲奥返回威尼斯，途中在阿米尔·库斯劳的祖国德里苏丹国的南部沿海港口停留，并沿着拜占庭公主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的足迹穿越了伊儿汗国。



## 后记

所有想了解世界上多样民族之间的不同以及多样地区的多样性的人，请拿起这本书，仔细阅读。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睿智而高贵的威尼斯公民马可·波罗先生条理清晰地描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印度和诸多其他地区——所有最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因为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寰宇记》第1章，第1页，加粗文字

马可·波罗于1324年逝世，享年七十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长期旅居亚洲，还曾被囚禁在热那亚，偶然与比萨的鲁斯蒂谦合作，成就了一部不朽之作。在马可·波罗去世后的第二年，年轻的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开始了他在东非、中东和亚洲等地的旅行，而且花

费的时间比马可·波罗更长。<sup>1</sup>他也因此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长途旅行家。然而，当他于1354年回到故乡丹吉尔时，世界已因14世纪中叶从中亚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场瘟疫造成了人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如今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中世纪“盛期”和“晚期”的分界线。

与此同时，蒙古帝国时代即将结束。伊儿汗国于14世纪30年代灭亡，随后，元朝于1368年灭亡。这就是马可·波罗在《寰宇记》中记录的世界，而本书各章节旨在将其“最伟大的奇迹和最丰富的多样性”生动地呈现出来。

---

1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经历被记录在他的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译者注

## 历史事件年表

|               |                             |
|---------------|-----------------------------|
| 1099 年        |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攻占了耶路撒冷       |
| 1173 年        | 萨拉丁在亚历山大港为威尼斯人建造商馆          |
| 1204 年        |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      |
| 1206 年        | 铁木真成为蒙古大汗，即成吉思汗             |
| 1226 年        |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去世                  |
| 1227 年        | 成吉思汗去世                      |
| 1234 年        | 蒙古征服金国（中国北方）                |
| 1245 至 1247 年 | 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来到贵由的宫廷           |
| 1253 至 1255 年 | 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来到蒙哥的宫廷        |
| 1254 年        | 马可·波罗出生                     |
| 1258 年        | 旭烈兀征服巴格达，推翻了阿拔斯王朝           |
| 1260 年        | 波罗家族两兄弟尼科洛和马菲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亚洲 |
|               | 艾因·贾鲁战役：马穆鲁克阻止了蒙古人向中东扩张     |
| 1261 年        | 君士坦丁堡落入尼西亚拜占庭皇帝之手           |
| 1265 年        | 玛丽亚·巴列奥洛吉娜被许配给伊儿汗国的统治者      |
| 1267 年        | 马丁·达·卡纳尔用法语撰写《威尼斯史》         |
| 1269 年        | 尼科洛和马菲奥经由阿卡港返回威尼斯           |
| 1271 年        | 波罗家族三人离开威尼斯                 |
| 1274 年        | 波罗家族三人抵达忽必烈的宫廷              |
| 1275 年        | 马可·波罗讲述的第一个奇迹“鞋匠移山”发生在这一年   |
| 1279 年        | 蒙古灭南宋                       |

- 1284 年 梅洛里亚海战：热那亚人战胜比萨人  
忽必烈向锡兰国王索要释迦牟尼·薄伽梵的遗物
- 1287 年 赵孟頫进入忽必烈的朝廷为官
- 1288 年 马可·波罗讲述的圣徒多马的奇迹发生在这一年
- 1291 年 波罗家族三人离开蒙古帝国  
十字军港口阿卡港落入埃及马穆鲁克苏丹之手
- 1294 年 忽必烈去世  
热那亚人在阿亚斯附近海域击败了威尼斯船队
- 1295 年 波罗家族三人返回威尼斯
- 1296 年 赵孟頫创作《三世人马图》和《人骑图》
- 1298 年 马可·波罗和比萨的鲁斯蒂谦合作撰写《寰宇记》  
科尔丘拉海战：热那亚人战胜威尼斯人
- 1310 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 MS Français 1116” 手抄本（“F 本”）问世
- 1321 年 四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在南亚港口塔纳（位于印度西海岸）殉教
- 1324 年 马可·波罗去世
- 1335 年 伊儿汗国灭亡
- 1336 年 名为《大汗之书》的法语手抄本（伦敦，大英图书馆，皇家 MS 19DI）出现在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制作的豪华手抄本中
- 1348 年 黑死病在欧洲爆发并迅速蔓延
- 1368 年 元朝为明朝所取代
- 1402 年 安哥拉战役：跛子帖木儿击败并俘虏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一世
- 约 1410 年 《奇迹之书》（法国国家图书馆 MS Français 2810）问世
- 1532 年 马可·波罗的作品在拉丁文合集《新世界》中被重新包装成一篇游记，题目为《论东方诸地区》
- 1559 年 马可·波罗的文本出现在拉穆西奥的一部意大利语的印刷译本中

## 原注引文出处

### 引言

- [1] David Jacoby. Marco Polo, His Close Relatives, and His Travel Account: Some New Insights.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xxi/2 (2006), pp. 193–218.
- [2] Martin da Canal. *Les Estoires de Venise*. trans.. Laura K. Morreale (Padua, 2009), p. 3.
- [3] 书中对马可·波罗著作的参考和引用，均来自美国哈克特出版公司 2016 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译者为笔者。该版本中还包含一系列地图和家谱。
- [4]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1996), p. 154.

### 马可·波罗和他的世界

- [1] Simon Gaunt. *Marco Polo's Le Devisement du Monde: Narrative Voice, Language and Diversity* (Cambridge, 2013).
- [2] Brunetto Latini. *The Book of the Treasure (Li livres dou trésor)*, trans.. Paul Barrette and Spurgeon Baldwin (New York, 1993), I.121, pp. 85–6.
- [3] C. E. Beneš, ed. and trans.. *Jacopo da Varagine's Chronicle of the City of Genoa* (Manchester, 2020), pp. 92–3.
- [4] Martin da Canal, *Les Estoires de Venise*, trans.. Laura K. Morreale (Padua, 2009), pp. 3–4.
- [5] Olivia Remie Constabl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dging, Trade, 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3), p. 123.
- [6] Da Canal. *Les Estoires*, p. 95.

- [7] Idrisi, *La première géographie de l'Occident*, trans.. Annliese Nef (Paris, 1999), p. 372, 原著为阿拉伯语, 这段引文是笔者从法语版翻译过来的。
- [8] Keith Devlin. *The Man of Numbers: Fibonacci's Arithmetic Revolution* (New York, 2011), p. 44.
- [9] Djamil Aissani and Dominique Valérian. Mathématiques, commerce et société à Béjaïa (Bugia) au moment du séjour de Leonardo Fibonacci (xiie-xiiiè siècles). *Bolletino di Storia delle Scienze Matematiche*, xxiii/2 (2003), pp. 9–31 (at pp. 24, 26–7).
- [10] 引自 Steven A. Epstein.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nc, 1996), p. 166.
- [11] Idrisi. *La première géographie*, pp. 371–2, 这段引文是笔者从法语版翻译过来的。
- [12] Beneš. *Jacopo da Varagine*, p. 88.
- [13] Ibid.. p. 244.
- [14] Rabban Sawma.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Medieval Travels from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to Persia and Beyond (The History of Yabballaha III )*. trans.. Sir E. A. Wallis Budge (London, 2014), p. 181.
- [15] Beneš. *Jacopo da Varagine*. pp. 202–4.
- [16] Ibid.. p. 70.
- [17] Ibid.. p. 257.
- [18] Thomas T. Allsen. The Rasūlid Hexaglot in its Eurasian Cultural Context. *The King's Dictionary. The Rasūlid Hexaglot: Fourteenth Century Vocabularies in Arabic, Persian, Turkic, Greek, Armenian and Mongo*. ed. Peter B. Golden (Leiden, 2000), pp. 25–48 (p. 29).
- [19] Vladimir Drimba, ed. *Codex Comanicus: édition diplomatique avec fac-similés* (Bucharest, 2000), pp. 35–109.

- [20] Fabrizio Cigni, 'Copisti prigionieri (Genova, fine sec. xiii)', *Studi di Filologia romanza offerti a Valeria Bertolucci Pizzorusso*, 2 vols, ed. Pietro G. Belgrami et al. (Pisa, 2007), vol. i, pp. 425–39 (p. 436).

### 《大汗之书》

- [1] Jonathan Chaves, trans and ed.. *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 Yu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1279–1911)* (New York, 1986), pp. 27–8.
- [2] J. A. Giles, trans..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i (London, 1852), p. 131.
- [3] Christopher Dawson, trans.. *Mission to Asia*, 2nd revd edn (Toronto, 1980), p. 32.
- [4] Peter Jackson, trans..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Indianapolis, in, 2009), p. 74.
- [5] Christopher P. Atwood, tra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2023), p. 158.
- [6] Thomas T. Allsen. *The Steppe and the Sea: Pearls in the Mongol Empire* (Philadelphia, pa, 2019), p. 151.
- [7] Ibid.
- [8] Jameel and Hilcia. Hangzhou – Venice of the East. Local Yet Not, 16 March 2017, [www.localyetnot.com](http://www.localyetnot.com), 笔者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访问了该网站。
- [9] 引自 Heng Chye Kiang.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Honolulu, HI, 1999), pp. 106–7.
- [10] Xiaolin Duan. The Ten Views of Westlake. 载于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Shih-Shan Susan Huang, eds. (Leiden, 2017), pp. 151–89 (p. 154).
- [11] Christian de Pee. Nature's Capital: The City as Garden in *The Splendid Scenery of the Capital (Ducheng jisheng, 1235)*, 载于 *Senses of the City: Perceptions of*

*Hangzhou and Southern Song China, 1127–1279*, ed. Joseph S. C. Lam et al. (Hong Kong, 2017), pp. 179–204 (p. 179).

《奇迹之书》

- [1] 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t, 1999), pp. 107–8.
- [2]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Collection. MS Ludwig xv 4 (83.mr.174). [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1437](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1437), 笔者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访问了该网站。
- [3] C. E. Beneš, ed. and trans.. *Jacopo da Varagine's Chronicle of the City of Genoa* (Manchester, 2020), pp. 233–4, 249–50.
- [4] Eamon Duffy. Introduction to the 2012 Edition, 载于 Jacobus de Voragine. *The Golden Legend: Readings on the Saints*. William Granger Ryan, trans.. (Princeton, nj, 2012), pp. xI–xxI.
- [5] Jacobus de Voragine. *Golden Legend*, pp. 29–35.
- [6] Ibid.. p. 35.
- [7] Brunetto Latini. *The Book of the Treasure (Li livres dou trésor)*. Paul Barrette and Spurgeon Baldwin, trans.. (New York, 1993), I.75 (p. 43).
- [8] Peter Jackson, trans..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Indianapolis, in, 2009), pp. 163–4.
- [9] John Andrew Boyle, trans.. Alā al-Dīn ‘Atā Malik Juvaynī,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ambridge, ma, 1958).
- [10] Joseph de Somogyi. A Qasīda on the Destruction of Baghdād by the Mongol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II/1 (1933), pp. 41–8 (at 45, I.3).
- [11] Latini. *Book of the Treasure*, I.122 (p. 90).
- [12] Captain Buzurg ibn Shahriyar of Ramhormuz. *The Book of the Wonders of India: Mainland, Sea and Islands*, ed. and trans.. G.S.P.Freeman-Grenville (London,

- 1981); Garden § 86, pp. 77–8; Sea voyages § § 90–91, pp. 80–83.
- [13] Compare *Book of the Wonders* § 77, p. 73 and *Description* § 169, p. 154.
- [14] Sharon Kinoshita. Traveling Texts: De-Orientalizing Marco Polo'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载于 *Travel, Agenc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Gesa Mackenthun, Andrea Nicolas and Stephanie Wodianska, eds. (Münster, 2017), pp. 223–46 (at pp. 238–40).

#### 第四章 动物、植物、矿产：商人和他们的世界

- [1]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 *The Golden Rhinoceros: Histories of the African Middle Ages*. Troy Tice, trans. . (Princeton, nj, 2018), p. 6.
- [2] William of Adam. *How to Defeat the Saracens: Guillelmus Ade, Tractatus quomodo Sarraceni sunt expugnandi*. Giles Constable et al ed. and trans. (Washington, dc, 2012), pp. 99–101.
- [3] Abū Zayd al-Sirāfi.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Tim Mackintosh-Smith, trans. . Library of Arabic Literature (New York, 2017), § 2.15.3, p. 64.
- [4] Ibid.. § 2.16.1, p. 65.
- [5] Charles Perry, ed. and trans.. *Scents and Flavors: A Syrian Cookbook* (New York, 2017), § 1.3, p. 7.
- [6] Cameron Cross. *Love at a Crux: The New Persian Romance in a Global Middle Ages* (Toronto, 2023), p. 94.
- [7]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Caroline Smith, trans. (London, 2008), p. 192.
- [8]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 iv: *Libri xIII–xVI*. H. Rackham, trans. (Cambridge, ma, 1945), p. 21, 笔者将原文“pungency”一词改为“bitterness”（苦味，拉丁语为 amaritudine）。另外，老普林尼还在别的地方抨击和反对当时流行的丝绸进口贸易。

- [9] Shihab al-Din al-Nuwayri. *The Ultimate Ambition in the Arts of Erudition: A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from the Classical Islamic World*. Elias Muhanna, ed. and trans. (New York, 2016), p. 209.
- [10] Perry. *Scents and Flavors*, §§ 10–14, p. 269.
- [11] al-Nuwayri. *Ultimate Ambition*, p. 210.
- [12] Perry. *Scents and Flavors*, § 5.58, p. 67.
- [13] Chau Ju-Kua.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ed. and trans.. (Amsterdam, 1966), p. 193.
- [14] al-Nuwayri. *Ultimate Ambition*, p. 43, 这一章还概述了各种事物和情况，如智力水平和专业素养、珠宝、服装、毛皮、马匹、有毒动物、糖、水果、芳香植物、不同民族的体貌和风俗习惯、疾病和气象特征等。
- [15] Captain Buzurg ibn Shahriyar of Ramhormuz. *The Book of the Wonders of India: Mainland, Sea and Islands*. G.S.P. Freeman-Grenville ed. and trans. (London, 1981), p. 106.
- [16] Paul Freedman. *Out of the East: 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New Haven, ct, 2008), pp. 135–6.
- [17] al-Sirāfi .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 1.8.3, p. 17.
- [18] Suzanne G. Valenstein. *A Handbook of Chinese Ceramics*, revd and enl. edn (New York, 1989), p. 99.
- [19] al-Nuwayri. *Ultimate Ambition*, p. 41.

## 第五章 肖像画廊：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

- [1] Shane McCausland.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Hong Kong, 2011), pp. 14, 340–41.
- [2] Ibid.. p. 214.
- [3] Ibid.. p. 218.

- [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 *A Scholar-Painter's Diary*. Clara Yu, trans., 载于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ourcebook*, 2nd edn (New York, 1993), pp. 199–201.
- [5] Zhou Mi. *Record of Clouds and Mist Passing Before One's Eyes*. Ankeney Weitz, ed. and trans. (Leiden, 2002), pp. 176–82; McCausland. *Zhou Mengfu*, pp. 58–61, 《云烟过眼录》还收录了关于赵孟頫的父亲赵与峕的条目，赵与峕于 1265 年去世（这表明周密编写目录已有多年）。Zhou Mi. *Record of Clouds and Mist*, pp. 190–92.
- [6] Zhou Mi. *Record of Clouds and Mist*, p. 220.
- [7] Marsha Weidner et al.. *Views from Jade Terrace: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1912* (Indianapolis, in, 1988), p. 66.
- [8] Ibid.
- [9] Ibid.. p. 66, 但需要注意的是，题跋的时间和画作的作者身份难以确定（见第 68 页，n.1）。
- [10] Ibid.. p. 67.
- [11] McCausland. *Zhao Mengfu*, pp. 344, 364–5.
- [12] Jennifer Purtle. Guan Daosheng and the Idea of a Great Woman Artist. *Orientalizations*, xlix/2 (2018), p. 9.
- [13] McCausland. *Zhao Mengfu*, pp. 105, 327–9, 359, 369–70.
- [14] Paul E. Losensky and Sunil Sharma, trans. and intro.. Introduction, *In the Bazaar of Love: The Selected Poetry of Amir Khusrau* (New Delhi, 2011), pp. xxiv–xxv.
- [15] R. Nath and Faiyaz Gwaliari, trans.. *India as Seen by Amir Khusrau* (in 1318 a.d.) (Jaipur, 1981), p. 4, 引自 Muhammad Wahid Mirza. *The Life and Works of Amir Khusrau* (Calcutta, 1935), p. 20, 加扎尔是一种短篇抒情诗，通常以爱情为主题，在 12 至 13 世纪的波斯语世界中（尤其在苏菲派教徒中）广为流行。

- [16] Richard M. Eaton. *India in the Persianate Age, 1000–1765* (Oakland, ca, 2019), pp. 55–6.
- [17] 见 Paul Smith, trans.. *Divan of Amir Khusrau* (Campbells Creek, Victoria, 2018) 和 Losensky and Sharma. *Bazaar of Love*.
- [18] Nath and Gwaliari. *India as Seen by Amir Khusrau*, pp. 26 (iii.8) and 28 (iii.32).
- [19] Ibid.. pp. 39, 49, 82–3.
- [20] Ibid.. pp. 55, 59–60.
- [21] Ibid.. pp. 97–100.
- [22] Ibid.. pp. 69–72.
- [23] Ibid.. pp. 70–71.
- [24] Ibid.. p. 70.
- [25] Martin da Canal. *Les Estoires de Venise*. Laura K. Morreale, trans. (Padua, 2009), p. 3.
- [26] Ibid.. pp. 57, 72, 75–6, 另见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 180, 182–8.
- [27] Losensky and Sharma. *Bazaar of Love*, pp. xxxi–xxxiii, 114.
- [28] Ibid.. pp. 98–9.
- [29] Eaton. *India in the Persianate Age*, pp. 66–70; Sunil Sharma, trans..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mir Khusraw from Amir Khurd's *Siyar al-awliya*, 载于 *Amir Khusraw: The Poet of Sultans and Sufis* (Oxford, 2005), pp. 93–8.
- [30] Dante Alighier. *Paradiso*, trans. Stanley Lombardo (Indianapolis, in, 2017), xix, lines 70–72, p. 76.

##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Janet L..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1989), 一部经典研究著作，关于蒙古征服所促成的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
- Allsen, Thomas.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1997), 一部重要著作，将研究重心从政治军事史转向蒙古人可观的经济与文化成就，其核心聚焦于纺织品的生产与贸易。
- Allsen, Thomas.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
- Allsen, Thomas. *The Steppe and the Sea: Pearls in the Mongol Empire* (Philadelphia, PA, 2019).
- Atwood, Christopher P., trans..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Five Chinese Sources* (Indianapolis, IN, 2021), 一部原始文献集，辑录汉人对蒙古人的早期反应及其与蒙古人的互动，前面还有一篇关于汉族文化与习俗的长篇导言。
- Atwood, Christopher P., tra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2023), 一部由蒙古史学家译介的蒙古史料佳作，译文融合散文、诗歌与对话，生动叙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历程。引言部分对中亚游牧文化与习俗进行了精辟的概述。
- Barker, Hannah.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hiladelphia, PA, 2019), 一部探讨热那亚人主导的贸易体系的开创性著作。
- Benes, Carrie E., ed.. *A Companion to Medieval Genoa*, Brill's Companions to European History 15 (Boston, MA, 2018), 一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文集。关于与本书第一章相关的材料，可特别参考 George L. Gorse. *Architecture and*

- Urban Topography (pp. 218–42); Rebecca Müller. Visual Culture and Artistic Exchange (pp. 293–319); 以及 Jeffrey Miner and Stefan Stantchev. The Genoese Economy (pp. 397–426)。
- Berlekamp, Persis. *Wonder, Image, and Cosmos in Medieval Islam* (New Haven, ct, 2011), 一位艺术史学者对扎卡里亚·卡兹维尼的《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这一文本传统演变历程的研究。
- Biran, Michal, Jonathan Brack and Francesca Fiaschetti, eds..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Mongol Eurasia: Generals, Merchants, and Intellectuals* (Oakland, CA, 2020).
- Biran, Michal, and Hodong Kim,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 (Cambridge, 2023).
- Brook, Timothy.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 2010), 传统叙事常将蒙古元朝视为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或将其与此前的辽、金王朝一同归入“异族统治时期”, 而布鲁克在贝尔纳普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中华帝国史”的系列著作中, 则强调了元朝与其后继王朝——明朝之间的某些联系与延续性。
- Bynum, Caroline Walker. Wond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ii/1(1997), pp. 1–26, 一位著名的文化史学家将“奇迹”视为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核心现象。
- Constable, Olivia Remi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dging, Trade, 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3).
- Cruse, Mark. Novelty and Diversity in Illustrations of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n *Toward a Global Middle Ages: Encountering the World through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ed. Bryan C. Keene (Los Angeles, ca, 2019), pp. 195–202, 对马可·波罗文本的不同视角的概述。
- Daston, Lorraine, and Katha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New York, 1998), 一部历史学著作, 以哲学与科学为基础, 研究西方传统中“奇迹”现象。

- Eastmond, Antony. *Tamta's World: The Life and Encounters of a Medieval Noblewoman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Mongolia* (Cambridge, 2017).
- Epstein, Steven A..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nc, 1996), 中世纪意大利四大海洋共和国之一的热那亚的历史,《寰宇记》便是在热那亚完成的。
- Epstein, Steven A.. *Speaking of Slavery: Color, Ethnicity, and Human Bondage in Italy* (Ithaca, ny, 2001).
- Epstein, Steven A.. *The Talents of Jacopo da Varagine: A Genoese Mind in Medieval Europe* (Ithaca, ny, 2016), 对热那亚大主教在马可·波罗囚禁期间所撰写的各类文稿的研究。
- Favereau, Marie. *The Horde: How the Mongols Changed the World* (Cambridge, ma, 2021), 对通常称为“金帐汗国”的蒙古汗国进行的详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蒙古人从草原游牧民族向帝国统治者转变的深刻见解。
- Franke, Herber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vi: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1994).
- Freedman, Paul. *Out of the East: 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New Haven, ct, 2008).
- Gadrat-Ouerfelli, Christine. *Lire Marco Polo au Moyen Âge: Traduction, diffusion et réception du Devisement du monde* (Turnhout, 2015), 一份关于马可·波罗作品所有已知手稿的完整目录。
- Gaunt, Simon. *Marco Polo's Le Devisement du Monde: Narrative Voice, Language and Diversity* (Cambridge, 2013), 一位著名的古法语学者主张“F 本”的优先地位,强调其对多样性的重视。
- Herlihy, David. *Pisa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A Study of Urban Growth* (New Haven, ct, 1958), 对鲁斯蒂谦故乡历史的研究。
- Hilsdale, Cecily J.. *The Imperial Image at the End of Exile: The Byzantine*

Embroidered Silk in Genoa and the Treaty of Nymphaeum (1261). *Dumbarton Oaks Papers*, 64 (2010), pp. 151–99,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彰显了礼物与物质器物在中世纪外交与权力政治中的重要性。

Howard, Deborah. *Venice and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 ct, 2002), 探讨威尼斯如何通过建筑, 展现其与地中海东部及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Jacoby, David. Marco Polo, His Close Relatives, and His Travel Account: Some New Insights.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xxi/2(2006), pp. 193–218.

Karnes, Michelle. *Medieval Marvels and Fictions in the Latin West and Islamic World* (Chicago, IL, 2022).

Kinoshita, Sharon trans. .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ndianapolis, IN, 2016). Introduction. pp. xiv–xxv.

Kinoshita, Sharon. Marco Polo and the Multilingual Middle Ages, 载于 *Medieval French Interlocutions: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 a Language in Contact*. Thomas O’ Donnell, Jane Gilbert and Brian Reilly, eds. (York, forthcoming), 对 13 世纪欧亚大陆主要语言的简要介绍。

Kinoshita, Sharon. Sheep, Elephants and Marco Polo’s *Devisement du monde*, 载于 *The Futures of Medieval French: Essays in Honour of Sarah Kay*. Jane Gilbert and Miranda Griffin, eds. (Woodbridge, 2021), pp. 314–27, 比较东西方文化中两大标志性动物的象征意义与实际用途。

Kinoshita, Sharon. Silk in the Age of Marco Polo, 载于 *Founding Feminisms in Medieval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E. Jane Burns*. Laine E. Doggett and Daniel E. O’ Sullivan, eds. (Cambridge, 2016), pp. 141–51.

Kinoshita, Sharon. Traveling Texts: De-Orientalizing Marco Polo’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载于 *Travel, Agenc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Gesa Mackenthun, Andrea Nicolas and Stephanie Wodianka, eds. (Münster, 2017), pp. 223–46, 对

马可·波罗相关学术与流行文化陈词滥调的批判性考察。

Komaroff, Linda, and Stefano Carboni, eds.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 (New York, 2002),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02 年伊儿汗国艺术特展豪华版图录。

Lambourn, Elizabeth. Towards a Connected History of Equine Cultures in South Asia: Bahrī (Sea) Horses and “Horsemania” in Thirteenth-Century South India. *The Medieval Globe*, ii/1 (2016), pp. 57–100, 关于印度洋马匹贸易的研究。

Lane, Frederic C..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1973), 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威尼斯研究的经典之作。

Larner, John.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t, 1999), 一部经典的导论性著作, 包括《寰宇记》在中世纪晚期的传播历史。

McCausland, Shane.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Hong Kong, 2011), 一部权威性论著, 对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孟頫的人生及其多重成就进行了重新评价。

Maguire, Henry, and Robert S. Nelson, eds. *San Marco, Byzantium, and the Myths of Venice* (Washington, dc, 2010), 一部由艺术与建筑史学者撰写的论文集, 探讨了威尼斯建筑背后的意识形态。

Mathews, Karen Rose. Other Peoples' Dishes: Islamic Baci on Eleventh-Century Churches in Pisa. *Gesta*, liii/1 (2014), pp. 5–23, 一项新颖的研究, 关于比萨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其与伊斯兰地中海世界的联系。

Mathews, Karen Rose, Silvia Orvietani Busch and Stefano Bruni, eds.. *A Companion to Medieval Pisa, Brill's Companions to European History 28* (Leiden, 2022)

May, Timothy, and Michael Hope, eds.. *The Mongol World* (Abingdon, 2022), 一部收录了五十八篇论文的权威性文集, 更新了我们对蒙古世界的认识。除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外, 还包括考古学和艺术史、被征服者眼中的蒙古人、蒙古帝国的疆域以及蒙古遗产等内容。

- Morgan, David O.. *The Mongols*, 2nd edn (Malden, ma, 2007), 一部关于蒙古人的经典著作。
- Perry, David M.. *Sacred Plunder: Venice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Fourth Crusade* (University Park, pa, 2015), 一项关于“盗窃圣物”在威尼斯城市身份建构中的作用的研究。
- Prange, Sebastian R.. *Monsoon Islam: Trade and Faith on the Medieval Malabar Coast* (Cambridge, 2018), 一部历史书, 关于香料贸易尤其是胡椒贸易在印度次大陆西南部伊斯兰化过程中的作用。
- Rossabi, Morris.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ca, 1988), 关于忽必烈的经典传记。
- Shea, Eiren L.. *Mongol Court Dres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Global Exchange* (New York, 2020), 一位艺术史学家根据现存的服装、文献记载以及艺术史上的描绘, 对蒙古服饰进行了复原。
- Wardwell, Anne E.. *Panni Tartarici: Eastern Islamic Silks Woven with Gold and Silver,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New York, 1989), 深入探究风靡中世纪欧洲的蒙古奢华纺织品“鞑靼布”。
- Whitfield, Susan. The Perils of Dichotomous Thinking: A Case of Ebb and Flow Rather than East and West, 载于 *Marco Polo and the Encounter of East and West*. Suzanne Conklin Akbari and Amilcare A. Iannucci, eds. (Toronto, 2008), pp. 247–61.
- Yamashita, Michael. *Marco Polo: A Photographer's Journey*, revd edn (Vercelli, 2002), 这本精美的画册记录了一位《国家地理》摄影师重走马可·波罗当年行程的经历, 重点展现了那些与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吻合的风景和民族。
- Zadeh, Travis. *Wonders and Rarities: The Marvelous Book that Traveled the World and Mapped the Cosmos* (Cambridge, ma, 2023), 一位文学和文化史学家对扎卡里亚·卡兹维尼《造物之奇与奇异之物面面观》的研究。

## 致谢

在我研究马可·波罗的十五多年里，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建议和鼓励，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本书在很多方面相当于我注释翻译的《寰宇记》的姊妹篇。该译本的问世要归功于已故的西蒙·冈特教授，他的著作《马可·波罗的〈寰宇记〉：叙事视角、语言和多样性》（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使我第一次确信有必要对马可·波罗的作品进行全新且通俗易懂的翻译。哈克特出版公司的里克·托德亨特先生主导并监督了该项目的完成，而蒙古学专家克里斯·阿特伍德的独到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寰宇记》最终译本的内容，其影响在本书中仍然可见。

布赖恩·卡特洛斯和我们地中海研讨会的众多杰出学者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丰富了我对地中海和西亚的认知，这些认知远远超出了我作为法国中世纪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范畴。感谢众多朋友和同事，他们邀请我发表演讲或为编辑的文集撰稿，使我得以对马可·波罗的作品进行多

方面的研究。我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们，是我在本书中阐述的马可·波罗研究新视角的第一批听众。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学术参议院的科研委员会为本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在此特别感谢萨曼莎·斯金格在本书撰写的最后阶段提供的帮助。

感谢瑞克逊出版社的亚历克斯·乔巴努为图片资料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塞巴斯蒂安·巴拉德精心绘制的各种地图。

一如既往，我要感谢威尔·克鲁克和莫妮克·杨，感谢他们对我的友爱、关心和帮助。

## 图片致谢

作者和出版方谨向下列机构与个人致以谢忱，感谢他们提供图片资料或允许复制图片。为简洁起见，下面列出部分艺术品的收藏地点。

Alamy 图片库：图 19（Massimo Piacentino），图 56（Shaun Higson/ 伊斯坦布尔）；© S. Ballard 2023：图 7、13、28；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图 34（阿拉伯文手稿 464，第 10r 至 10v 页<sup>1</sup>）；法国国家图书馆：图 2（法文 MS<sup>2</sup> 1116，第 3v 至 4r 页），图 5（法文 MS 2810，第 76v 页），图 33（法文 MS 2810，第 3r 页），图 36（法文 MS 2810，第 194v 页）；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图 4（博德利 MS 264，第 218r 页），图 25（博德利 MS 264，第 239r 页）；大英图书馆：图 3（皇家 MS 19 DI，第 61r 页），图 6（附

---

1 在古代手稿中，一张纸包括正反两个页面。“r”代表拉丁语“recto”，意为纸的正面（即右手页）；“v”代表拉丁语“verso”，意为纸的背面（即左手页）。“第 10r 至 10v 页”，意即“第 10 张的正面至第 10 张的背面”。

2 MS 是手稿（Manuscript）的缩写，国际通用。——译者注

加 MS 22797, 第 99v 页), 图 24 (皇家 MS 19 DI, 第 58r 页), 图 35 (东方 MS 14140, 第 101v 页); 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 图 30、51; 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图 11; 由 Marcella Giorgio 提供, 出自 Graziella Berti 和 Marcella Giorgio 的《用作“水盆”的玻璃釉面陶器》(佛罗伦萨, 2011): 图 42、43; Heritage Auctions, HA.com: 图 26; iStock.com: 图 14 (nstaney), 图 15 (lkonya), 图 55 (stigalenas);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 39、40、41、44、48、50; 尚蒂依孔代博物馆: 图 32 (MS 65, 第 1v 页); 巴黎卢浮宫: 图 21; 热那亚圣奥古斯丁博物馆: 图 20; 中国国家图书馆: 图 29;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 31;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 1、22、23、52、53、54; 大阪市立美术馆: 图 46; 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 45、47、49; Shutterstock.com: 图 37 (SuperPapero); 维基共享资源: 图 8 (摄影作品, Nino Barbieri, CC BY-SA<sup>1</sup> 2.5), 图 9

---

1 CC BY-SA 和后面的 CC BY 都是知识共享组织 (Creative Commons) 推出的版权许可协议。二者的共同点是允许用户自由使用作品, 但必须保留作者署名并提供原始作品链接或协议信息, 不同之处是若用户对作品进行改编、混编或二次创作, CC BY 允许用其他协议发布, CC BY-SA 则要求必须沿用相同协议。后面带的 2.5、3.0、4.0 等都是指协议的版本。——译者注

( 摄影作品, Dimitris Kamaras, CC BY 2.0 ), 图 10 ( 摄影作品, Jean-Pol Grandmont, CC BY 4.0 ), 图 12 ( 摄影作品, Wolfgang Moroder, CC BY-SA 3.0 ), 图 16 ( 摄影作品, Marikevanroon20, 公共领域 ), 图 17 ( 摄影作品, Giuseppe Capitano, CC BY-SA 4.0 ), 图 18 ( 摄影作品, Zairon, CC BY-SA 4.0 ), 图 27 ( 摄影作品, Gary Todd, 公共领域 ), 图 38 ( 美国西班牙学会, 摄影作品, Marie-Lan Nguyen, CC BY 2.5 )。

